大学的退却与坚守

DAXUE DE TUIQUE YU JIANSHOU

陈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



上架建议：高等教育

ISBN 978-7-5482-0071-0

定价：26.00元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

DAXUE DE TUIQUE YU JIANSHOU

陈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陈嘉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82－0071－0

Ⅰ.①大…　Ⅱ.①陈…　Ⅲ.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中国　Ⅳ.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699 号

大学的退却与坚守

陈　嘉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蔡红华　李　平　戴龙宝
装帧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44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071－0
定　　价： 26.00 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前　言

如果以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在1088年的诞生作为现代大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之一，那么，现代大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尽管大学发展的历史是坎坷的，路走得也是极其艰辛的，但是，没有人怀疑大学仍将会矢志不渝地一直走下去。毕竟大学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一定会是无数人人生理想的驿站、思考的港湾和思想的摇篮。大学凝聚着美好的梦想和期待，大学，就像一块肥沃的处女地，等待渴望真知、追求美好的人们去耕耘和开垦，种下希望，收获未来。

但是，大学的诞生如新生婴儿的啼哭，使世人欣喜之余，却不免产生了众多的困惑，就犹如人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样，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大学是什么？大学从哪里来？经沧海桑田，历风云变幻，已自有公论。而大学要到哪里去？却不是一个马上可以回答得出的问题，无数的哲人先贤，无数的莘莘学子都曾殚精竭虑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只要人类的文明还需要薪火相传，人类还需要文化的阳光哺育，大学就不会也不应该被边缘化。而只有搞清楚大学的发展方向，才

有可能使得大学真正发挥其中心作用，真正成为一面引领人类和社会前进的旗帜，也才真正无愧于人类的等待和期盼。

当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似乎很多东西都已唾手可得，但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似乎成了最为遥远和棘手的东西，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不无忧虑地预言："工业革命的结果，就是自由竞争的加剧，它可以创造财富，却不一定创造幸福。"一语成谶，这个预言今天不幸成为现实。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财富，却并没有创造使人类安居乐业的幸福。在一个极力倡导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乃至生态文明的时代，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和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应该通过文化的薪火相传，通过思想的洗礼和观念的涤荡，通过知识的培育和能力的培养，孕育无数具有科学、民主和创造基因的种子，使之在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使人在物质方面能够创造财富，在精神世界里也能够收获幸福，不至于完全堕入物质主义的泥淖而难以自拔。这应该是今天大学要去的方向。大学发展到今天绝非易事，尤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浪潮当中，在多元文化风风雨雨的侵袭之中，要做到既独善其身又与时俱进是何等艰难和不易。但正因为如此，大学才承载了人们太多美好的希望和理想，才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新的时代需要大学作出明智的选择。任何一个曾经的和现在的大学人，都期盼大学能够像一株美丽的芦苇，因为有了独立之思想而分外脱俗，有了自由之精神而格外坚韧，始终能给予社会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大学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梦想，而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大学是形而上的世界，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因为它总是在不断探究人类所不知的神秘的心灵世界。大学也是形而下的世界，它需要引领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需要成为现代社会的加油站和发动机，当然它更需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而主持人间正义。今天，赋予大学太多的东西是因为生存在一个忙碌和盲目的时代，人可以寄托的东西已经太少，大学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知识和技术



的开发和利用，它还承载着人类和谐、合理发展的重任，成为人类重建良知的根基，重振文化的基石。越是在人类精神堕入黑暗、寻找光明的时候，大学就越应该拿出信心和勇气，以挽救人类和自身。知其难为而为之，这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所决定的！大学在社会的急剧变化、碰撞和挤压中，尤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彷徨，在退却。但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绝不应该成为大学逃避自身责任的借口，大学的坚守是其超凡脱俗的气质和风格的表现，更是大学在一个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自身精神高尚和纯洁的象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还需要大学的存在作为社会发展的坐标，那么，大学就应该坚守世俗社会中的精神高地，吹响人类重塑良知和重建正义的集结号。为此，大学必须坚守！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现代大学的象牙塔精神

现代大学的诞生殊为不易，它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开出的最绚丽的花朵，其生命力之强，以至于历经千年而不衰，跟它理想的伟大和精神的崇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大学的理想和精神赋予了大学真正的生命力，也支撑着大学艰难却又坚定地跋涉。然而，在现代大学近千年华诞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提出，今天的大学还有理想可言吗？大学还有精神支撑吗？尽管这是近乎荒唐的发问，但是很遗憾，大学的理想和精神在今天许多的大学身上确实是已经不甚清晰和明了，有些甚至已经彻底消失了。在我们苦苦追寻现代大学前进步伐的时候，在我们崇尚科学理性的今天，理想和精神已经被物化，甚至是被世俗化和功利化了。盘踞于象牙塔光环中的大学固然有故步自封的嫌疑，但过分世俗和功利的大学是很难实现一种对人的启蒙和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的。纽曼曾经说过：“大学的存在，是作为达到伟大而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平凡的途径，是塑造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其“伟大”的含义首先应该是包含着理想和精神的伟大，大学的理想和精神应该是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都能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使所有心灵迷茫的人感受到力量、勇气和信心，并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大学的理想恒久远，精神永流传，这应该是大学的福音，也会是人类的福音。

大学曾经被誉为象牙塔，大学精神也被称为象牙塔精神，它还象征着高贵、永恒和不朽，更象征着人们对大学寄予的精神期盼。时光在流逝，但对于大学而言，我们应该找回它的高贵和永恒。

传统恒久远　精神永流传

现在，中国的大学用门庭若市和趋之若鹜来形容并不过分。文凭、学位泛滥、贬值，教学、科研被涂抹上功利、虚假的色彩，在此背景下，世俗社会中的大学就既不可能超然物外，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所谓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学传统的贬值和大学精神的功利化倾向问题。

如今，提起“传统”和“精神”，很多人是颇为不屑的，因为“传统”和“精神”在某些“现代人”的眼里已经“堕落”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来崇尚传统与精神，但当前，社会常常轻视传统的继承、精神的弘扬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也不例外。现在很多大学动辄要上层次、上台阶，动辄要向哈佛、剑桥看齐，或者最起码也要向北大、清华看齐，然而这种看齐不管它是否符合实际，却至少暴露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短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其视大学传统和精神为草芥。创名校本来如做做“大餐”，它需要精心调制，耐心烹饪，如果希望大学速成，那就像快餐一样，虽快捷却无嚼头，单调而乏味，更遑论营养全面了。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名校速成”的过程中，在大学城的同质化建设中，我们许多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大学，其积淀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传统与精神正在逐渐丧失。而这种积淀于大学灵魂和血脉之中的大学精神一旦枯萎，再想让它焕发生机将是无比艰难的，更不用说去简单地“移栽”或“复制”一所名校了。

1907 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哈佛校园的演讲中说：“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有继承才能有发展；大学需要风格，风格来自传统。”寥寥几句道出了大学传统的真谛，也告诫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大学现代化之路。期望所有的大学都去适



应一种单一的模式和风格是很荒谬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可我们今天部分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却总给人一种邯郸学步之虞。同时，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对照一下“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一个民族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至今仍令人深思的话语，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是有点儿缺“钙”？看不起传统，是人类的短视；看不到传统，则是人类的悲哀。面向世界的中国大学，在面对传统的时候，当敝帚自珍。但愿我们的大学不要再轻易失去来之不易的传统与风格。一所大学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那么这所大学就是有品位的，是不媚俗的；一所大学有了自己不朽的精神，那么这所大学也会是不朽的！如果一所大学有哈佛大学与真理相知的精神，有北京大学兼收并蓄的勇气，有清华大学厚德载物的博大，又有谁敢说这样的大学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呢？

缔造民主精神　追求平等自由

大学应该是有理想的，这是一个事实，大学的理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应该是所有追求真理的人共同的精神寄托。但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维系所有人获得民主权利和平等价值的场所。“大学主要关心普通人，赋予进入大学的人以远见和灵感，并不完全是大学的功能所在。大学的光荣在于培养有教养的人。”可见，现代大学诞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让每一个成员享受民主和平等的教育权利，这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基本条件之一。而时至今日，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应该说是最不能原谅的社会不公。现在，“弱势群体”这一称呼常常见于报端，但至少大学里的受教育者是不应该有强弱之分的，强调每一个人的民主精神和思想平等是大学的操守，也是大学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阻止一个在智力或性格与体力上属于强者的人取得凭天赋能力所能取得的成绩，其不公正、不民主和犯罪的程度正如阻碍一个

弱者在于与同伴竞争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一样。”

“平等”一词现在常挂在嘴边，诸如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人格平等、精神平等……它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的渴望和追求。《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平等”，即“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但这种解释却缺少了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即人们在教育方面也应享有相等待遇，而实际上这绝不是词典的疏忽，它至少说明在今天这个时代，孔子的“有教无类”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大学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反映”，此话想来是何等沉重又是何等深刻。大学永远无法也不可能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在物质方面实现平等，但它对精神和思想平等的倡导和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物质的贫乏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卑微，他（她）也许家境贫寒，也许出身低微，但却绝不妨碍他（她）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在潜意识中把受教育者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大学谈何精神与品位，谈何服务于社会呢？和谐社会、均衡发展，实际上从一个方面来说不就在于考量大学面对平等的道德取向吗？

法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过：“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道德问题，所有的道德问题都是教育问题。”此话乍听不免感到片面和偏激，但仔细想来却也启迪我们必须更加辩证和深刻地看待今天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满意当前的社会现状，我们也许只能责怪自己，因为在抱怨我们自己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面前遭遇不平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大学教育已经为这种种不平等埋下了祸根。大学不是道德的改良所，但一定是道德的发源地，因此，说到底，大学自身非常需要平等精神的滋润与哺育，同时，大学也需要缔造平等的人文环境。只要想想大学培育出来的千千万万颗携带平等基因的种子会在社会这块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大学就会是功德无量和超凡的。只有大学的品格和品



性是超凡的，大学的品位才会是脱俗的。

民主与平等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是维系社会和人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承认人的民主和平等的权利，尊重人的民主和平等意识，也是考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作为文明社会的重要一员，大学对社会的改造和推动，都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应该成为使人具有这种能动性的发源地。

大学·大师·大楼

大学发展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每一所大学都希望有不同凡响的声音让世人永记，但什么样的大学才是超凡脱俗的呢？除了永恒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形象，别无他物。而有了这两者，大学才是卓尔不群的精神家园。形象乃是大学之形，精神乃是大学之神，而一所大学如何才能做到形神兼备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世纪末，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大学的一位学生提出了大学应该是“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这些言简意赅的话语不管是出自大师大家之口，还是莘莘学子之文，都振聋发聩地揭示出了大学精神、大学理想及大学的宗旨，使今天的大学不得不三思而行。尽管这三所大学时至今日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三所曾经相处一地，至今天南地北的大学在今天却仍然还有惊人的相似——都有年代久远且风格独特的建筑物，更惊人相似的是，这些“大楼”产生之时，我们也看到了大师的诞生。似乎可以这样说，那个年代是需要大师，也产生了大师，需要大楼，也产生了大楼的时代。那么，到底是大师催生了大楼，还是大楼孕育了大师呢？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今天的大学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过分。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个高校的办学实力在近十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学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称得上高大雄伟、富丽堂皇，为各个高校增添了不少现代化的气息。不过，面对这些高楼大厦，人们总觉得缺少点儿什么。当翻开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目光偶然间落到历经90年风雨沧桑却朴实无华的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顿时让人内心有所触动和感动。

资料记载，1919年落成的清华图书馆，建筑面积只有区区2 100平方米。1931年再次扩建，面积达到了5 200多平方米，与1919年的旧馆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师生一走入殿堂就会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老图书馆那高大的墙壁、落地的木窗、安静的房间、磨砂玻璃的地板，以及那一股若隐若现的书香味，都让人觉得这才是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潜心研究学问的地方。特别是当你的视线接触到老图书馆外墙上爬满了的或红或绿的藤蔓，看它们风姿绰约地在风中摇曳之时，一切都仿佛散发着清华浓郁而久远的文化气息。那浩如烟海的知识，那汗牛充栋的图书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时，从读者心中涌出的是丝丝柔情，是阵阵感动。这温馨、和谐的环境甚至使得艰苦卓绝的科学探索之路都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真的，当你漫步其中时，当你仔细地用心去聆听、去体会时，历史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历史。这一切使人坚信，图书馆蕴藏着知识、学术，但它更是一种传统与精神的象征。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从这低矮的图书馆里陆续走出了梁思成、费孝通、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曹禺、钱钟书、季羡林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后来的学术泰斗。为此，说这座不起眼的建筑孕育了大师当不过分吧。可以说，这座大楼已与永恒的大师融为一体了！

事实上，这座图书馆并不高大，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它却都如此诱人而伟大，看来一所好大学是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成了一所学校精神的化身，成了一所学校永不褪色的“名片”了。大师可以使大楼蓬荜生辉，



大楼也可以使大师英名长存，二者交相辉映，使人感慨万千。也难怪有学者撰文说："今天的大学还能像这图书馆一样，使自身和传统自然地接续起来，以一道围墙，把知识的尊严守护起来，成为学术和精神的象征么?"①

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大学大楼盖了不少，也确实堪称"大"楼，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不多，更不用说能在我们思想上烙下印记的了。有许多东西，不仅需要用眼睛，往往更需要用心去感受、去体验。看看现在高校建筑中那千篇一律的建筑样式，几乎就和那千篇一律的校规、校训一样肤浅而单调，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更遑论大学建筑所应体现出的美学深度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充斥和堆砌在大学校园内，破坏人的感官享受，消解人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甚至是割裂了大学的过去和现在，导致整个校园文化传统难以传承，氛围和格调难以提高。即使是一些富丽堂皇的大楼，给人的感觉也是冷冰冰的，可敬而不可亲，只能使你感觉到它们仅仅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概念，而缺乏一种对人真实、温馨的关怀。这样的大楼，实际上人们是很容易忘却的。这一切是否是因为我们的大学今天需要的是日新月异，需要的是跨越式发展，至于人应该"安放"在哪里，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倒好像并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了。

为此，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为什么以前的大楼屈指可数，可大师辈出？而今天的大楼鳞次栉比，可大师却寥若晨星？为什么今天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程度远胜于昨日，可像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大礼堂，像北京大学的红楼、未名湖，像云南大学的会泽院、至公堂，等等，却只能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中，只能让我们去抒发思古之幽情呢？想到此，我们不能不很痛苦地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大师是卓尔不群的，所以造就他们的大楼也是卓尔不群的；大楼是出类拔萃的，所以

① 参见《读书》2001年第9期，第32页。

成就的大师也是出类拔萃的。看来，大师和大楼这两种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或许本就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吧。可我们今天有什么呢？

“昔人已乘黄鹤去，然而此地空余黄鹤楼。”很多大师已驾鹤西去，然而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于他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今天都成了各所大学的一道风景，真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那些历经沧桑却又极富代表性的建筑物就是逝去的大师们灵魂的安息地和永恒的墓志铭。要说我们今天的大学还缺少什么，那么现在的高楼大厦是既需要安放平静的书桌，更需要用新的精神、灵魂和动力来滋润与充实，否则大楼就仅仅是大楼，它永远无法孕育与成就大师。

时光匆匆流过，涤荡了许多东西，也留下了许多东西。21世纪的中国大学比任何时代都责任重大，也比任何时代都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有大师诞生。但仅有渴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梳理和改变我们的大学观念，我们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努力。只要我们能恪守这样的原则，即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可以进行合理的辩论而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地方，它是拥有宽容而不是歧视的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公开地寻求真理，那么出类拔萃的大师和卓尔不群的大楼应该是会应运而生的，由这样的大师和大楼构成的大学所孕育出来的人，才会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这样的人也才可能真正做到“会泽百家，至公天下”。

大师、大楼，都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我们今天都需要，只是我们今天应该用什么来塑造大师和大楼以及不朽的大学之魂呢？

哲学与大学的“原生态”精神

大学精神的丢失和寻找成了今天中国大学研究的一个主流话题，而“原生态”——一个表现了今天的人们对返朴归



真的情感渴望和对现实世界精神失落而失望的词，也许会对我们寻找大学精神有所启发吧。

对大学来说，大学精神犹如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学的“原生态”精神就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从本质上代表了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学已经从萌芽时的无足轻重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角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和社会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与冲突，特别在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进行物质量化的时代，大学精神的缺失，甚至消失也并不会让人惊奇。因此，新的时代需要我们用新的思想观念弥补大学精神的缺失，为大学精神注入新的活力。

今天大学改革的各种理论探讨无疑是推动大学前进的巨大力量，尤其是无论哪个层次的大学，都想从理论当中找到一条终南捷径，以期迅速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凸显无遗。但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对照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我们把眼光投射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忘却了脚下安身立命的土地，甚至忘却了大学精神的真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的历史不过百年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根基缺乏一种源自于自己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濡染和世界文化精华的辐射，那么这种理论是既狭隘又缺乏生命力的，更遑论去指导实践了。

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重视和尊重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而适时地汲取人类思想的精华，尤其是接受哲学思想的哺育是我们当前高等教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21 世纪的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

智慧和哲学理念。”[①] 那么从哲学当中，或者说从哲学思想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哪些对新时代的大学发展有益的哲学智慧和哲学理念，从而弥补大学精神的缺失呢？也许我们应该从必然和偶然两个方面看一看哲学对大学的影响，以及从哲学发展与大学发展的角度去了解、探讨两个基本问题：大学精神是什么？大学精神应该是什么？

一、大学精神是什么？

关于大学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从大学诞生之日至今，就有无数的哲人先贤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探索。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发现非常有趣和巧合的一点是，凡是大学和大学精神得以迅猛发展的时代往往是哲学复活或者是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比如在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粗具大学雏形的时候，“我们便不难理解，大学这个巨大的社团，与国家有着频繁而直接的接触，而它的根源又直抵中世纪社会的最深处，原本就该有这种有序的精神、组织的精神、严格管制的精神所促动，因为这样的精神是最普遍地渗透在那个时代所有机构中的”。[②]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巴黎大学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环境之力的产物，也是社会的自然产物，并且也许比其他的任何机构都更好地表现了社会。”[③] 在此，大学这个新生儿谁又能说不是文艺复兴的精神和人类哲学思想复活的产物呢？此时，哲学思想成了大学这个新生儿为了寻找人类世界微弱的灯光，却必须走进最深黑暗的精神支柱。19 世纪，在现代大学诞生地的德国，其大学的成长和成熟是居于人类精

---

① 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载《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②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1 页。

③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6 页。



神世界之巅的哲学思想、哲学精神的阳光和雨露沐浴的结果，当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这些思想和哲学巨匠相继诞生在德意志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大学"象牙塔"从而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一面旗帜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其现代大学发轫于一场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新文化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实质却又是一场思想启蒙和哲学复兴的运动，当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收并蓄"成为我们今天大学梦寐以求的目标的时候，谁又真正领悟了其中蕴涵的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意义呢？

以上种种事例可以大概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大学的命运总是和哲学的命运交织、纠缠在一起，至少在精神上是水乳交融的，哲学兴则大学兴，反之亦然。这绝非偶然，因为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其精神之树就深深植根于哲学这块土地上，在今天看来，枝繁叶茂的大学之树就是因为一直受到哲学思想的洗礼和扶持才显得生机勃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当大学之船航行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往往是哲学作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灯塔，引领大学前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就是哲学的结晶。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阐述道："大学并没有在明确的界限内画地为牢，正相反，它受到了鼓励，把眼光尽量放得更远。所以，自此之后，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觉得如果大学不包含人的学问的多种分支甚至所有分支，那么，它将永远不会完成它真正的使命，永远不会实现它真正的特性。"① 普西在《学者的时代》一书中认为："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② 赫钦斯则认为："大学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考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

①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② 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第9页。

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康马杰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大学也是社会的良心，否则就不是大学。”这些对“大学”的分析和判断既包含着无数人对大学的期待，更体现出了大学本身所具有的求真、反思、批判、创新、辩证的哲学精神特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发展孕育、造就了大学之体，而哲学思想和精神则赋予了大学之魂。

反观现实，当今天的大学似乎都在顺应一种历史潮流而动的时候，在拼命“超英赶美”的时候，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对自身发展的底蕴，尤其是对精神堤坝的夯实和哲学精神境界的提升。以现实为例，现在的不少大学缺少对哲学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哲学思想的创新和积累，以及哲学方法的思索和改进，这种种缺陷使得今天的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时偏离了航向，并使得大学由于缺乏一种科学的、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和观念的指导而显得心浮气躁，也由于缺乏一种哲学精神的砥砺而显得急功近利。比如，“跨越式发展”演化成了一种面子工程和高等教育感性战胜理性的借口；“教育产业化”更是把教育本身的公益性、公平性原则践踏得一钱不值。短视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使今天的大学看起来更像一个培训工匠的场所——教师整天忙于评职称、跑课题，学生整天忙于考级、拿本、获证，大学笼罩着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气氛和市场经济的商业气息，办大学的、教大学的和读大学的都似乎忘记了大学精神是什么，忘记了大学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砥砺和升华，一句话，忘记了大学的“原生态”精神，这也就无怪乎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① 而在《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一书中，刘梦溪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清

①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载《读书》2004 年第 2 期，第 99 页。



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跟乾嘉学术的繁荣密不可分。可是当代中国却了无人物，而缺乏一个气势宏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社会就没有风骨和风气。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都在没有文化的氛围中成长，思谋者操作者皆无所谓‘文化理想’可言，所以一时断无人物可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① 此言既切中当今社会重物轻人的流弊，又不能不让我们对大学“原生态”精神的缺失而造成的文化精神和理想的功利化倾向而深感忧虑。事实上，一个缺乏深厚哲学根基的民族是一个肤浅的民族，一所缺乏哲学思想熏陶的大学则是目光短浅、难堪时代和社会赋予重任的大学，其大学精神不过是无源之水罢了。

二、大学精神应该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大学精神是什么”是用哲学思辨的眼光来了解大学的过去和现在，而第二个问题“大学精神应该是什么”则要探讨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观来看待大学的未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有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大学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和希望，1998 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就强调：“大学在促进文明和人类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大学必须利用它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来保卫和传播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诸如公平、和平、自由、平等、团结等。”甚至于有人认为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这些都表明社会和公众对大学的期望值越来越大，大学不仅成了一张帮助学生探寻世界的地图，更成了师生认识社会、了解他人、完善自我的家园。

① 刘梦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但很遗憾的是，以前的大学是讲信仰（university of faith）的，现代大学是讲理性（university of reason）的，但目前“理性”有缩减到“科学理性”的倾向，知识被过度狭窄化和单一化了。由此而产生的更可怕的后果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单一化和消极化，这实际上既是一场大学的信仰危机，也是一场大学的生存危机，因为正如激进主义者所说的，大学现在的表现就像“枪手”，愿意按吩咐去办事，去帮助任何拥有足够权利和金钱的群体实现其抱负或野心。这些都说明大学由于自己的言行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叛了“大学”这个称号。这种结果的出现，归根结底和我们忽视了哲学这门智慧之学有密切的关系。“仅有科学而无哲学，仅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其文化和伦理使命，高等教育应该体现和保持文化特性，促进文化价值的创造和传播，维护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但我们的大学做得如何呢？特别是由于现代大学的迅猛发展已经越来越使大学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起了知识工厂和所谓现代社会思想库的角色，大学为此就必然付出一系列代价。在此，现代大学已逐渐失去了从它诞生之日起所追求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也必然造成大学“原生态”精神的缺失。

大学必然要发展，抱残守缺显然不行，但舍本逐末更非良策。21世纪是各种文化猛烈地发生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交融、整合、取长补短的时代，更应该是高等教育重新审视自己，丰富自己，并让大学回归到大学原来位置的时代。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大学发展的影子。既然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那么也应该是以研究人为使命的哲学的世纪，大学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哲学之光的眷顾呢？更何况哲学是智慧之学，更是教人从真、从善、从美的学问，“大学作为真、善、美的



保护人，它提出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于探索精神的宗教”。①有鉴于此，21 世纪的大学就应该在哲学之光的照耀下回到真、善、美当中来，弥补大学精神的缺失。

真、善、美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境界，就更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并使之融入引领社会前进的大学的血液之中并内化为我们大学的“原生态”精神。曾经有人把大学比喻为象牙之塔，意为从事神圣学术探讨的殿堂，但令人汗颜的是，今天还有几所大学敢称自己是象牙塔，我们的许多大学就从来没有进入过象牙之塔却是不争的事实。钱基博先生曾经说：“国家神圣，而学术尤神圣；未有不学无术之国家而可以长治久安者也。”大学无神圣的学术使命感就不配称为大学，而缺少真、善、美的指引，大学之术至多不过是一种技术而已，“但是，无论技术具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它却不能传递智慧。因此，我们需要能帮助学生明辨是非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学生去伪存真的能力”。②

21 世纪是人的价值回归的世纪，哲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也必然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去创造的地方。”创造未来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也是大学的梦想，要实现这种梦想，大学就必须依靠其精神支柱——哲学。真、善、美作为大学诞生之日所追求的理想，也必将是未来大学发展的方向，只不过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求真，大学是寻求真理之地，求真务实是每一所大学和每一个大学人孜孜以求的崇高境界，在这里应该使每一个人明白，大学是人们可以进行合理辩论而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地方，它拥有的是宽容而不是歧视；在这里，人们可以公开地寻求真理而不是欺骗。求善，大学是善良者的家园，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善良的天使，懂得尊重其他人，懂得尊重和保护每一件善行，有超越单纯物质利益的精神，有民主平等的

① 金耀基：《全球化与现代化》，载《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② 金耀基：《全球化与现代化》，载《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博大胸怀，有思考、再思考、学会思考的习惯、意识和能力，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认真倾听来自社会与民众的声音，尤其是关心弱势群体和下层百姓的疾苦，等等。“在这样一个人们对社会道德行为标准表示普遍关注和不满的时代，我们的教育机构更应该义不容辞地运用他们特殊的地位来鼓励学生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道德问题，加强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① 求美，大学是“唯美主义”者的化身和美的使者，它肩负着把美传递给每一个大学人的崇高使命。大学应该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懂得尊重神奇的生命之美，熟练自如地使用语言并能欣赏语言之美，敏锐真切地感受生活之美。这样的人能以远大的眼光看待学习，了解社会群体，崇尚大自然，肯定劳动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意味着要接受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指引，将今天的学习与未来的生活联系起来，成为创造未来的主人。

由此可知，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引，哲学使大学明白“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的，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有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要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②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门“显学”，弥补和丰富大学精神的意义在今天应该格外凸显，而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斋和口舌之辩中。

浅薄化阴影中的大学

《大学》曾开宗明义地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应该是一个极其崇高和伟大的时代所发出的伟大的声音，那是一个物质还远远谈不上丰裕的时代，

① 〔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2 页。

②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9 页。



造就了无数富有智慧和道德学识的人物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伟人而诞生了伟人的时代，而那个精神生活无比自由和充实的时代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至今无法企及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从来不曾这样富有过，但我们的时代好像离崇高越来越远，而离浅薄越来越近了。“浅薄”按词典的解释主要是指缺乏学识和修养。“浅薄”和“教育”似乎本不相干，但若一定要生拉硬扯，教育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浅薄而诞生的一项事业。换句话说，教育是为了使人避免浅薄或避免做浅薄之事吧。当然这只是一种逻辑推理，并不是现实，至少还不完全是现实。只是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努力追求现代化、希望现代化的时代，却已经掉入了一个浅薄的陷阱之中——整个社会忙碌和盲目，做人和做事都弥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气息，恰如克里夫·贝克在《学会过美好的生活》一书中说到的情况一样：“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的人来说，今天的生活已经是很好的了（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是如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还是觉得不幸福。在物质世界极大丰富的同时，我们经常陷入沮丧、困惑和失落的海洋。我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对价值的重视。我们没能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搞明白什么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和怎样去获得。”看来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浅薄并不是很容易调和和消弭的，因此，建设和谐的社会任重而道远。

在这样的浅薄化时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本来是应该引导人们去搞明白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和怎样去获得，以避免人们堕入一种浅薄的生活陷阱。“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要对社会的每一个流行风尚奉若圭臬。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①] 但遗憾的是，在时代的浅薄化浪潮中，高等教育的浅薄化仍

①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的浅薄化

“志存高远”应该既是任何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也是大学的发展之路。大学发展的历史是艰辛而坎坷的，大学诞生于世俗的社会，最终又从世俗社会中挣脱出来，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和理想价值的超功利性。尽管现代大学提出了服务社会的主张，但绝不意味着大学可以放弃自己的理想价值而完全成为一个世俗的社会机构。“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只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而不仅仅依赖于习惯，那么惰性和阻力也有其特定的用处。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错误。”① 蔡元培先生曾义正词严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需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② 可见，不论中外，大学理想的高远方能避免大学堕入世俗社会的尘网之中而成为社会的附庸。大学可以社会化，但不可以浅薄化。

中国大学近年改革的成绩有目共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从一种愿望变成一种现实，社会对大学的依赖性增强了，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社会在发现大学的价值的同时，社会的许多不良习气也侵蚀了大学的肌体。缺乏自主性的中国大学在市场经济的风雨中很难把握自己，失去自我的同时，只能更多地依附于社会，以社会的理想信念作为自己的理想寄托。

---

①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 页。

② 杨东平编著：《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 页。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高等教育多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一直缺乏真正的大学理想和道德价值取向，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代表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灵魂，大学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带来中短期的收入和名声效应，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的争夺战中，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幸免，都深深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大学理想和信念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大学陷入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实用主义的行为取向之中，大学理想和信念价值的浅薄化于是展现无遗。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客观上说，中国的大学一直在一个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办学和生存，已经习惯了安贫乐道的生活，而大学又确实需要物质的东西作为支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校园用地等等都是大学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办学物质条件得到较大程度改善的情况下，却缺乏对大学发展的深刻预见，简单地把物的重要性置于人的重要性之上，这就导致大学办学性质的错位，培养目标本末倒置。大学培养的是人，人的精神世界是不能有崇高和低俗之分的。由于今天大学理想和信念的过分世俗化和浅薄化倾向，导致大学缺乏必要的给予人的精神关怀和理想指引，忘记了大学宗旨和大学精神，仅仅是把自己视为一个职业培训的机构和文凭发放的场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趋势也迫使中国的大学从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职前训练工厂，大学的自我异化使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蜕变为片面的职业教育，所谓的“全人教育”早已成为过去，而演化成了“人力教育”。据此，回首中国大学的百年历史，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如果从大学应该具有的崇高理想信念的层面来审视的话，现在的大学离“真正的大学”越来越远了。

市场经济还在进一步演化，在一个所有的欲望和行动都可以用钱来进行结算的时代，大学本身要做到独善其身，甚

至逆流而上是相当艰难的，世俗的时代风气必然会影响世俗时代的大学。但是大学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越是当人类陷入一种精神盲区的时候，它越应该成为引领人类前进的旗手。当整个社会感染一种物质欲望的狂躁症的时候，大学尤其应该保持必要的清醒和理智，尤其应该是成为社会的一股强大的矫正力量，而不能完全为世俗所左右，随世俗之变而随波逐流。因此，大学要保持高洁的形象，首先就要保持理想信念的崇高，使狂躁和轻浮远离大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服从于政治压力或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创建出为长期的公共利益服务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追求和谐发展的社会也一定是物质欲望和精神境界和谐的社会，大学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价值就在于此。

二、教学观念和行为取向上的浅薄化

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懂得向善、感恩、坚守理想和信念，追求真理和自由。教学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阶梯，教学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不幸的是，大学理想的浅薄化也使得大学教学走向浅薄化。大学本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但由于教学中的急功近利和人才培养的短视，大学教学的价值取向出现了浅薄化的趋势。

纵观目前的高等教育，尽管提高教学质量的呼声不绝于耳，从上到下也出台了不少针对教学的政策和管理规章制度，但教学作为从属于大学活动的一个部分，很难摆脱教学发展的整体浅薄化趋势。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出现了教学中随意降低学术要求和学术标准的倾向，充满人性色彩的教学活动走向技术主义和情感虚无主义的泥淖，教学活动成了单纯获取学分的活动。教师的教学行为由于受职称、待遇等太多的非教学活动因素影响，加上学生评价和考试评价的束缚，教师已经很难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标准，教学内容流于形式和浅薄，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学生的情感培养出现空白。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的



质量由于教学水平的质量得不到保证而成为作业加长版和网络抄袭版的缩影。学生学习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这些现象都是目前大学教学浅薄化的具体体现，也成为影响高校毕业生质量的重要因素。同时，作为整个教学活动支撑点的课程，由于课程体系的设计过分注重实用性，强调应用性，学生在越来越烦琐的课程面前反而成为课程的俘虏而失去自我发展的潜力，课程理念和体系设计的浅薄化也导致“以理性为中心的教学法，始终认为课程是概念、事实、数据的文化积淀，且学生必须掌握这些东西，才能在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上走出一条正道。这种对于课程的刻板理解，可视为工具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存在论导致的必然结果，也因为该形而上学的理论，现代工业世界完全拜倒在技术脚下。然而，将课程作如是解，恰恰扼杀了透过现代性的层层迷雾看清实质的创造能力，于是，那些最充分地掌握了当代规范的学生，在理想、道德、情操、社会良知方面最为短视、最无见地”。[①] 由此可见，大学在教学观念和行为取向上抵制浅薄化的蔓延是当务之急。

此外，教学的浅薄化还造成学术不端和学术投机行为的屡禁不止，因为教学水平的浅薄化使得大学失去了对高深学问的钻研和探究的欲望，学术上的投机取巧和功利主义倾向使得艰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失去了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价值，所谓学术上的“趋利避害”，极大地损害了大学的学术声誉和形象。大学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不如说是由于自我放纵而作茧自缚。“公众认为大学是接受他们的委托以培养青年一代的场所，如果负责教育学生的高级学者们对自己的工作都缺乏责任感——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年轻人的思想和成果据为己有——那么，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必然会下降。在公众眼中，教授应该是道德高尚

---

①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全球化与后现代化教育学》，郭祥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0 页。

的导师，如果他们不能热心、细致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失去人们的尊重。”①

教学的浅薄化已经威胁到了大学存在的普遍价值，也使大学陷入了一场社会和公众对大学持怀疑态度的信任危机之中，消除这场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大学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保持大学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恢复到应有的育人高度，恢复大学教学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学走出教学浅薄化的唯一出路。

三、职业取向上的浅薄化

作为人生职业开始的第一站，大学毕业选择职业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一个崇尚金钱和地位的时代，职业的取向已经从兴趣和热爱让位于现实和经济利益。学生的职业取向出现过度现实化和功利化的趋势，职业成为谋生和牟利的驿站，对职业缺乏必要的热情和专注，这种对待职业的态度也迫使大学生的职业选择面狭窄，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信任度下降，就业率也就会持续走低。据统计，2007 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达 500 万人，但有 100 万人未就业。实际就业选择与现实社会需求发生错位，出现“结构性失业”，即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许多职位却出现空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期望值和择业取向，与社会需求有较大相悖之处。在择业取向上，往往把待遇好不好，是否是在大城市或发达地区作为择业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标准，这些都是职业取向浅薄化的表现。

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应该让学生在就业困难，甚至艰难的时候，明白和确立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使学生懂得职业选择的重要性，更深层次地理解对职业热爱和忠诚的意义，避免择业中的过分现实主义的举动。“让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蔓延到人类的非功利性活动领域，只能使人丧失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8 页。



对崇高的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帮助年轻一代建设以丰富、充实、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底蕴的主体性道德人格，那么，即使我们在物质上摆脱了贫困，我们还是不能营造出幸福的生活。”① 因此，职业教育绝非选择职业后的社会教育，而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分内之事，只有把职业视为一种事业，才有可能转变职业取向的价值向度。

总之，高等教育的浅薄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学理念的浅薄化导致了大学教学观念和行为上的浅薄化，最终也就必然导致学生职业选择上的浅薄化取向。布奈尔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里说道：“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错位和痛苦和高昂代价换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在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遭到扭曲的时候，在高等教育的浅薄化已经出现并正在蔓延的时候，需要大学作出选择，通过自身形象的重塑，拒绝浅薄，崇尚高尚，引领社会和公众过一种有意义和高尚的生活。高等教育处在浅薄化的包围之中，但高等教育必须走出浅薄化！

---

① 肖川著：《教育的视野》，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6页。

第二章　大学教育与人的教育

大学精神是美好的，大学的理想是崇高的，但大学精神和理想绝非一种形式上的存在，而是一种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种人格的塑造，一种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如何使人更加忠实于大学的精神，并有不懈追求理想实现的勇气，只有通过大学的教育来回答。大学教育不管是从内涵还是从外延来看，都比“教学”一词丰富和复杂得多。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也是不道德的。”高等教育尽管在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一种专业教育，甚至于现在几乎演变为一种职业教育，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对人的教育和启蒙，一种人格精神的塑造。换句话说，大学教育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主题来实施各项教育活动。在今天大学教育质量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现实背景下，大学更应该认真反思自己作为一个教育的场所而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大学重塑形象，重新获得公众和社会的信任。大学教育应该使师生“在尊重道德规范和科学知识的严肃性的同时，应能够完全独立与负责地发挥其基本职能，对伦理、文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行使一种智慧权威。这是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权威，它有助于社会思考、理解和行动”。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人的教育”。今天的大学教育比任何时候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都更加复杂，通过大学教育，如何使大学所培养的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充满人性真、善、美的力量，具备创造创新的能力，能够勇敢地直面社会和人生，这是大学教育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社会需要人才和精英来推动，但更需要人来擎起人类前行的火炬，引领社会的进步。大学不是社会的改良所，但一定是道德的发源地，这应该是今天的大学教育最大的外延和最丰富的内涵吧。

人性教育孕育个性教育

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一个常提常新的话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大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这无疑是当代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其中，在培养的过程中如何从理论到实践都充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充分挖掘学生各方面的潜力，让学生更加全面地发展更是热门话题。事实上，大学生的个性教育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始终没有予以很好的解决。其突出弊端概括起来就是，在教育思想上，仍然过分强调、重视学生的共性发展而轻视、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具体教学中，师生习惯墨守成规而漠视开拓创新，导致了大学生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缺失。换句话说，最终结果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中亦步亦趋者众，标新立异者寡，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大学没有良好的个性教育、不能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就谈不上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的人，谈不上拥有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更谈不上马克思倡导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大学之大，在于它海纳百川、不择细流的博大胸襟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而不断地创造、创新则是大学进步的阶梯。今天这个时代堪称创新与创造的时代，没有良好的创造素质和创造个性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就需要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具备良好的创造素质和良好的创造个性，在教育观念中积极倡导尊重学生个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与创造精神，鼓励在师生当中形成一种积极探索的创造性的教育思想氛围并付诸实践，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师对学生的绝对

权威性、学生对教师的绝对依赖性的状况，使学生与生俱来的独立性、怀疑性和创造性得到尊重、恢复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指个人的全面地、充分地、最随意地发展，它的精髓就是人性的解放。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创造就是个性解放的成果，以至于有些国家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具有个性（批判）和真知灼见（创造）的人”，这是有深刻道理的。但当反思我们教育的现状时就不能不很痛苦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各级各层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到今天为止奉行的仍然是分数或智力至上的原则，听话与顺从仍然是教师和家长最喜爱的品行，从小到大的训练（也许很难称之为教育）使得人的灵性被扼杀了，活灵活现的人被异化为考试的机器而变得一模一样，个性和创造性随即也被扼杀得一干二净。当然，在此无意否认我们教师和学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们的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培养出的众多人才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教育所获得的成就是以牺牲了人的个性发展为代价的。而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个性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一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个性得不到尊重和发展，则其未来堪忧。因此个性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需要我们教育观念的根本转变。对于大学来说，它的立足之处就是——思想和伟人，而思想和伟人之根就是一种鲜明的个性品质和个性精神。“真正的学者——如果他是称职的，他一定是固执的——不会仅仅做一个佃户，而会开垦自己的土地，播种自己的希望。”① 因此，大学教育离开了良好的个性教育就难称其为大学教育。所以，大学的崇高使命就是一个教会学生打破常规，突破自我，不断创造和不断探索真理，大学需要培养更多的具有鲜明个性、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

①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不过在关注学生的个性教育和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又不能不让人产生某些思考，其一是个性教育当然需要、必要，但会不会因为过分强调个性培养、个性发展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培养呢？因为个性教育毕竟是人的身心发展中重要而非唯一的因素，也因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极端化和绝对化，矫得往往过正；其二是作为一所大学，它最该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是人鲜明的个性还是人的创新精神？是一本本证书还是一张张文凭呢？如果人的个性遮蔽了丰富的人性，结果又会如何呢？二战期间，一位被关押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美国人受尽百般折磨，后幸免于难，战后回到美国并担任了一所中学的校长。但平静的生活并没有能抚慰他受伤的心灵，他总觉得应该把这段苦难的回忆告诉后人。于是每当有新老师分来学校，他都会亲自交给其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老师，我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当见到的场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杀害；妇女和婴儿被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你们的努力绝不应当被用于制造学识渊博的怪物、多才多艺的变态狂、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能使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①] 看完这用血写成的书信，所有高等教育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除了感慨万千以外，都会为人类曾经的人性丧失、泯灭而悲哀和难过，也都会不约而同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真正的造福者呢？难道最理智的人类真的常常在创造最不理智的历史吗？

杜威说过："教育首先是服务于人类的，其次才是专业

---

① 范晓玲著：《教学评价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页。

的。”不言而喻，对所有的教育教学来说，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开发他们的智力，发展他们的各项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对社会、对他人的健康的思想与情感，良好的道德与情操。简单地说，就是应该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成为拥有正常的感情和理性的人，即拥有人性的人。再进一步说，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更应是人性的殿堂、人性的大学。在这座殿堂里，学生们学到的不应该仅仅是书本的知识，拿到的也不应该仅仅是一本本证书和文凭，更重要的是要在大学这座充满人性关怀的殿堂里获得关爱、勇敢、坚强、诚实、同情心、善良、无畏、正直等许多无法用证书或分数来衡量，但却是一辈子受用不尽的“财富”。这些“财富”就像真理一样也许永远不会使我们的学生发家致富，但却可以使我们的学生走向自由和坚强。大学应该是培养有知识的“大”人的神圣殿堂，而非有才无德的小人，更非恶人，甚至罪人的场所。因此，人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可能并不像创新教育、个性教育那样彰显，但却是大学永恒而深刻的主题，更是每一所大学的奠基石。可以断言，没有良好的人性教育为基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教育，更谈不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我们在重视学生的个性教育的同时，不能不清楚地认识到有人性的个性才是创造未来的基石，才会真正地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而如果忽略甚至漠视人性的健康发展，过分追求个性发展只会助长或导致一个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与行为的膨胀和盛行，导致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而置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于不顾，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流都是极有“个性”的人，曾经让一个民族为之神魂颠倒，但正是他们让人类差点儿走向毁灭。今天想来仍然让人有切肤之痛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一场人性的浩劫。痛定思痛，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驿站，在这里成“才”固然重要，但成“人”更重要。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前任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提出：



"大学应该提供这样一种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他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使他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① 可见，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在大力提倡创新教育的同时，也应非常关注大学生人格、人性的发展与完善。可以这样认为，越是强调个性教育，越需要提高人性基础之上的伦理水平；越是高科技发展，就越需要良好的人性教育为之保驾护航。

今天的大学所承载的责任和所要起的作用是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便是真实的写照。正因为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因为大学已成为每一代人发现自我、寻找自身使命的圣地，我们才更有必要搞清楚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和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21 世纪的人才是知识、创造能力和各种非智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创新时代的竞争不仅仅取决于分数和智商，而更加强调人的心理素质和情商。在这样的时代，大学的使命不仅在于培养工程师、设计师、教师和医师，更要以培养人格健全、心智发达的人为宗旨。换句话说，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大学更是要把培养大学生们正常的感情和理性作为我们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内容加以重视。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卢贝亚曾这样痛苦地描述道："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医学故事，变成了人与机器和人与金钱的故事。"这样的话对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完善个性教育和人性教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在观念上，大学教育应该牢固树立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大学不仅仅是学术的发源地，更是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的基地。如果希望我们的社会是充满人性关怀的社会，那么大学对此是责无旁贷的。春秋时期的文化典籍《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

---

① 〔美〕陆登庭：《21 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参见《大学校长论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哈佛的一段校训是："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发财的。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思考，再思考，并学会思考。"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在大学氛围的营造上是不是缺少了一些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崇高精神的追求，而多了一些虚浮逐流之气呢？应该承认，从古至今所有的教育都是带有功利色彩和政治目的的，但过分地追求功利只会使我们的教育既谈不上全面，又有把人的培养拖入绝对实用主义和庸俗工具主义泥淖的危险。这种危险将可能使我们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未来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可能使我们对个性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关注降到最低限度而最终半途而废。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指出："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提炼民族品位，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这种教育能给人以对自己的观点与判断的真理，给人以表述这种观点与判断的口才，给人以倡导这种观点与判断的力量。"① 岁月蹉跎，但纽曼这位红衣主教穿越时空的话语仍给我们今天的大学选择道路指明了方向。

其次，塑造个性、培养人性、开发潜能、提高素质是大学教育的思想、观念、目的和宗旨的具体体现，而要真正把这些东西融入大学教育的内容当中，就必须整合我们大学的教育内容，尤其是整合现有的课程结构，通过优化课程设计，构建合理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体系，在课程设置的内涵上突出个性教育和人性教育以达到我们的教育使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最终目的。为此，应该大力开设诸如世界（中国）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8 页。



历史、文化、艺术、文学课程和科技史课程，以及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伦理学、美学、人格教育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以达到净化学生心灵，让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目的。可以这样说，教育既应该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地图，又应该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地图上航行的指南针。实际上，教育就是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发展的，社会既需要"专"才又需要"全"才，"专"和"全"需要个性教育，更需要人性教育，而这种教育就是我们大学的使命和基石。

总之，今天的大学应该是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乐园，是一个推动探索，使各种发现得到不断完善和证实的地方，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灵性、活力和希望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地方。个性使大学卓尔不群，引领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人性使大学和蔼可亲，成为道德实践、追求高尚精神生活的家园。为此，希望大学能包蕴着它应有的伟大、神圣的含义。只有个性之火永远燃烧，大学才会历久而弥新；只有人性之光永放光芒，大学才有可能福泽后世。

大学扩张与教育主体内涵的空洞化

"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不在乎如何跨越，而在乎是否跨越，这已经成为衡量是否具有现代发展理念的重要标志。但也许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却往往是人们最无知的东西。20 世纪著名的物理学家布里奇曼也说过："要发现一个词的真实含义，就应当了解人们用这个词做什么，而不是对这个词说了什么。"而从大学"跨越式发展"的进程看，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实现了这种跨越，甚至飞跃，迅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国，2008 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经高达 2 600 多万人，大学扩张的速度相当惊人。但大学扩张在目前强调科学发展

的背景下，似乎很有必要冷静思考和认真探究扩张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其内涵，即精神和思想层面是否在这种高速扩张中也得到了足够的丰富和完善呢？

今天的中国大学，一方面处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另一方面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形成种种张力，在呈现各种机遇和可能的同时，也使今天的中国大学面临发展的诸多问题，而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各级各类高校都设定了不同的发展和跨越目标，都渴望学校实现一种整体跨越式的发展，通过扩张，抢占高等教育的制高点，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在这种发展趋势影响下，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要跨越式发展，科学研究要跨越式发展，教师队伍要跨越式发展，办学规模更要跨越式发展。发展肯定是好事，中国大学确实还需要更好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和社会寄予今天的大学太多的期望，也赋予了更多的责任。但是，在这种发展大趋势中不难发现，大学在物质层面的主动扩张需求和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被动关怀，成为鲜明的对照。大学的扩张与教育主体内涵的建设并未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态势，反而更加乖违。大学扩张的进程越快，教育主体受到的冲击和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大学越走向社会的中心，教育主体越逐渐被边缘化；大学越呈现一种快速扩张的态势，教育主体的思想空间越显逼仄。这样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大学的快速发展与扩张使得大学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但大学的扩张如果把发展的主体遮蔽了，轻视教育主体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丰富和完善，使得人的精神世界在社会现实面前日益空洞化，最终把教育主体导向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淖而难以自拔，那么，大学的发展是否徒有其表呢？

一、中心的大学与边缘化的教育主体

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起步，蹒跚前行，历经千年沧桑，终



于从一个小小的行会组织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核心，也终于从社会的边缘角色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角。在进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后，大学更以其不可替代的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作用，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但是，很不幸的是，当中国大学逐渐成为社会中心的时候，教育的主体、人的地位却在炽热的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接轨声中迅速滑落，迅速边缘化。究其原因，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大学和世界高等教育都普遍反映出较为浓厚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教育色彩。教育采取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方式和"订单式销售"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培养模式适应了工业文明的需要，却不同程度地违背了"培养人"和"教育人"的规律。现代大学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办学的规模和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上，但对于大学中富有青春热情和生命活力的个体却很少关心、关注他们的生命诉求和价值认同，造成学生在学习中完全以实用主义的心态面对，缺乏理想和信念作为支撑，精神世界迅速走向空洞化。大学成为许多学生获取就业岗位，或者逃避现实的驿站。大学作为人生理想和精神的堡垒，却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迅速崩溃，教育主体的精神境界的矮化和功利化倾向，使得本应占据大学核心地位的人在一个趋利避害的时代被迅速边缘化。

今天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大学需要通过发展来回报对社会和公众的信任，但不管大学如何发展，其社会地位如何显赫，教育主体的地位都始终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主体作用应该得到全面充分的发挥，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个别受教育者的体力和脑力的充分发展，而且是指所有教育主体的体魄、智力、精神、兴趣、爱好、人格等各种能力得到圆满的发展，素质得到全面提

高。"[①] 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关心人、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体现了当代科学的发展理念。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②] 由此可见，在大学的快速扩张中，人应该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来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对当代中国大学"以人为本"的深刻追问，也是对大学作为人的思想和精神基础得以丰富、提升的最好诠释。因此，大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管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和途径，人的地位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大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或者说大学成为社会中心的意义就在于使受教育者成为真正的人，成为能够超越现实和功利束缚的新人。

二、多向度的大学与单向度的人

大学的扩张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多向度发展也成为大学融入社会的标志，大学基本功能之教学、科研、服务于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使命，使得大学更加社会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无孔不入的经济和跨越时空的科技需要更多更加专业和职业的技术人才为基础，因此，大学成为社会的"加油站"和"服务器"早已不是新闻。今天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满足社会需要的标志，可以简单视为大学辐射力的强弱，大学越多向度地贴近社会，大学就越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一个和传统大学理想和精神宗旨相背离的

① 顾明远：《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 年版。



现实，也已逐渐被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单以大学是否具备“现代性”特征而言，“如果一种机构，它的行为的组织方式严格地按照某种理性的逻辑来设计，而这种设计的全部理由，只在于它能够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尽可能地排除妨碍效益的因素，除此之外别无理由。那么，我们即可以指认这一机构处于‘现代性’之中”。[①] 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大学确实已经非常现代，扩张的速度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和节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大学确实正以跨越式的速度迅速地进入现代化场景之中。

但是，成为一所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大学却未必意味着满足了人的教育需要和精神渴求，更不意味着人已经超越现实，实现了人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在一个追求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国家，人的创造精神和力量可被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而颠覆传统，解构理想和精神的力量同样威力无穷。今天的中国大学扩张速度惊人，但异化的速度也是惊人的，现在已经很难看到或听到哪一所大学还秉持反思、引领、批判、自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学追求提升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已几乎成为笑谈。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大学却随处可见，大学成了经济实体，甚至蜕变为有买有卖的自由市场。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学的日新月异，也可以感受到大学精神和大学理想的日趋式微。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在经济市场化的如潮攻势面前，大学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成了社会的传声筒和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客观上说，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很多的因素，搭建许多诸如学科、师资、科研、课程发展的平台，使大学更像大学。但今天的大学却无暇积极搭建人的思想和精神改善、完善的脚手架，很少认真聆听学生和教师的真实感受，“以人为本”成为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却虚无缥缈的语录。教育主体本应具有的丰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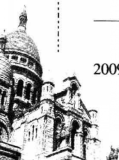
① 王德峰：《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载《新华文摘》2009 年第 7 期，第 122 页。

内涵被逐渐淘空。因此，中国大学之所以一直缺乏气势宏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以及能够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思想，也许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学始终过于追求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忽视了对人的主体内涵的丰富和完善。“如果一所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的价值，直接地由它曾经为社会所提供的职业人才的优秀程度来衡量，大学自然就卷入了市场的竞争之中，努力通过其市场效应而追求其声誉。这样的目标，将从根本上重组大学教育，其中包括专业科目的重新设置，教学计划和本科课程的重新制定，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调整。”① 于是，在这种扩张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极有可能成为取向单一、思想狭隘的人，或者堕落成为“经济动物”。

回溯历史，大学是为学术和真理而诞生和发展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大学，都不能随意歪曲和降低大学的基本宗旨和道德标准，因为，大学是一个能够思考现在和未来的地方。当代大学由于过于注重其发展的规模效应和市场效应，强调人才培养的职业技能性和社会适应性，大学的多元取向改变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一些大学一只眼盯着招生市场，另一只眼盯着就业市场，但却缺乏对教育主体的人格塑造和精神磨砺，对教育主体内涵的空洞化趋势熟视无睹。因此，尽管现在的大学在办学条件方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学生整体素质并没有体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的高等教育过分看重的是学生的所谓应用能力、技术能力，而对学生应该具有的思想和文化素养，以及将来的发展潜力和学习能力关注甚少。技术的滥觞，使得愈来愈多的青年学生成了“无根的一代”和文化虚无主义者；技术的发达，使得学生与同时代的信息交换愈加快速，但与异时代的伟大思想和心灵交流却变得更加闭塞；掌握技术已经超越了对真知的渴求，盼望职业已经胜过了对事业的追求和忠诚。

---

① 王德峰：《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载《新华文摘》2009 年第 7 期，第 123 页。



于是可以看到，这个社会有技术的人比比皆是，但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却凤毛麟角，教育主体内涵的空洞化恶果逐渐显现。大学只为发展而发展，没有了文化渴求和理想追求，这正是有的学者所感慨的“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的原因所在了。多向度的大学与单向度的人的抵牾，凸出了大学扩张和发展过程的曲折性，也表现出人才培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跨越中的大学与逼仄的精神世界

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教育主体的认识始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知识和经济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教育主体的地位受到了更多的挑战。大学作为教育和知识的载体，它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成为可能，而一个有教养的人不仅关心自我，还关心他人；不仅关心周围的事务，还关心人类。这种关心伦理的存在，使“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人类最高永恒价值得以弘扬，它把“做人”（文化素养）和“做事”（技术素养）完整地统一在个体大胆追求自己可能幸福生活的人生旅程之中，也使人的精神境界超越物质的束缚，而拥有更广阔的空间。① 教育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非“精确的知识”或“高超的技能”，人的成长更多的是心灵交汇的结果。因此，今天的“跨越式发展”必然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历史超越，犹如马克思所论及的跨越“卡夫丁峡谷”一般，既需要勇敢和无畏，更需要科学和理性，二者缺一不可。

首先，对社会发展而言，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服务器”，还是一个重要的“内核”，大学要发展，就需要不断更新内核，增大内存，在满足人的技术能力和职业能力获得的同时，更要满足人的思想陶冶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但在大学扩张过

① 钟启泉、高文、赵中建著：《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编者前言。

程中，刚性的发展指标使得大学无暇也无力更好地关注教育主体的精神发育，即内涵发展的状况，而教育产业化、知识权力化、学术行政化等有悖于大学精神的言行能够大行其道，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大学本质上是一个集中储存、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以追求人力资源开发和积累为目的的学术和教育机构，根本不同于以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的政府机构和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实体。”① 从表面上看，今天大学的发展空间似乎越来越大，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似的社会机构，但是在大学这样一个集学术机构、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商业实体为一体的庞大组织面前，人的精神世界得不到扩展、丰富和完善，反而日显逼仄，教育主体成为大学异化的牺牲品。大学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一员，它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培养一批有思想、不盲从、有责任的人，从而有效地约束社会和人的道德越界，对社会能够担起反思和批判的责任，使平等、自由、公正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大学只有成为社会道德的高地和时代精神的渊薮，才能使更多的受教育者有社会的良知。但是，大学放弃了对商业文化侵略的抵抗，使批评探索和文化抵抗的空间日渐缩小。当一个社会中本最应该具有思想影响力和批判力的大学丧失了对社会的约束、监督和批评，社会发生什么样的道德越界行为就都不足为奇了。

其次，大学的发展如果是以人的精神世界日趋逼仄为代价，那么大学也就会逐渐丧失对世界的正确判断，也就更加谈不上对社会的正确引领和帮助，而很容易沦为社会的附庸，陷入盲从和盲目之中。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更多地被所谓西方的主流文化所迷惑、钳制和遮蔽时，大学本应该成为弘扬自己民族文化和传统的主阵地，成为培养教育主体自信自立的精神家园。但由于教育主体思想空间的空洞化趋势仍在蔓



① 时依凡：《大学资源使用要警惕“贫困的富有”》，载《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1 期。

延，使得学生过于关注自我而丧失了对文化的正确判断，尤其是对于多元文化中的西方文化仍然采取一元化的价值取向。于是，“当人们的欲望、嗜好、价值观经不起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和不公的蚕食，在不知不觉间被收编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迷失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生产者和玩物；当社会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那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必然相形见绌，被视为落后低劣”。[①]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存在的现代意义之一，应该是衡量教育主体民族自信力和文化判断力的标杆，使教育主体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理想，恪守信念。而人的精神空间的被挤压和蚕食，使得教育主体蜕变为社会的“多余人”，而无法成为“牛虻”似的社会救赎者。

总之，发展对于现在的中国至关重要，选择前进，更加彰显一个民族的勇敢和自信。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和途径，尤其是作为发展主体的人如何能够在跨越中获得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应该更能彰显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理性。管子云：“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大学不管历经多少坎坷，今天仍存的一个最普遍的共识是，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掌握多种技能以及应用的能力，还要丰富和启发学生——告诉他们生活的价值，思想诚实，德性健康以及保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这些都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所在，只有思想和精神存在，大学才有未来可言。

---

① 刘健芝：《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载《读书》2009年第3期，第26页。

教育责任与责任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语，大学的规模发展之大，人数增加速度之快是令人瞠目的。不过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令人更感兴趣的话题倒是大学何以具有如此之强的生命力呢？有一项调查表明，从1520年到今天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一共有85个机构保留至今，其中大学就有50个。这似乎可以证明大学极具旺盛的生命力，不过更值得关注、研究和深思的是，大学是依靠什么赢得了社会和公众如此的青睐而长盛不衰的？依靠崇高的理想、不懈的追求生存下去，这是大学继往开来的历史；依靠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一种对社会、对民众的强烈责任意识，这也许才是大学得以薪火相传的真正原因。“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已成为社会中的超自然的机构，因为它似乎发展着社会的观念。在这里，人们感到身后有强大后盾——学者、学问、书籍、思想和过去。”① 追古思今，今天的大学还是这样的“后盾”吗？

我们的高等教育在不长的发展与改革历史中曾强调过许许多多的教育，比如创新教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等。不可否认，这些教育观念或教育目标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再认识，也是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但如果要从高等教育活动的本质意义上去探究的话，这些活动是否应该体现出对社会、对自然、对他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意义呢？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自我。”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已经认识到，在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的人应该对这个世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而并不总是让人在逃避、指责现实世界的跌宕变幻，以及面对这个物欲至

① 〔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上的社会异化的无动于衷。从这个层面出发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高等教育在传授知识、探讨学问、创造创新和努力扩大大学在社会中的影响的时候，是否思考过如何肩负起一种更重要的教育任务，即对人的一种全面责任教育的使命。一旦脱离这种教育，高等教育就背离了其安身立命的宗旨而成为无源之水。

"责任"一词，简单解释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那么高等教育始终要做好的分内的事就是要让学生明白对社会、对自然、对他人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如果把冯友兰先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视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所追求的崇高人生理想和人生责任的话，那么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就更明确地指出："在适应现实社会变革时，首要的是要保持对教育本质的寻求，以避免过于轻率地适应眼前需要而放弃长远责任。"这种"长远的责任"就是今天高等教育应该融入自己血液之中的信念和要恪守的职责。

一、对社会的责任

具有社会常识的人都明白，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超越社会存在而存在，而社会之所以存在并能不断前进就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能遵守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并不断完善，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社会约束力的无形的规范性文本。如果僭越了其底线，就必然招致批判谴责，甚至惩罚。因此，一种成熟的社会体制必然要求其公民承担一种必需的社会责任来促进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步。同时，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也必然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真正要使人明白崇高的责任并自觉地履行其责任，教育是责无旁贷的，尤其是处于人生由成长到成熟的关键时期的高等教育。

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还没有完全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因为不管

是教育思想还是教育实践，在相当程度上都是脱离了社会这个最真实的载体而思考和运作。再说具体一点，就是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没有体现出对社会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更缺乏有意识地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培养学生树立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的责任意识。比如，现在的大学知识量足够丰富，课程设置堪称精彩，但由于在具体教学环境中把现实的社会和教育割裂得很厉害，大学教学在相当程度上仅仅囿于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而缺乏一种引导人们对更广阔的社会中“道”的求索以及责任意识的培养；也因为我们在强调创造和创新的同时，却忘记了强调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即所有的创造和创新都是要造福于社会和人类的，而不仅仅是实现个人私欲的专利。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教育环境中，我们常常感慨今天的学生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化身，但却忽视了也许就是大学自己的言传身教亲手塑造了这样的言行，甚至灵魂。这使得学生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正确的社会观念仍然欠充实和完善，对社会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从理性到感性的认识、体验和把握，因此也就很难谈得上将来肩负对社会的责任。再说远一点，如果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知识观始终处于一种较为封闭和狭隘的状况下，那么很难对社会有一个正确、全面的客观认识和评价。在这种状况下，要么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得厉害，要么妄自菲薄，缺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魄力，如此种种都绝难称得上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这实际也就反映出当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着的责任教育的盲区——没有把人视为社会化的人来看待，却有把人幼稚化的倾向。

再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来看，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更显巨大，因为“高等教育的价值远非只停留在对民主模式的设计和维护方面，它还有更深层的价值。大学以及其他文化机构确保了一个社会享有共同的回忆。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即使这种回忆是痛苦的。某些国家总是试图逃避它们曾遭遇的种族歧视、极权主义等可怕的历史。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痛苦的回忆与庆典一样共同构成了其文化



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在此基础上构筑未来”。[①] 因此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大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化身，它更应该扮演的是社会良知的守护神的角色。

当今科学至上的观点使得大学的话题更多的是集中在诸如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生命、混沌理论、神经网络、宇宙爆炸、生物多样性、人类基因组、虚拟现实等方面，但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体现出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如果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今天高等教育中对人的责任教育的话，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呢？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又是极度不均衡的，社会的许多问题对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的某种程度的异化趋势也必然会带来教育的异化，因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良心”，其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恪守自己的道德操守，更在于发挥自己的作用，培养学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认真倾听来自社会与民众的声音，这种责任感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显得弥足珍贵。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取决于自身无数细胞的健康与否，高等教育培养出的细胞在其中应该起到防御疾病和提高肌体免疫力的作用，这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对自然的责任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不仅是一个对现实社会高度负责的人，而且他对今天人类生存的这个自然界也应该是充满了敬畏和关爱的。但一个痛苦的事实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实际上已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紧张、最恶劣、最难调和的时期，其根本原因是近现代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口的急剧膨胀，特别是人类自己的狂妄自大，以至于滥用科技，使得人这个

---

①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著：《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蒋凯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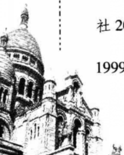
最富创造力的动物对整个自然环境的恶化、失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这样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量的急剧增强并没有和人类应该承担对自然负责任的态度、伦理的增强成正比。“现代人虽然在科技等方面高度发达，却不能充分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和结果，不能充分理解他们在自然环境中和自己的状况中造成的变化。在现代人那里，变得越有力量，就越缺乏一种同他的力量相一致的责任感。他们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而他们的思想、动机、价值观、体制和行为，却还是一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东西。”① 而这种对自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我们高等教育中缺乏深层次客观认识和体验的。对自然这个“文本”的片面认识，甚至错误解读，造成高等教育中自然责任教育内容的泛化和失语。

今天的高等教育确实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如果反躬自省，就可以看到，今天自然环境恶化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中又有多少内容是真正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呢？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思想中又有多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影子呢？说严重点，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潜意识中依然还是以人为万物之主宰而沾沾自喜。于是在指责人类应该为今天环境的恶化负责任的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从思想到实践真正表现出一种对自然关爱的责任意识和伦理水平。“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已经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尽快地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地球本身，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②

---

① 〔美〕约翰·布罗克曼著：《第三种文化》，吕芳译，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王诺著：《外国文学——人字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人类已经尝到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报复的苦果，那么，高等教育是否也应该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呢？

在今天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对自然环境的充分而深刻的认识是高等教育中无法回避的责任，而熟视无睹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应该让我们的学生从跨进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树立一种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明白不仅要尊重人类自己而且要尊重自然，因为这一切都和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教育中要帮助学生尽快形成并确立一种自然责任意识和负责任的态度，彻底改变为了满足人类欲求而置其他自然因素于不顾的发展观，明白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和谐的发展观，而这种观念的确立有赖于整个高等教育在它的教育过程、教育形式和教育模式等知识传授的结构系统中融入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理念，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对自然的责任教育持之以恒。

三、对他人的责任

21 世纪是一个强调创造和创新的世纪，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个人”、“自我”、“自主”已经成为主流词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解放和对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但正所谓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其积极意义就可能被事物发展的负效应所替代。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果只强调纯粹的利他主义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做到的，但如果放弃了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完全无视其发展，其后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 21 世纪》一书中指出：“……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不受节制的恶性发展之后，由于社会危机的刺激，人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社会高度，就是求得在充分尊重个性基础之上的新的共性的谐调。这意味着人类在处理个性—共性这对永恒的难题时已面临着

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新的历史起点。”这种站在世纪之交的深刻剖析值得高等教育深思。

这种新的历史起点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现实世界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的心灵世界却越来越封闭，信息交流越来越方便，人和人的沟通却越来越困难，人仿佛陷入了一张自己给自己织成的网中，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人的这种心灵失语症，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教育应该如何帮助每一个受教育者明确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当今时代的巨大变迁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原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交流。知识分子不只是知者，而是影响下一代人的教者。知识分子是融合器，是沟通者”。[①] 所以，一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即世界是每一个人的世界，更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我们的大学要让每一个大学生明白，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人们和谐相处，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平等地和人沟通，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实际也就是承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上，高等教育应该十分关注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知识系统中构建起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体系，引导并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和与人沟通的基本能力，把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与人和睦相处视为大学责任教育的重要内容。

由此看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是离不开对人的全面培养、教育的，如果高等教育放弃了对学生最基本的责任教育的义务，那么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既不可能全面，也难堪时代重任的。同时，因为“大学的自我异化使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成为片面的教育，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工厂的生产与再生

---

① 《哈佛——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李曼丽译，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产提供职业训练的教育”。[①] 今天这个时代的高等教育要避免堕入这种“片面的教育”的泥淖，最根本的就在于让学生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责任感、责任心的人。惟其如此，才是大学的幸事，也才会是社会的幸事。

道德高度决定发展高度

今天这个时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公众关注、重视的时代，而教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唯一的），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和非凡意义。很显然，人的社会化和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教育的健康发展是谈不上人的发展的。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发展观来衡量人的全面发展呢？曾经有学者认为，教育发展从宏观上说是整个教育系统在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在总体上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过程。从微观上说这种教育发展体现了一个人在知识、能力和道德诸方面的进步，反映出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和分析教育活动变化的基本态度。而有的学者则更简明、更概括地把教育发展表述为：（1）教育发展是教育的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2）教育发展是教育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增强；（3）教育发展应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宗旨与终极目标。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也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教育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通过知识不断积累与能力的提高而使人逐渐充满智慧和完善道德，并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可看出，不管什么样的教育发展观它都必须关注人的发展，也必须包含着对人的道德发展水平的关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人的道德教育的完善是不能把人的发

---

① 吴松、董云川主编：《通识天下，素养人生》，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展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的。

实际上，对于道德教育我们向来是不陌生的，因为它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也已成为我们今天所有教育中的一贯宗旨之一，更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较高文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道德教育之所以在今天引起了全世界更为广泛的关注，是因为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没有同步飞跃，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并没有带动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危机的时代，道德危机的爆发并非不可能，因为经济的滑坡而造成道德水平滑坡的例子并不少见。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道德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传统中非常重视的问题，高等教育同样如此，尤其是新的时代必然需要我们具有一种新的道德教育的观念、方法和手段与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但重视并不一定就会见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当重视落入一种形式主义的俗套时，其效果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教育的共识，这里姑且不论“德、智、体、美、劳”是否能够覆盖一个人全面发展的所有层面。而事实上，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智力与智慧在我们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是受到相当关注和重视的。而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我们的教育并没有更多、更深地引导学生去关心世界与人的价值和意义，而仅仅服从于外在的目的，教育的功利性湮没、遮蔽了教育的内在意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适应、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1] 在这样的情况下，毫不夸张地说，道德教育是不幸被置于一种从属地位的，学生完善道德的过程始终是处在一个被轻视、忽视乃至被无视的过程中。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在致力于向学生传授“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的同时，忽视，甚至放

---

① 高德胜著:《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弃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看到，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极其醒目的地方张贴着若干类似道德公约一样的标语和口号，如“不乱扔果皮纸屑”、“爱护花草树木”等一系列看上去堂而皇之而实则相当滑稽可笑，继而深思一下却很让人感到悲哀的东西。大学生责任感和爱心的失落，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缺乏关爱，诚信意识淡漠，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潮泛滥等等，其根源是因为现代教育的目光只收束到眼前，醉心于功利，而遗忘未来，失却崇高所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能不承认道德和道德教育在新的多元文化时代面前失去了传承已久的话语权，乃至集体失语。

试想一下，一个即将走向社会的知识群体还需要用幼儿园的行为规范（很难把这样的东西上升到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层面）来约束自己，那么，我们大学教育的过程是促进了人的发展，还是束缚、阻碍了人的发展呢？是升华了人的精神世界，还是矮化、虚化了人的灵魂呢？说到底，人的发展离开了道德的完善又何谈全面！遗憾的是，在具体的道德教育过程中，本来是活生生的、立体的、具体的道德教育内容经过当代教育功利化的筛选和过滤，水分已经丧失，立体变成平面，具体变成抽象，在干巴巴、平面、抽象的道德说教面前，道德教育本身所应有的神圣光环在学生的心目中也就必然陨落。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教学实践中，总是喜欢把道德教育从我们的生活实际和教育实践中剥离开，使道德教育脱离社会和生活实际而成为无本之木，“这种主要在学校课堂上以讲授的方式进行的科学世界的道德教育逐渐从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分化出来”。道德成了在教室中谈论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身体力行的东西。道德教育中的“道德”在学生心目中也随即蜕变成了一种极其形而上的东西。在我们强调让学生学会生活的时候，却可能忘记了道德是生活内在的逻辑或规则，生活不能没有道德，道德也无法从生活中离开这一根本准则。道德教育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头

脑里缺乏面对新形势下大学生道德问题在教育方法和手段上加以更新的结果，更是缺乏把人的教育上升到一个完整高度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所致。

澳大利亚未来学会主席埃利雅得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那么，我们靠什么去创造这个地方呢？大学作为知识创新、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和重视。但作为大学，我们更应该明确的是人才培养可以有精英和大众之分（事实上，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永远都有精英和大众之别，就像永远都会存在一流大学和普通大学一样）。然而在道德教育面前，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管他的实际水平如何、能力如何，他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楷模。现在谈教育改革，讲创新教育是不错的，也是时代的要求，但切不可犯毛泽东提醒过的："要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错误。"因为目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学生在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追求的过程中，并没有体会到心灵和思想的充实，相反却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无根感、虚无感，导致普遍价值和理想信仰的丧失，使得社会和集体的凝聚力下降，人际沟通变得困难，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感增加，甚至使人们之间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系数，使人们的焦虑不断加深，给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已不仅仅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上，本质上看就是一些道德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要把社会和人的发展问题列入道德教育的范畴，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通过深入浅出和多样化的教学，使大学生真正树立起做人与成才的正确观念，而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人才观，大学生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人。

今天的中国大学融入了时代的发展洪流之中，改革开放成为一所大学生命力的象征，而向西方大学学习成了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在对道德教育的认识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伴随着整个社会道德危机的爆发而对道德教育的



感受和体会是非常深刻的。在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的校长德里克·博克出版了他的教育经典之作《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书中对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及其意义的深刻阐述，对西方，尤其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对发展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也不乏指导意义。尤其是在目前国内外从上到下涉及、讨论道德教育甚为热闹的时候，这本书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了相当多的、很深刻的观点和看法，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博克认为："道德哲学被视为大学课程体系的顶点。它旨在充实、完善学生大学阶段的生活和学习，明确大学生活、学习的意义和目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注重培养毕业生的道德敏感性和识别力，以便他们在今后使用所学知识不仅可以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① 同时他还认为："在这样一个人们对社会道德行为标准表示普遍关注和不满的年代里，我们的教育机构更应该义不容辞地运用他们特殊的地位来鼓励学生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道德问题，加强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② 博克甚至尖锐地指出："一所大学如果不愿认真对待道德问题，就违背了其对社会应负的基本责任。"③ 在博克看来，道德教育是一个大学生知识体系当中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可惜的是，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大学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因为我们的大学既没有让大学生明确大学生活、学习的意义和目的，也没有承担起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我们还是把道德教育定义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去作一种简单、肤浅的阐释，使得道德教育的发展始终徘徊在我们学生的生活之外，而不能真正

---

① 〔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② 〔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③ 〔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成为学生的心灵之灯。

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和激情的地方，也是一个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地方，更是一个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地方。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地方，除了发奋钻研学问以外，还应该去关心一些跟饭碗扯不上关系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与人生话题，去显示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这些都需要道德教育的启发和引导。因为道德教育可以扩展为一种对人的精神世界净化和人格、人性、人生升华的教育。如果教育只能让年轻人龟缩到跟大学精神相悖的“小我”之中，学术的视野就会变得狭隘，治学的冲动就会消退，内心就只有“课题意识”而无“问题意识”，更无忧患意识，其做人和治学都将难有大手笔。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和作为，能否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百姓的人，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将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回溯过去，“道德是否可教”是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到今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展望未来，道德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道德教育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那么，道德教育对人全面发展的影响，确实是值得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深思和关注的。

寻找大学教育之“本”

一、高等教育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高等教育也在快速发展之中。回顾历史，1998 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是一次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议发表了著名的《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高等教育在 21 世纪的使命和重要职责是通过研究去发展、创造和传



播知识；促进和发展科技、人文科学与创造性艺术方面的研究；帮助学生在文化多元的环境中理解、保护和传播民族文化、地区文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并强调高等院校必须教育大学生成为学识渊博和有远大抱负的公民，能够以批判的精神进行思考，会分析社会问题，能研究和运用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办法并承担社会责任……今天，宣言的指导意义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相反，在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反而引发了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新思考。尤其是作为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本科教育，由于始终处于整个大学教育发展和变革的前沿，对其存在的诸多问题，采取过于理想和过于悲观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教育现实的，而是需要我们以更加审慎、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和看待。

首先，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由不同的办学层次组成的。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人才培养体系中起到对人实施全面而深刻教育的作用，即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基础扎实而知识全面、能学以致用、具备终身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大学生，这应该是本科教育“本”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现。由于专科办学规模的相对萎缩和研究生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上本科毕业生就业遇到困难，本科教育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后专科教育和前研究生教育的尴尬境地，而缺乏对自身独特发展规律的实质性探讨和研究。但不可否认，作为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本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其暴露的问题也是本科教育在发展中凸现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办学理念受当前社会影响较为明显，本科教育发展中出现了过分关注办学规模，而缺乏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重视；过分注重刚性管理制度和评估评价模式的建立，而忽视自身文化的建设和软环境的营造；过分强调大而全的学科专业建设，而缺乏鲜明的办学特色；新建本科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够准

确，学生整体素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也反映出我们对本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仍然还处在一种摸索、探究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认识。

其次，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宏观上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实现了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从大学自身教育环境来看，高等教育目前又被笼罩在经济市场化、大学全球化、文明西方化的客观环境中。整个本科教育都把教育重心越来越多地放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上而不是科学的文化启蒙价值上，放在教育的训练生产技能的职能上而不是教育培养全面人格的职能上，这种重心的偏移也直接导致本科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和实用化。“在高度现代化的市场社会中，高等教育一个日渐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总是把学业的成功与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这些观念和行为无疑对本科教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科教育的“本”已经在动摇甚至产生位移。在这样的发展变革面前，在高等教育的理念、教育行为与“巴黎宣言”有背道而驰的倾向之时，尤其是人的发展有被物的发展遮蔽的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有没有勇气通过积极的文化自觉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去追问：本科教育，“本”在哪里？

二、高等教育的深刻质量内涵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本科教育自身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动态。目前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已经高达 2 600 多万人，在师资水平和培养质量受到普遍诟病的情况下，如何构建一个符合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符合学生主体

① 甘阳、蔡达峰、郭齐勇、舒炜：《大学人文教育主题》，载《读书》2006 年第 4 期，第 19 页。



发展需要的本科教育平台，充分体现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是现在本科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构建的这个平台不仅要使学生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得到基本的学术熏陶和思维训练，更重要的是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这种“教育”的意义从更深刻的文化内涵角度去理解，不仅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应该体现出其他知识（包括对自然、社会、价值、文化、传统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的教育对一个人打下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烙印。本科教育质量是衡量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核心标准，在当前质量问题引起广泛争议的时候，本科教育作为大学一个相对独立却又至关重要的教育阶段应该具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开放和丰富的文化视野，才能抵消大学的理念被大学的功能吞噬的危险，甚至在抵消危险的同时，才会让学生“发展整个的人格”，“在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

说到底，学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归根结底取决于高等教育视野中的质量观。一般认为，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四个关键因素，但质量问题是始终居于中心的因素，因为质量历来是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也是最复杂的可变因素。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科学生的质量标准为“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对质量的看重使得许多评估制度和模式都想通过监控学校的办学流程来提高本科教学中的人才培养质量。但由于评估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水平差异，加上评估导向功能被一味强化，迫使一些学校过分看重评价结果，去追求形式主义和大做表面文章，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既违背了本科教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于本科教育是整个大学的中心的教育理念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本科教育质量观有被

简单化、模式化的嫌疑。所以，在发展迅速的本科教育中，能够客观、理性、审慎地看待发展，不断丰富本科教育的文化内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如何看待质量问题，又如何培养质量，这是对本科办学理念的直接追问。对于人才培养，有的学者认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就应该是大众化的本科教育的质量标准，不必以从前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苛求；也有的学者则认为，大众化阶段也好，精英教育阶段也好，本科学生毕竟只是社会人群中的少数，高质量的培养规格是关键；还有的学者则坚持本科教育就是专业教育，应该义不容辞地强调专业教育对于学生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各种观点，不一而足。由于对人才质量的看法大相径庭，已经直接影响到本科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实施策略。其实对于质量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教育永远存在争议，教育也是在争议中发展的。但是，争议不能混淆概念，更不能偷换概念，事实上，一个最基本的质量概念就是大众化也好，精英化也好，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不能任意地、人为地降低，更不能以牺牲人才培养的质量来换取所谓规模的扩大、结构的改善或效益的提高，这应该是整个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底线，教育不能舍本逐末。因此，本科教育思想和理念要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就需要建立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能够提醒我们，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既要防止墨守成规、无所作为的“僵化”思想，又要防止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神化”思想，更要防止没有标准、乱贴标签的“泛化”思想。只有实事求是地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不断丰富本科教育的文化内涵，高等教育才可能有助于社会、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地发展，其价值取向也才符合培养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的需要。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实就是本科教育质量最好的体现。



三、高等教育与社会、个人的和谐发展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高等教育的本质意义就是通过对人全面的教育社会化来推动社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尽管这种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在现实环境中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大学自身崇高的教育理想决定了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过程中是不能自我贬值和自我放逐的。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而且还要引领社会，这就需要大学有超越自身局限的勇气，能够舍弃眼前狭隘和功利的图谋，守护教育的理性，立足社会长远利益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守望者。要实现这样的教育理想，要培养了解社会和人生、影响社会和珍惜未来的大学生，就要如蔡元培先生所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善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信息化迅速推进的今天，社会的整合性越来越高，人们生活于一个越来越高度整合了的社会之中。但是，具体的个人由于在这个整体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易于被取代，日见微弱，日见局限，因而越来越轻视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思考，而倾向于片断性、简单性思考，是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个人沦为一个孤岛，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培养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完整的人格、坚强的意志，了解社会和人生，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是目前本科教育阶段的重要使命，而要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就应该坚持在本科教育中将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融合，使学生在本科学习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既符合自己的个性发展，又符合社会发展、市场需要的道路。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讲，人的发展问题是21世纪教育的核心问题。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分科式教育和应试教育，使大学

生的整体素养和知识结构呈现疲软和单一的倾向，尤其是大学生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思想和反思的能力，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这与社会和民众所期待的大学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公民，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平民化的公众知识分子的目标相去甚远。潘光旦先生早在20世纪中叶就深刻地指出，过分追求“专业教育的结果是，个人全都成为畸形之人，零星片段之人，而于社会，则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甚或权益的冲突，愈见得无法调和，畛域、门户、阵线、壁垒之见愈见得无法消除。科学的智识越来越细致，政治的主张越来越褊狭而不能融通，越固执而不能移动，专家与自信负有使命的人才越来越多，而国家与国际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也就是，人与人、群与群的合作越不可能。这便是当前的‘大时代’了”。[①] 潘先生的这一番话无疑点中了高等教育在强调专业知识严密的逻辑性特征的时候，却忽视知识的整体性发展的特征的要害。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也深刻地指出：“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异化力量，因为以技术为前提的现代工业已经成为一种超自然和超人的宰制力量，成为一种在方法论上、科学理论上和实际运用中可以直接把握的统治工具。”

总之，反思目前的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环境，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注重把学生培养成为国家、社会需要的“材”，而很少看到，并关照作为“人”的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特征在一个狭小的认知范围内被一再削弱。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谈何厚积薄发，又谈何创造性！所以本科教育必须思考如何在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合理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平台，为学生将来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教育有了根，那么学生才

①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会健康成长，社会也才可能和谐发展。

四、高等教育中专业和通识的整合

基于对本科教育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可以看出，本科教育阶段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专业教育，就有把人的全面教育导向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危险，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符合人的发展实际。而要纠正这种教育中的偏颇，通识教育理念的确立和通识教育的实施是一个根本的举措。换句话说，本科教育实施的立足之“本”就是要构建合理的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体系。

自现代大学诞生以来，通识教育就成为基于对人与社会本质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大学教育思想和策略。其核心命题是为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其基本要素包括：人与社会、教育与大学、教学与课程等。其基本特征是：从大学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大学使命，不以满足大学内部需要为目的；从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培养目标，不以满足职业需要为目标。梅贻琦先生早在20世纪执掌清华时就高屋建瓴地提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教育战略计划委员会”在1993年对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生提出的标准包含以下12项内容：

（1）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
（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
（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7）具有判别什么是透彻理解某种事物的方法的能力；

(8) 具有辨识重要与琐碎、持久与短暂事物的能力；

(9) 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定量、历史、科学、道德、美学）；

(10) 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11) 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之间联系的能力；

(12) 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通过这些标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名合格的，甚至优秀的本科毕业生，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外，奠定和成就其未来的却极有可能是专业知识以外的各种“博”、“雅”的知识及能力。这样的标准实际上也更显示了教育的人性化色彩，既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也尊重了人的发展需求。因此，在如今一个知识领域无限扩张、学科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的新知识格局中，本科教育传统中过分注重专业化的训导方式不仅偏离了大学教育的本质意义，而且也不符合当代知识格局调整对大学教育方向提出的新要求。如果从社会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过分专业化的倾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更是显露无遗，既和社会需要的人才目标相抵触，也不利于学生将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沧桑巨变，大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正成为时代的主流话题，通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从更深刻的层面来说，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认识和把握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通识教育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专业教育的废黜，相反，良好的本科教育生态环境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辅相成的结果。只是在现阶段，尽管通识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仍然应该给予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正如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曾说过的那样：“尽管难以给通识教育下定义，它的实现也极具挑战性，但这难以捉摸的通识教育的目标可能依然是使学生为终身学习和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途径。”

以上所谈问题实际是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充分认识



到本科教育的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积极地去丰富本科教育的文化内涵，也才能在教育中更关注现代社会中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并通过本科教育的整合实现我们的教育理想。教育过程是漫长和复杂的，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本科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的发展的深刻意义，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本科教育的“本”所体现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就是要“最终引导学生带着质疑的态度去了解成人生活的世界，去反思当代的道德特征和社会的各种体制，抵抗事实上控制它的所谓社会潮流。通过这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重建现代人的道德和公共生活的品质”！①

① 金生鋐主编：《教育：思想与对话》，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章　教学变革与教育真谛的秉持

如果说大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建筑体，那么大学教学就应该是维系和支撑这个庞然大物的基石。因为，大学教学是整个大学教育的中心工作，只有通过大学教学，才能使大学的理想得以实现，使教育对人的深刻影响和大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落到实处。大学教学既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大学生学习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中，莘莘学子要学会如何去认识和发现知识，并且在知识的积累和熏陶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对社会富有责任感、正义感，能为真理而不懈追求的人。尽管今天的大学教学已经和大学诞生之初有了很大的区别，但不变的一点却是大学教学应该是，并始终是一个教人学真、向善、求美的过程，而绝非是一个传递冷冰冰的知识，甚至贩卖知识的过程。教学只有通过师生之间的心灵加温，才会使师生感到知识的温暖和价值，才有可能唤起对知识的向往，激发创新的欲望。大学教学，应该使我们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坚持真理，具有批判精神的智者，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心灵守望者。

社会在变，大学在变，大学教学也需要变，因为大学存在的重要意义就是要不断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成为社会的美好心灵。在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世界面前，墨守成规不应成为维护大学保持传统的借口。大学需要变革，大学的教学也需要更加理智和务实的变革。但大学教学的真谛是不变的，大学应该始终让人保有对未来最美好的精神寄托和向往。大学教学只有始终秉持对人启蒙和砥砺的信念，始终怀有对人的心灵和精神的终极关怀，这样的大学才无愧



于一个时代和民族的良心和旗帜!

摆脱教学困境的对策与出路

高等教育中的本科教育，既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主体，也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并充分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规律。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和社会需求的增加，对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规模、质量和效益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高等教育，加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对质量标准的看法也是争议颇多，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面，尽管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各院校之间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质量的培养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大批新建的本科院校和传统院校之间在经费投入、办学理念、教学科研水平和师资力量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如何有针对性地根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制定相关的本科教学对策，是众多的本科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本科教学的质量问题也一直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关注的重要甚至是首要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中都曾遭遇过本科阶段教学质量下滑的问题，如何教，如何学，看似一对简单的矛盾，其实蕴含了相当复杂、多变的因素。中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后发型的国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借鉴他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才可能使高等教育真正具备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在对“美国高等学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七条对策”进行理论综述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本科教学质量提升的对策和建议。

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在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施策略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美国高等教育界提出的“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七条对策”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对高等教育教学质量问题关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社会屡屡批评高校办学质量不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因而各高等教育协会、教育基金会频繁开会探讨提高教学质量应对社会挑战。如何在不降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前提下保证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此次探讨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界集思广益，以“怎样使本科教学更优秀”为主题，在有针对性地对美国本科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集中整合了教师、管理人员和高教政策制定者的智慧的基础上，在反复酝酿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七条对策，即：

（1）鼓励学生教师互动；

（2）鼓励学生之间相互合作；

（3）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4）及时反馈；

（5）学习时间；

（6）较高的期望；

（7）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及其不同的学习方式。

其实，细细研究这七条对策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高明之处，无非是教学中一些很常规、很普遍的东西，我们目前一些大学制定的教学策略比这个复杂得多，也具体得多，但“七条对策”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高等学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金科玉律，20 多年来在欧美大学的本科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发展呢？尤其是对我们目前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有何借鉴和指导意义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一、“七条对策”对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指导意义

中国高等教育从 1999 年开始扩招到 2010 年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了，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意味着本科学生的数量呈大规模的增长趋势，也意味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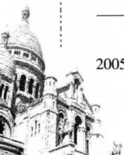
作为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本科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问题日益突出，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日益凸现，以至于必须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寻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突破口，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今天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绝不能以牺牲人才质量为代价。教育部连续下发关于教学质量保障和提高的诸多文件，并把教学质量提高视为“质量工程”，通过各项措施来保证教学质量，而事实上，现在各类本科院校已经把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放到了一个显著的位置上。但是，对于本科教学质量问题，我们还存在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就是总把质量的提升视为一个单一的因素或把教学质量视为一个简单封闭的系统概念来理解和处理，对于质量问题采取的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和操作方式，而对于教学主体的学生却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关注，对学生的期望值明显偏低，对学生的学习缺乏足够的智力和心理支持，这直接造成了学生学习热情和积极性的下降，也导致教学质量的下滑。在现在整个高等教育都把目光从单纯关注规模、效益转向关注质量的时候，美国高等教育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七条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美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和强国，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非常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断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很少空对空。其次，“七条对策”充分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理念中实用、简明、高效的特点，这和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往往是从理论中来，又回到理论中去，较为烦琐和空泛，并且与操作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理论不是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指导实践。从“七条对策”的理论价值来看，该对策提出的时机较为恰当，针对性较强；从大批高校教育专家参与对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来看，该对策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实践价值来看，该对策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操作性很强，最重要的是始终把学生作为教学质量提高的主体来加以充分研究，真正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都是我们高等教育在进行相关理论

研究和实践应用时应该加以总结和吸收的。

此外，如何在本科教学的质量标准上有一个基本的维度，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本科学生的划分由于院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的本科院校一般划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三种类型。而近几年来合并的高校和升格新建的本科院校，一般都是教学型院校，培养的学生都定位为应用型人才。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提出了多样化的质量观，尽管教学型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但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符合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其学术性、专业性和基础性特点不能有所削弱。目前一批新建的本科院校由于自身条件和老牌本科院校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师资力量方面差距更为明显，因此不少新建本科院校降低了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但是，本科培养的人才目标决不可以轻易降低。“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关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活动的一种预期。具体来说，它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社会需求和本科教育理念提出的关于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而这些基本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必须体现教育目的的根本要求，体现高等教育的一般要求，体现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① 因此，我们的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策略必须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要求，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动机，充分挖掘学生学习潜力的基础上，坚持培养目标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尽管我们也制定了不少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制度和策略，但对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的培养和尊重，充分挖掘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在尊重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差异方面，以及鼓励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方面差距明显，对学生的期望值也明显偏低。而美国的“七条对策”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始终以学生的主体性学习为中心，非常注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① 杨志坚著：《中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的培养，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很高的期望，鼓励学生自主和合作学习，这些都是符合现代教育教学规律的做法，也是我们的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应该充分关注和学习的经验。

二、我们有什么样的对策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看到了美国高等教育界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所做的努力，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对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把教育质量的提高维系在教学中的主体——学生——身上，这跟我们现在谈教学质量动辄就从客观环境找原因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息息相关，如何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质量，让学生在大学真正学有所得，并学以致用，确实需要大学根据时代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对策调整，并通过积极有效的对策调整，为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有鉴于此，根据我们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大批新建本科院校的实际，在借鉴美国关于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七条对策”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五条提高我们的本科教学质量的对策：

1. 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现代教育的发展变化促使教学行为由教师更多地转向学生，也就是说“教师可以为学生搭建舞台，排练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只能由学生去表演，当他们真正学习时，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应该接受赞美”。[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样性质的本科院校，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无疑是提高质量的关键。大学学习的显著特征体现为一种积极的主动学习，不断探究和发现。随着知识和信息量的膨胀，随着课程体系的日益严密和复杂，仅仅满足于课堂教学活动

---

① 〔美〕玛丽埃伦·韦默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洪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所提供的知识量是很难达到本科教育的培养质量标准的。本科教育只有培养类型的区别，没有培养标准的高下之分。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环顾中外大学，没有哪一所名校不是靠学生的积极主动的求学精神来奠定学校的质量基础，最终脱颖而出的。西南联大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之所以人才辈出，让后人景仰，就在于学生总是以积极主动的精神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对其本科毕业生提出的质量标准就包含着多项对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要求。例如，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观察不同的学科、文化、理念之间联系的能力；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等等。这些都充分强调了大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的下滑和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息息相关，教学缺乏了学生主体角色意识的积极参与，追求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是缘木求鱼之举。

但如何鼓励学生的学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现在的学生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知识面和信息接受的能力较之以往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能需要从我们的学习制度、学生的认知心理、学习习惯、学习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改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旨在建设性地建立起一种产品质量的观念；以学习者为中心并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上退缩；不是通过降低学习难度而卑躬屈膝地满足学生的要求；也不是不负责任地降低学术标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是要在课堂或校园内创设一种能提高学习效果的环境；它是以鼓励多学为目的的。”[1] 可见，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既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又符合社会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和期望。

---

① 〔美〕玛丽埃伦·韦默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洪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 鼓励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大学学习由于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学习是没有办法打开自己的视野的，因此大学学习特别应该提倡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教学相长”的原则，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可以搭建一个教学和科研的平台，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可以得到一个在相互信任之间的沟通和反馈，避免教学的盲目性。现在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太少，合作就更是凤毛麟角，教学活动只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缺乏了一种情感的交流，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经说过：“知识的传授必须经过教师的心灵加温，否则，教师的知识传授越多，学生就越冷漠。”如果教师只为金钱和职称奔波，学生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学校，那么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深，这样的学校要想提高教学质量是不可能的。

教学质量问题看似一个极其庞大的问题，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研究报告指出，学生往往只有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才能学得最好。同样的内容，无论什么主题，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学到的东西比接受其他教育方式学到的东西要多，记忆也会更持久，而且那些参与合作小组学习的学生对课程也会更加满意。此外，从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上说，鼓励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可以避免大学蜕变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加工厂和文凭发放地，使师生之间的交流成为合作的基础，而更好的合作又会进一步加深交流；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促使双方对教学采取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这也应该是任何一所院校都可以做的工作。“教学相长”、“亲其师而信其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实际都说明了师生之间交流和合作对提高教学质量的帮助。

3. 鼓励学生的自学行为，减少课堂教学时间

中国的大学生一直背着这样一个名声，即眼高手低，缺乏创新能力。这应该不假，但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生被课堂教学占用的时间太多，几乎没有自学的时间。在中国教育的传统思想中，“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举一隅而三反”、“严师出高徒”等等观点都预示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一直是教师的天堂，而不是学生的乐园。学生没有自己学习的空间，没有感悟和反思的时间，又何来课堂知识的升华和创新火花的迸发呢？所以我们的教育只会培养太多的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学生。

大学的课堂教学时间太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教师太习惯把持课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古训是那么牢固地统治了我们教师的思想，即使是到了今天，大学教学也大多是教师课堂讲授的世界，师传生受仍然是颠扑不破的教育法则。但是没有了学生自主的学习和探究，缺乏学生的主体判断，所有的知识不过是过眼云烟，很难在学生的心灵世界里激起一丝涟漪。因此，尽管我们的学生可能具有某一领域一定深度的知识，但却不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也不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意识。

所以，为了使学生学习的知识真正内化，真正使我们的学生懂得如何学习，如何创造性地学习，大学的自学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求知途径，并且应该是在教师精心指导下的一种科学和有序、有效的自学。

4. 鼓励学生作业和毕业论文的创新

大学生的学习需要得到教师的及时指导和评价，学习能力和学术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也来源于持之以恒的练习和实践，而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果，很重要的一个反馈源便是作业和论文（包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大学生的作业区别于其他教育阶段的作业的显著标志就是，应该充分反映这个学生勤奋的学风、扎实的理论功底、新颖的思想观点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一个学生是否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其作业和学术论文中就可见一斑。但现在我们教师布置作业的千篇一律和学生完成作业的大同小异都说明作业没有能够很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更谈不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改变这种局面最重要的是教师应该以更为开放和现代的教育观念来实施教学，以更为人性化的教学融入学生的学术训练之中。

因此，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应该是在学术训练上给予学生更大的自由度，给予学生更大的思维想象空间，多种措施鼓励学生的学术创新活动。不管什么层次的本科院校，都应该充分信任学生，对学生寄予信任和厚望，不低估学生的智力和潜能，这种尊重也会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使学生在学术训练中培养良好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德，让学生在具体的学术领域懂得基本的学术训练的规范，鼓励学生的作业和论文的创新也是避免学术欺诈行为的最好措施。

5. 充分尊重学生学习中的能力差异

教学要想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是关键所在。目前的本科课程，尤其是大量的本科导入性课程和概论性课程，学生在学习能力、兴趣、技能和目标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加上现在许多本科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能完全满足教学的需要，常常采用大班教学，并且由于人数过于庞大，教师很难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这就导致能力强的学生如果在课堂上得不到智力的挑战，会感到教学的枯燥和乏味，而能力弱的学生可能会被课程教学的内容难倒并失去学习兴趣。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能力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学习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各个本科院校基本都在实施学分制，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能力差异方面如何实施教学，可以考虑以下策略：（1）了解和确定所选课程的学生具备的知识水平要求；（2）在选课前，让学生判断自己是否已具备学习该课程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3）提供一份适合不同学术能力的学生阅读的书单；（4）设计不同的作业以适应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5）在班级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尽量按希望学生能达到的水平讲授课程内容。

美国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七条对策”对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本科教学质量的改进和提高有较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们应该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实际，提出我们的教学对策，应对教学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尽管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措施和对策很多，但如何使这些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体现出良好的效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学方法的守成与创新

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决不过分，这种发展无论体现在宏观还是微观，也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在呼唤、探索创新精神、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我们却很有必要认真地反思一下，作为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作为培养人的地方，我们的教学方法是否已经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在我们总是抱怨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时候，又是否反躬自省在教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呢？其实，看看现在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侧重宏观的、纯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多，而着眼于微观的一些诸如教学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提高等方面的文章却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大学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就更显薄弱。这和目前基础教育中高度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大学是不讲究或者不甚讲究教学方法的。实际上，在目前教学资源相对紧张，尤其是高水平师资紧缺的状况下，在强调人才培养质量的呼声高涨之时，必须承认，目前大学教学中，教学方法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滞后，已经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尽管大多数高校教师的教学态度较为认真，学科知识的掌握也较为扎实，但由于教学方法的“短板效应”，照本宣



科、因循守旧者众多，教学效果始终差强人意，这也是造成目前大学学风不理想的一个潜在因素。一句话，大学教学方法守成者众，创新者少，能够在教学方法中独树一帜、不断开拓进取者更是凤毛麟角。

造成当前大学教学方法从观念到手段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教育思想的解放从观念到实践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来消解落差，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研究和应用在大学客观上是不太被重视的。不少教师认为，大学教学方法是一种束缚人的个性的、教条化的东西，而大学是培养有个性的人的地方，既然要培养有个性的大学生，那么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是有个性的，完全不必苛求一致。而事实上，在大学教学充分尊重教师教学方法的自由选择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教学方法中一些共性的研究，造成一些符合现代教育思想、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的教学方法被忽略甚至遗忘了，不重视对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和运用，导致现在相当多的大学教师仍然是“满堂灌”、“填鸭式”教学的高手，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大学教师自身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务实的科学精神面对改革。试想，如果大学教师本身就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人，那又谈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再想想，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在老师那仿佛循循善诱，而实则窒息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教学方法的“熏陶”下，我们又谈何创新人才的培养呢？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被动地接受老师的智慧，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容易做到的，因为这样无需他们去努力独立思考，然而被动接受的习惯对于一个人的未来生活却是灾难性的。”如果鲁迅先生在20世纪发出的呐喊“救救孩子”还振聋发聩的话，那么今天所培养的大学生将要肩负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希望，是否也应该发出这样的呐喊呢？

分析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大学仍然还缺乏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环境，大学的管理者仍

然以“统治者”自居，大学教师也仍然以“学生心灵的主宰者”自诩，既然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得听什么，学生又何必劳心费神去琢磨知识孕育的深刻人生意蕴，教师一支笔、一册书、一本教案照样平平稳稳过多年，很少想过应该如何“授人以渔”的问题，这样的大学教学离学生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学生对大学缺乏一种热爱之情也就在所难免。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什么样子，大学也就会是什么样子，但大学不等于社会，至少在精神和思想上，“以学生为本”应该是大学飘扬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也应该是每一个大学教师心中飘扬的旗帜。很难想象一位教学观念和方法落后的教师，能上出符合现代教育观念、符合时代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好课，培养得出创新型人才。

其次，教学方法并不是孤立的或一成不变的。在许多教师的头脑中，常常一提“教学方法”，就会马上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方法。而实际上，教学方法不仅包括感性的，更多的是包含许多理性的东西在内的、综合的一种方法。教学方法是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中的一种全面的、科学的、民主的、辩证的教学思想。这种思想的精髓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训练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事实上，真正理解教学方法的深刻含义的教师可谓凤毛麟角，相反，倒是不少教师非常注重科学和知识的功利价值，只强调了知识的概念系统和所谓的完整性，而忽视了科学发展的思维特征，忽视了科学进步的批判精神，最终使得知识学习与思维发展分离。其表现形式就是教学中唯书本是从，唯教师是从，学生只能循规蹈矩、墨守成规地同意书本和教师的结论，而不能怀疑、求异。长期的训导，形成了教师对学生的绝对权威性，学生对教师的绝对依赖性，而学生与生俱来的独立性、怀疑性和创造性不但得不到尊重和发展，反而被销蚀得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谈大学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目前，我国高校四年制本科学生课堂教学的学时为 2 800 ~ 3 000，个别高达 3 000 学时以上，大量的教学时间仍然投入在课堂教学中。据一项毕业生的调查表明，有 30% 的学生认为，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当引起的。今天的大学，谈观念，改课程，搞学分，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直接关系教学质量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却始终收效甚微。可以这样说，再先进的教育理念，再合理的课程结构，再完善的培养模式，离开了教学方法的支撑和实施，最终也将会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因为教学方法承担着将预期的教学目标变成现实的教学结果的中介，只能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教学内容确定以后，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及其运用得当与否所决定的。因此，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是迫在眉睫的，也是教学改革中应切实抓好的关键环节。当然，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来促进教学改革并非轻而易举，这在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的难题。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高等院校并没有认真研究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也没有探究改善教学方法是否会有助于学生的学业。"也正因如此，对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才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一下现实可以发现，在知识高速增长的时代，试图拥有所有的知识绝无可能。明智之举便是教会学生怎样获取知识，也包括如何选择知识，无疑比单纯地让学生拥有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根据现代教育的知识观和教学观，教学便不是仅仅强调把确定的事实、系统的要领当做目的，而是更强调它们的手段意义，即把事实、概念、规则的教学，作为认识事物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主动探究的精神。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常面对的是不知道结果的情境，是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教师的教学方法是以启发、

讨论和提问为主，这时的师生关系是探究真理的伙伴关系，解决难题的合作关系。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获得对知识的深刻认识，在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面向未来的态度。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他能够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通过科学的，符合现代教学理念的、有规律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形成探求创新的心理愿望，形成一种以创新精神吸取知识、运用知识的习惯，能够帮助学生创造性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同时面对21世纪，教学方法改革的最基本的基石就是作为高科技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新理念的融合，“而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合理应用本身就要求同时变革我们习惯了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代之以尊重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原创性、反思性、合作性，以及相信人固有的强大学习潜能的全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①

中国有句老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彻底打破目前大学沉闷的教学气氛，改变呆板、僵化的教学方法，就必须从观念、制度和措施上下大力气，切实抓好教学方法的改革，真正树立民主、科学和辩证的教学指导思想。如果希望大学生成为创造未来的主人，希望他们成为知识丰富和有远大抱负的公民，希望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精神进行思考、分析，以及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能独立思考，那么，大学教学方法就必须在守成和创新中寻找人才培养的最佳切入点。

大学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

大学教育作为一个宏观而抽象的概念是较为复杂的，而大学教学作为大学的核心支柱之一，却具体而现实，其价值观念和实践取向对大学教育的发展，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

① 丁钢著：《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教育科学出版2000年版，191页。



在当代大学的理念有被大学的功能遮蔽、侵蚀的危险的时候，在大学教学一而再，再而三地退让于科研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时候，大学教学如何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担当起大学心灵守望者的角色，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严肃地告诫："在生活最紧张激烈的阶段，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力，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也在其经典之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深刻地指出："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它们的胳膊可能是健全的，而双腿却可能折了；它们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很能满足时尚，骨子里却是滞后的；它们在骨子里滞后的同时，也能像报纸和政客那样对时髦的话题侃侃而谈。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在目前中国大学都幻想一日千里的跨越式发展的时候，理智地反思和深刻地批判、剖析当前大学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无疑对大学的进一步和谐、有序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本节拟以大学教学为背景，对大学教学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大学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存在的问题，以及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意义和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大学教学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现代大学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是通过知识的传授、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不但使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社会化，而且还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各类人才，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大学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大学教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追求知识的过程，还是一个创新知识的过程，而创新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思维建构与完善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教学就是思维教学。因为教育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使人的

思想逐渐成熟、思维逐渐活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学会思辨过去、思考现在和思索未来。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掷地有声地说道：“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人活着的全部尊严和价值就在于思想！”试想一下，如果高等教育在教学观念和实践中本身就缺乏对人的身心全面发展的尊重和认识，尤其是缺乏对人的思维训练和建构的培养，那么大学教学如何奢谈对人的全面教育，大学教学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基础呢？

今天的大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和重视高等教育推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显性功能和作用，相反，对于大学教学应该体现出的育人的隐性功能和作用却有忽视之嫌，大学教学的非功利性和非盈利性色彩使得大学教学在经济主宰一切的现实面前曲高和寡。但是，大学这样的文化机构和其他文化机构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教育和培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大学发展相抵牾的时候，大学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教学的核心是什么？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去从事科研和为社会服务？大学还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旗帜吗？这些问题，大学要思考，大学教学也要思考。对于大学教学而言，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应尽之责，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让大学永远真正保持严肃性和把握理智，免犯荒唐的灾难性错误，要让学生在一个文化极其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并保持文化自觉的习惯，保持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并对其他文化有批判扬弃的信心、勇气和能力，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应该在大学教学中强调和坚持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使大学教学充满批判性的理性色彩，并通过这种批判性的辐射作用，使大学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和理智，只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学才能成为引领社会的精神领袖。要想使我们的学生成为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具有理性批判意识和精神的公民，那么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就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今天的大学教学中不能回避和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二、大学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存在的问题

大学教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探究，而探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否定、批判和反思的过程，“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无疑是对这种过程的最好诠释。批判性思维源自大学的批判精神，而大学的批判精神是大学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大学从自身的理想出发而体现出的对待大学实践和现实社会的态度，是大学对自身的责任、使命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和追求。批判性思维是大学批判精神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按竺可桢先生所言：“你们（大学生）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几点是做领袖所不可缺乏的条件。”如此看来，批判性思维就是一种不肯盲从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思维。大学作为一个讲究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家园，批判性思维应该是大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和核心表征。

但是，批判性思维作为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不可能在具体的教学中以线性的、简单化的形式呈现，或者仅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教学元素就建构起来，它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中国的大学教学还没有完全形成能够充分体现这种合力的环境。

首先，从当前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尽管高等教育已经把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总是强调内敛和自省，讲究整齐划一和循规蹈矩，文化传统中缺乏批判意识的积淀和批判精神的着力点，因此对文化和知识的创新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难以付诸实践。这种传统文化精神长期的熏陶使得大学教学总体上还是习惯于一元化的单向师传生受模式，对静态的知识的认可度远远凌驾于动态的思想层面之上，师生的批判精神在封闭的教学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过滤得一干二净。教学中没有了思想的张力和思维的冲击，

又谈何创造性的灵光乍现，最终大学教学的批判性思维的习惯性流产也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从大学教学的主角教师一方来看，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工作环境都被清楚地定义为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课程目标，“教师舒适地藏身于熟悉的学院或课程的洞穴里，极少肯伸出鼻子来嗅一嗅从其他教学地带吹来的风，他们相信没有人会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事，因此认定他们跟其他背景或领域里的教师不会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他们声称自己教的是系统的知识、特定的技能或必修科目的课题，并且宣称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学生身上培养这些知识技能……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这一小片教学领地以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①]这种教学观念统治下的教学场景使相当多的大学教师只重视“授业”和“解惑”，而无视、漠视知识传授中的“传道”精神的熏陶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师的教学从表面上看，知识传授是系统和规范的，严谨和合乎逻辑的，但这样亦步亦趋的教学更多的是把学生视为客观存在的“材”，而不是视为主观能动的“人”，很容易导致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丧失和批判精神的流失，大学教学也就蜕化为简单的中学知识教育的延续而缺乏大学教学应有的思想深度、广度和力度。教师教学的闭门造车背离了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中心，更是思想和批判的中心的原则和宗旨。因此，如果大学教师仅仅把自己定义为在某些狭窄领域里传授教学内容或技能的专家，“他们实际上是剥夺了自己的一个意义更为广阔的身份——作为促成变化的动因，去帮助学生塑造他们所居住的世界”。[②] 所以大学教师自身就应该是一个具有批判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的人，学生要从教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应该看到教师用什么样的眼光和头

① 〔美〕斯蒂芬·布鲁克菲尔德著：《大学教师的技巧》，周心红、洪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5 页。

②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徐小洲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 页。



脑面对与剖析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

再从学生一方来看，基础教育为高等教育人才的储备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但是由于基础教育长期过分强调应试教育的选拔和评价效果，以至于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开始了严格的分科教育训练，教学中的灌输训导模式迫使学生习惯于盲从、服从和认从，而不能、不敢怀疑和质疑，过窄的知识视野和固定、机械的功利培养模式导致学生批判精神的过早丧失和人格精神的过于早熟。加之现在的大学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功利化主义的盛行，学生的思维本身就趋向于现实化和功利化，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过早缺失使整个大学教学弥漫于一种循规蹈矩的程式化氛围之中，使得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举步维艰。

但是，人才培养的工作难度本身就是对大学办学理念和大学责任感的一种检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大学存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机构的象征。在社会矛盾日益多样化和尖锐化，经济意识逐渐侵入并占据了所谓主流生活话题的时候，大学培养的学生还有没有一种积极思考、反思的习惯和能力，有没有一种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有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首先取决于我们的大学教学有没有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高等教育的价值远非只停留在对民主模式的设计和维护方面，它还有更深层的价值。大学以及其他文化社会机构确保了一个社会享有共同的回忆……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痛苦的回忆与庆典一样共同构成了其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我们在此基础上构筑未来。”① 所以，如果我们还承认大学是一个批判的中心的话，那么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面，任何患得患失的想法都会使大学受到不应有的伤害。

---

①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蒋凯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三、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所谓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东西进行谴责，或抱怨某种方法及其他东西，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既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遍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努力。”① 有鉴于此，尽管批判性思维的建构绝非朝夕之功，但毋庸置疑的是，大学应该把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教学中认真地面对和思考。大学需要关注个体的发展，那么对于个体来说，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何意义和作用呢?

首先，批判性思维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大学生最为典型的认知性功能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以及生活体验的加强，大学生们开始对从小所认定的许多生活准则和普遍真理产生怀疑和进行反思，由此可能陷入一种困惑、迷茫和矛盾之中，选择什么和为什么选择成为一个两难的问题。有些选择是协调的，有些选择是冲突的，那么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学教学批判性思维的建立和巩固对学生来说是必要的和必需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批判性思维是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思维元素，也是一个人将来的生存之道。尽管这种思维是抽象的，但是它对人生的指导却是具体的、实际的。人生的跌宕起伏，工作的变幻莫测，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当人们想努力搞清身边的各种密切关系时，如果不能批判地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及坚信地支持这些行为的基本理念，情感上就是不健全的，行动上也是盲目和缺乏理智的。大学教学就应该在这些方面帮

① 赵婷婷著：《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与协调》，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0 页。



助学生理解并认识批判性思维的积极意义，建立和健全这样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在面对职业生涯的不可预测性时，能够明辨眼前这个工作场所赖以存在的那些前提是否有效与准确，并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知的世界。

再次，批判性思维是今天的民主社会必需的一项政治素质。民主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大学生作为民主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民主化进程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从大学教学中汲取批判精神，通过批判性思维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实施必要的监督、修正和引导，维护社会的民主精神，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教学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

尽管大学教学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并不能就此忽视，甚至否定批判性思维对于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相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一目标应该覆盖整个高校的教学，跨越不同的课程背景、教育环境和教师所属的学术身份，进一步明确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可以单纯的、分门别类地进行教授的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所有大学教学活动的基础，是检验大学教学质量的试金石。因此，大学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去“哲学化”倾向对大学教学的影响

现代大学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火种已近千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社会角色跻身社会的中心是社会和公众对大学的认可，也是对大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褒奖。21 世纪的大学，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降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成为对现代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特殊的社会机构。与此同时，现代大学也从最初的一个单纯的教学机构演变成了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体的庞大社会组织，大学教学的内涵也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大学的各个方面延伸。尽管现在的大学教学受到大学科研和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种种挑战，但大学科

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大学教学当中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大学服务于社会则得益于大学教学中的知识性基础，因此，大学教学在今天仍然可以视为整个大学活动的中心，是大学的核心功能，也可以说大学教学决定了大学科研和大学服务于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对整个大学的发展，尤其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目前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质量有了更多层次和更多样化的要求，对大学教学作了较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解读、分析和规定，但大学教学在目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实用主义的行为取向的影响下，大学教学的去“哲学化”行为对大学丰富育人功能的弱化日渐显现。因此，目前大学教学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才能恢复其本应具有的丰富育人功能，让大学教学回归真正的大学教学，这无疑是当下大学教学改革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大学在近年来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各种物质条件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却缺乏对中国大学未来的长远而深刻的思考。就大学教学的具体情况而言，就是大学教学缺失了一种丰富的育人内涵，教学中缺乏了一种坚定的理想指向，过分注重现实和经济效益，崇尚实用而放逐理想，这也正是大学逐渐滑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淖的重要原因。从宏观角度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多年来最大的失误之处就是一直缺乏真正的大学理想和崇高的哲学价值取向，没有认真思考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代表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灵魂。相反，大学更关注的是教育如何带来中短期的丰厚收入和名声效应，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和大学理想的崇高化之间的强烈反差，以及经济利益和教育现实的巨大落差，迫使大学抛弃了理想而成为社会风尚和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这样的教育现实，使得大学教学活动中的去“哲学化”倾向愈加突出，悠久、优秀的哲学思辨传统逐渐被实用主义解构和经济利益消融，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色彩日趋浓厚，大学教学没有



认真履行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和未来，批判现实和关爱社会民众的职责。大学，一个曾经无比崇尚理想与精神，追求不懈与批判深刻的地方，今天却蜕化为弥漫着虚无和庸俗气息的场所。大学屡遭诟病从表面看似乎是社会流俗之弊的影响，实则是大学教学放弃了哲学思考和哲学追求的必然。可以断言，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了哲学精神和哲学思想作为大学的约束力和内驱力，大学一定会成为时代的附庸而绝无生命力和创造力可言。

哲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和对人类未来的期待。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哲学就是大学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的沃土。大学教学之所以和哲学息息相关，是因为哲学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事物作一种整体性的联系、分析和阐释，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一个概念和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最主要体现为反思和批判。而作为大学核心功能的大学教学，对于真理的追求和思考也是一个持之以恒、永不停歇的过程，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批判，这和哲学的追求异曲同工。而大学教学自身有可能被有限的世界观限制住，以致无法超出自己语言的概念和有限的经验来看世界。因此，作为大学活动主体的大学教学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充满了哲学思考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正在于它对哲学生活的敞开，对整全和无限的追求，以及对人生最高知识的追求。因此，如果说这是大学之为大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不妨说大学教学不仅是一个充满反思和批判色彩的哲学思辨过程，更是一个把个体人格引向卓越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得以丰富和锤炼，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和拓展。

进入 21 世纪，大学还能不能继续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担纲者和人类福祉的传播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物质的丰富或匮乏，也不是社会的急遽变革或稳定，而可能是缘于大学的思想匮乏导致其日趋平庸化，从而再次沦为社会的边缘角

色而失去活力。回顾中外那些有卓越建树或影响深远的大学，无一不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驱者，而绝少有视金钱和名利为大学最高理想者可以成为社会的领袖和良心。因此，大学从走入人类社会的那天起，其精神内涵就注定其将扮演人类文明传播者和文化创造者的角色，而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思考和反思、探究和批判已经凝练为大学精神的核心，也正因如此，大学教学所具有的强烈哲学色彩，使大学成为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的推动者。而实际上，在大学发展的历程中，大学精神的哲学化和大学现实的世俗化之间始终存在强烈的张力，大学发展的过程，也是大学的“哲学化”与去“哲学化”之争的过程。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大学教学的哲学化特点呢?

首先，大学教学应该是一个充满不断反思色彩的过程。大学发展到今天，历经磨难和艰辛，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绝非偶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大学始终是一种思想的源泉，尤其是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思想张力息息相关的。大学诞生于人类社会之中，但又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使自己的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至受到尘世的玷污，这就需要大学拿出勇气和信心进行认真反思，并通过具体的教学行为捍卫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尊严。因此实际上，大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反思的历史，大学的教学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反思色彩的过程。

大学教学在进入21世纪以后，面临空前的挑战，大学教学的模式，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生逐渐从教学的边缘走向中心，教师开始更多地承担指导者和合作者的角色，角色的互换证明了教学模式趋于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这应该是顺应时代和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大学教学又不同于一般的教学过程，它是一个师生不断反思的过程。反思不仅仅是教师的个人行为，也应是学生的积极行为，更应该是大学的整体行为，因为只有不断反思自己，才有可能使自己做到从善如流，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对人的全



面教育。但随着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强力介入，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和物质占有的极度渴望，教学对人的全面而深刻的教育价值取向有被异化和物化的危险，大学教学有可能沦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幌子，甚至教与学的关系都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名与利的关系。弗莱克斯纳就指出：“为了扭转这种倾向，阻止大学向机械性或技术性专门化趋势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大学靠的是思想和伟人。”① 可见，大学教学反思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不断认识自我，才有可能走出故步自封的狭隘境界。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法国16世纪的思想家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大学作为一个专业众多、学科众多、思想交锋尤为激烈的地方，如何认识自我是大学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但是，在今天的大学教学活动中，这个培养人如何对待人生、知识和世界，以及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反思和探究的关键环节却消失了，对真理的追求和精神的弘扬成为浅尝辄止的过程。反倒是众多非教学的因素介入了大学教学之中，导致大学教学的各个环节散发着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气息，教师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教与学在知识的传递过程中本应秉持对知识所赋有的理想和精神的追寻，但由于缺乏心灵的加温和灵魂的触摸，使得大学教学越来越贴近现实和实用，而离人的精神和灵魂却越来越遥远。哲学生活的深刻意义本是能够使人在一个艰难的岁月里仍然保有探寻真理的勇气和信心，西南联大即是最好的诠释。但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快速发展和精神快速萎缩的时代，大学教学却有放弃对哲学思考和追求之嫌。大学教学的去“哲学化”倾向，无疑使得大学的核心功能遭到削弱而更加走向世俗化和浅薄化，同时使得整个大学的功能随之紊乱，面对社会的变革缺乏应有的自信和定力，以至于只能唯社会的变革马首是瞻。

---

①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其次，大学教学应该是一个充满批判色彩的过程。教学活动的反思特性决定了大学教学应该具有的批判本质和批判精神。批判性色彩是大学教学应该具有的色彩，大学教学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也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哲学的批判精神，是一种“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精神，那么大学教学也是“发现”和“提出”的集中体现。大学教学从本质上说，不仅仅是传承已有知识，也不仅仅是对已知知识的重现和复制，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开拓创新成了今天大学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没有“发现”和“提出”，又何来知识的创新可言？大学教学活动实际就是一个通过批判和质疑而不断创造、创新的过程。

但是，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很容易把大学的科学研究视为一种批判和创新行为，而对大学教学活动却往往把它视为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这也是今天许多高校重科研、轻教学倾向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学教学中，忽视诸多情感因素对教学的影响，比如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缺陷，直接导致了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和判断力的缺失。现在的大学教学，教师满堂灌仍屡见不鲜，学生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敬畏有加，而对质疑和批判却退避三舍，本来极富有批判精神的大学教学却演变成为一种简单的师传生受的知识逻辑关系，而这种单一的思维训导模式使得人在知识面前自觉、主动的哲学思辨能力丧失殆尽。因此，从实质上看，这种大学教学的去“哲学化”倾向有把人导向思维钝化的危险。现在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在大力提倡创新和创造，另一方面却又在做釜底抽薪之事，不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注意人的自由精神的培养，尤其缺乏培养学生敢于探索、勇于追求、不惧权贵的批判精神。因此，现在的大学培养了太多的唯上和唯尚之人，而少有唯实和唯事之人。大学教学的去“哲学化”倾向使得大学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化之中，而批判功能的丧失使得大



学培养的人具备经济时代的种种特征，却对社会的各种弊端熟视无睹，成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而非健全的社会人，不具备社会和公众责任意识，也丧失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大学在制造人，而非培养人，在这样一个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代，大学变得随遇而安，成为一个社会的旁观者而无心、无力引领社会的前进。

大学发展到今天，大学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需要激情、理性，更需要智慧和思考。大学教学讲究技巧和方法，但也更讲究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融入和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在精神世界里，大学教学和哲学思考总是如影随形的，因为哲学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哲学也一直以探寻人类未知的世界为己任，哲学是追寻真理的学说无疑与大学对真理的追寻异曲同工。大学不仅要崇尚和追寻真理，也要通过实践证明和丰富真理的意义，推动真理的发展。同时，大学教学的过程是复杂的，对大学教学采取一种简单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做法都会对大学造成巨大的影响。在目前高等教育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尤其是高等教育笼罩在过分商品经济化的阴霾下的时候，大学教学尤其需要思考，甚至是深入哲学思考去帮助学生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大学中，许多学生带着他们某些一直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宗教、道德、政治和个人观点进入大学，在随后的教学活动中却碰到了思想的墙壁，那些从小到大都坚信不疑的观点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对那些尚未做好理智准备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了，于是开始了思想的抵触和防御，在此过程中，学生会为某件事情争论不休，有的学生为此甚至产生了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时候，大学教学需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心灵发育，关注在学生信念地基坍塌之时，如何使科学知识和哲学思考能够相得益彰、深入浅出地深入他们的思想，使学生能够以一种更为坚定的自信重塑自己的人生信念，毕竟一个缺乏信念的人是很难对世界和人生作出准确和长远判断的。大学教学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义

对人的影响决不是虚无主义的致幻剂，更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抛弃和价值扭曲，而是体现为对人生的精神启蒙和价值影响，使学生不至于在一个忙碌而盲目的时代里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成为一个真正的“全人”。因此，在大学教学的去“哲学化”倾向影响下，大学教学必须具有重塑自身的勇气和信心。只有让丰富的哲学精神回归大学教学，大学教学的基石才不会因空洞而坍塌。

综上所述，21 世纪的大学生活在高度经济化的社会之中，不应该成为一个经济时代的代言人和传声筒，大学既要有一种社会的亲和力，又要有严肃的哲学思考和哲学理想。唯有此，大学才能成为无数人精神寄托的家园，也才能超越社会成为时代的旗手。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教学需要审视什么？如何审视？特别是应该引导学生过一种什么样的“值得过”的生活呢？这是今天的大学教学无法回避的紧迫问题。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精神惶惑的时代，哲学的真正使命应该是对人的灵魂引导和精神启蒙，而大学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于此。

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教学质量的提升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充分满足国民受到较好的高等教育的愿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和科学素养，近十年来进一步加快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到 2009 年，全国高等教育的平均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24% 以上，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突破 2 600 万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是，在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对高等教育在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处理质量、规模和效益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更好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在目前高等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



现有教学资源，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使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阶段能够有坚实的质量基础，避免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造成人才质量的下滑。人才质量问题，这是目前高等院校，尤其是大批的新建本科院校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全国大约有260多所教学型本科院校，其中新建本科院校210所，占教学型本科院校总数的80%”。[①] 而随着大批新建本科院校陆续合并组建完成，学校升“本”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保证人才培养的目标得以实现。而目前制约大批院校教学质量提升的最大瓶颈就是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处于学科教学前沿、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学科研究能力的教学带头人就更是凤毛麟角。客观上讲，这是因为大批新建本科院校大部分都是刚从专科升为本科，原有师资长期从事的是专科教育，但随着学校的整体升本，教师问题也就只能服从学校的整体办学实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加上大规模扩招之后，教师流动性增强，教学效果好、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很难在新建本科院校里扎根，往往被一些教学条件较好的院校挖走。虽然各院校也在近期内补充了大量的年轻教师，但由于新教师的培养和成长需要较长的周期，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新建本科院校在教学方面举步维艰，教学质量的下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阶段，影响高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因素众多，许多高校过分追求规模效应，忙于应付各项评估检查，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这些倾向已经削弱了本科教育教学的质量，偏离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基本宗旨，缺乏对学生实施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教育，而这种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体现在高质量的教学过程中。如果忽视教学工作，就会动摇人才培养的根基，

---

① 杨涛、王兴林、董文胜：《新建本科院校发展之路探索》，载《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第61页。

进而影响到整个高等教育的健康和快速发展。因此，牢固树立“教学是高校的中心工作”的观念，把提高教学质量视为学校的生命线，是高校的基本信念和职责。而高水平教学团队的建设，无疑对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意义深远。教学团队的建设是教育部根据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为了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而采取的一项教学改革措施，也是推进“质量工程”建设的重要举措。

教学团队，顾名思义，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整合教学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师资力量，以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为核心，形成教学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根据选定的一个较高和前沿性的教学目标，通过一定周期的建设，使学科教学始终保持较高的教学水平，形成较为鲜明的教学特色，对人才培养起到辐射作用。更重要的是，教学团队中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较高执教水平的教师能够对年轻教师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以及能够最大限度地起到激励和示范作用，对于整个团队的教学水平，尤其是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作用明显。因此，在目前各个新建高校师资力量匮乏，尤其是优秀师资极为匮乏的现实面前，教学团队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弥补师资力量不足的很好举措，同时也是本科教育更加重视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信号。

但是，由于新建的本科院校在办学条件，尤其是在人才厚度方面，和老牌本科院校相比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许多本科院校在“升本”以后，忙于硬环境的各项建设，而对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和传统院校在教学水平和人才质量上的差距。因此，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必须要把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团队的建设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教学团队在专业建设方面的带头和示范作用。而要抓好教学团队建设，首先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一、教学团队建设存在的问题

1. 高水平教学团队组建的心理问题

对于新建的众多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优秀师资稀缺，在办学水平，尤其是教学水平方面，和高水平院校相比差距明显。而这种差距很容易造成新建院校在组建教学团队的时候，教师产生种种自卑心理，觉得很难占据本科教学制高点，对教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进，很少甚至不能对整个本科教学有自己的一种主动性的认识，教学中的话语权被传统院校所控制，整个专业的教学，实际处于边缘化的角色。这种现实，造成新建院校对组建高水平教学团队的信心不足。这一方面说明新建本科院校在目前的教学中还面临很多的困难，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总是简单照抄和模仿其他院校，或者一味向传统的老牌本科院校看齐，缺乏自身的教学特色；但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新建本科院校教学水平偏低，也和缺乏高水平的教学团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工作，能够直接反映整个院校或者专业的建设及发展水平，教师教学水平也直接影响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人才培养更是至关重要，所谓“名师出高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目前大多数新建的本科院校的教学水平状况参差不齐，教学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新建院校也应该充分看到自身的优势，由于学校定位更贴近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整个学校的培养目标更接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教学团队的建设有利于整个专业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学科教学优势，有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也有利于形成和传统院校不尽相同的学科教学特色。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新建院校要树立自信，突破心理障碍，建立起强烈的竞争意识，通过自己的努力，选准教学中的突破口，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通过审时度势地分析自身教学的优缺点，使教学团队的组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和传统

本科院校在教学上形成一种互补，为完善本科教学多样化机制作出应有的贡献。对于新建院校，教学团队的组建既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必须在心理上打破一种强者通吃的思维定式，尽力改变原有的单打独斗的教学模式，真正把高水平教学团队的建设视为学校和专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并通过教学团队的组建，树立新建院校广大教师的自信心。而只有克服了心理障碍，才有可能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扬长避短，准确定位，取得教学团队建设的成效。

2. 教学团队的教学目标定位问题

教学团队的定位问题是一个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新建的许多本科院校师资力量都较为单薄，如何根据专业发展实际，以教研室、研究所、实验室、教学基地、实训基地和工程中心为依托，以课程和专业为建设平台，在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中形成一支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梯队结构，老中青搭配，职称和知识结构合理，并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学团队，这是整个教学团队建设的基本前提。新建的本科院校大多定位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培养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是这类院校的培养目标，而由于新建本科院校的各个院、系、所规模都偏小，往往以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组建教学团队的。它需要很好地利用整个专业的力量，通过合理整合，使学科教学的特色更加具有交叉性和兼容性。由于教学团队的建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受到办学条件的限制，因此，组建什么样的教学团队需要学校从整个教学的实际出发，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一些新的学科发展的信息，保证教学团队的组建具有超前性和针对性，使整个教学团队的组建能够实现一种超前发展，确实起到整个专业教学带头的示范作用。此外，教学团队的建设是一个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只有既审时度势、科学规划，又精心组织、认真实施，新建的本科院校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3. 教学团队带头人的遴选和梯队建设问题

由于整个教学团队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带头人的水平和敬业精神，因此，带头人的遴选至关重要。不仅要选择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还要在管理水平、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先进的教学理念等方面充分考虑，使遴选出来的教师能够在教学上始终处在领先位置，并带动教学团队有序、有效地发展。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教学带头人应该非常明确如何更好地指导年轻教师，使年轻教师能够选准专业教学的突破口，在短期内形成自身的专业教学特色。能否在教学团队建设周期内，使一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这是带头人应该明确的最基本职责。

但是，由于新建的本科院校本身师资力量的局限，高水平的教学人员偏少，因此在遴选带头人的时候，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足自身培养，从韬光养晦的角度出发，选择在教学能力、教育理念、教学研究、课程建设等方面较有潜力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尽力为带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职称晋升、教学经费、学习进修、工作量核算方面予以适度的倾斜和扶持；二是积极引进人才，借船出海，可以考虑在创造较为良好的教学条件的基础上，聘用其他院校的高水平教师来担当教学带头人，通过言传身教，使自己学校的年轻教师获得较快的成长。教学团队的建设说到底必须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带头人，学校应该给予相当的政策倾斜，尽量为团队带头人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切不可急功近利而使教学团队的建设半途而废。

此外，教学团队建设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促使和加快青年教师的成长，实现优质教学的接力。因此，学校在组建教学团队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和科学规划教学梯队的建设问题。在教学团队的建设过程中，学校要多方面营造一个良好的青年教师成长环境，要舍得在青年教师的成长中花力气和多投入，在教学梯队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要做到合理和完善，尤其要注意使团队

成员在教学中具有一种互补性，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有利于青年教师形成自身的教学特色，不至于因思维定式而形成千人一面的教学风格。

二、组建教学团队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以上简要分析了新建本科院校专业教学团队建设中可能会遇到的若干问题，而通过研究和分析，最终目的还是要尽快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措施和办法，从而使新建院校在教学团队建设方面能够有新的突破和起色。根据新建院校的普遍情况，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应该包含以下三种选择：

1. 选择具有特色的教学突破口

组建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学团队是一个较为庞大的教学系统工程，除了整个专业必须高度重视团队建设以外，它首先涉及专业教学团队如何选择教学突破口，也就是专业教学团队教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对于新建本科院校而言，由于自身所处教学环境的限制，对于目前专业教学发展的整体性、宏观性，尤其是教学的前沿性问题都还缺乏具有深度和全面的把握。因此，对于新建院校的教学团队的组建，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一定要有意识、主动地选择一个适合教学实际的，并具有一定新颖性和学术价值的教学方向来实施整个教学团队的组建。由于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重心下移，学校可以更加直接地为社会经济服务，因此教学团队专业教学的突破口就应该特别着眼于区域性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立足于培养有鲜明学科特色的、能够带动整个学科发展的教学团队。既然新建的本科院校大都定位为应用性的，那么，如何体现应用性特色，特别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能够体现学科教学的特色，首要的就是需要教学团队选择具有特色的教学突破口来带动整个团队的发展。

具体来看，教学工作作为整个教学团队建设工作的核心，也是衡量团队水平的最重要标志。它不仅需要带头人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整个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也应该是一流的；



它需要整个教学团队始终保持学科教学的前沿性、科学性和针对性，需要对实际教学有很强的指导性，同时具备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能够把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较强学科教学优势和竞争力的教学团队。团队建设的教学特色，首现就体现在如何看待教学工作，是否深入了解学科教学的现状，能不能持续追踪学科教学发展的前沿问题，教学内容是否符合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实际。而教学方法科学，教学手段先进，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特别是在教学中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积极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这是整个教学团队教学质量和教学特色的最好与最终体现。与此同时，通过相应的建设周期，教学团队要逐渐形成完整、有效、可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监控管理措施，以此来充分保证教学实施的有效性。由于团队建设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一些看似平常的教学工作，都必须进一步规范化和有序化，才能保证教学工作持续地高水平开展。在某种程度上，教学团队的建设也是对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能否持之以恒的考验。

2. 选择先进的教学理念作为支撑

教学理念选择的先进与否，决定了整个教学团队建设的水平。毕竟教学团队反映的是整个专业教学的最高水平，选择既符合教学实际，又符合教学发展规律的教学理念作为支撑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基础，是教学团队建设的必要前提。

教学团队，首先就必须要考虑教学的质量和教学的效果，而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必须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大学教学是一种专业教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但更必须具有科学性。对长期从事专业教学的教师而言，很容易囿于学科和专业之见，缺乏一种长远的学科建设规划和教育教学改革思路，容易满足于长期教学积累的丰富经验而缺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力。因此，教学团队的建设也是一次教学理念变革的过程，它需要整个教学团队具有很强的教育科学研究的水平和

能力，不满足于现状，积极从事教育教学改革，始终坚持用科学的教育理念指导教学。教学团队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以科学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理论作为支撑。教学实践和教学理念应该成为教学团队建设的两翼，只有两翼齐飞，才有可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教学理念对教学方法、教学思路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就直接影响着教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一个优秀的教学团队，在先进的教学理念支撑下，不仅教学水平应该是一流的，其教学研究水平也应该是一流的。

3. 选择高水平的管理作为教学团队运行的润滑剂

专业教学团队的人员较多，建设周期较长，所涉及的工作面较宽，没有良好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是不可能保证教学团队建设的有序开展的。教学团队的建设，一方面是要培养高水平的教学名师，另一方面是要培养优秀的教学管理人才。因此，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必须充分考虑管理对团队建设事半功倍的影响，也必须牢固树立通过管理达到教学建设目的的观念和意识。这应该不仅仅是团队带头人的责任，也应该是所有团队成员必须具备的观念。同时，由于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特殊性所在，选择符合团队建设实际的管理机制和模式同样意义重大。教学机制的良好运行，教学人员的合理流动，教学方法和质量监测手段的丰富和完善，教学绩效的认证和考核，教学成果的总结和推广……都离不开管理工作的支持和协调。因此，整个专业教学团队要像一部机器良好运转，管理就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需要引起团队建设者的高度重视。

此外，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和职能的多样化，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教学团队面临的管理问题也会随着团队建设周期的延伸而愈加突出。而完善、健全的管理制度是教学团队建设质量的基本保障，规章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是保证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手段，而规范完整的教学档案，是科学管理的重要体现。因而加强教学团队管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也就显得日益重要。“向管理要质量，向管



理要效益”，就充分说明了管理的重要性，也是整个教学团队建设成败的关键。

总之，新建本科院校在组建教学团队时，将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在目前办学条件下，新建院校要组建高水平教学团队困难确实很大，但教学工作的建设始终是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和头等大事，只有以超常规的热情，付出超常规的努力，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来抓好教学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才有可能奠定教学的良好基础。总结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学术大师或高水平名师加创新团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学模式，也是提高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的关键。作为新建的本科院校，更加应该高度重视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并把教学团队的建设落到实处，真正体现教学团队对整个专业建设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新建院校教学团队的建设目标，概括起来就应该是：教育理念先进，教学水平一流，教学模式科学，教学管理规范，人才培养突出。

大学的发展永远取决于思想的创新和人才的涌现，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教学，对教学质量的要求也就决定了人才质量的要求，在这方面，新建院校教学团队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我们只要承认教学对学生的重要影响，那么，“我们需要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教学成为让人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①

注重和尊重教学学术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大学的规模、结构、特色、质量等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而困扰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头等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 页。

大事就是教学质量问题，毕竟在教学质量这个敏感的话题上，各个院校皆面临诸多问题。为此，各个院校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相继制定和出台了诸多相关的措施和制度，希望借此来保证教学质量的逐步提升。但是，由于教学质量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包含许多变量的综合性因素，寄希望通过某一个环节的改善来全面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深化的过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既需要充分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又必须结合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实际，选择合适的改革途径和措施来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所谓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第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以经济和社会需求为动力并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力资本需求提供服务；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营造自主、自由、宽松、和谐、从容、安静的环境，为多样化、个性化、有思想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开展创造性、思想性工作提供保障条件；第三是高等教育的绩效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非物理性、外部性和历史性；第四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思想传承和文化传统。因此，在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夯实学校发展的基石和学校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设立教学优秀奖，鼓励教师教学争优创新

目前许多新建的本科院校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尽快缩短与传统老牌本科院校的差距，都加大了对学校基本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了对科研工作的投入力度。由于科研工作和成果的外显性特点，很容易形成轰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对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宣传作用。而教学工作由于自身工作长期性、内隐性特点的限制，很难像科研工作一样出现轰动性效应，加上长期在中国大学形成的注重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忽视和弱化教学工作的传统因素依然普遍存在，同时，晋职晋级对科研工作的过度倾斜，



使得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很难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但教学工作厚积薄发的特点，尤其是教学工作对学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又迫切需要我们切实转变教学观念，更多地关注教学工作，更多地关注教师的成长，更好地凸显教学工作的业绩。因为只有教师的成长和付出，才有学生的成长和提高；只有教师教学工作中的创造性和思想性得到充分的认可，才有可能使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得到培养，也才能促使教学质量得以稳步提升。实际上，在整个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新建院校由于本身学术基础较为薄弱，把科研作为突破口并非所长，也难以在短期有大的作为。而只有把教学工作视为突破口，真正调动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尊重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付出和努力，才是真正找到了教学质量提升的抓手，也才是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最好体现。

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耶在长时间考察了美国大学的学术状况后，在其1990年出版的《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中提出：学术不只意味着进行研究，它应该包括四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即探究的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整合的学术（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应用的学术（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和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我们还要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以促进学术之火不断燃烧”。[①] 从这个意义出发，新建院校有必要给予“教学的学术”以高度的重视和研究，制定相应政策对教学成绩优异、教学贡献突出的教师进行表彰和重奖，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创造精神，鼓励教师更多地把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来。奖励不是唯一的目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调节杠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只要尊重教师的教学工作，建立合理和长效的教学奖励机制，使关心教学、关注教学成为

① 潘金林、龚放：《教学方法改革：美国研究型大学酶教育改革新动向》，载《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10期，第87页。

学校工作的主流，那么可以肯定，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二、建立教学名师工作室，支持教学交流和带动青年教师的成长

由于历史原因，较多的教学和应用型大学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广阔的学术视野，占据学术前沿和教学制高点的领军人物不多，而新进的大批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又亟待提高，教学急需大批富有经验的高水平教师与整体教学水平偏低的矛盾，成了制约众多本科院校教学质量提高的“瓶颈”。这种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思路，改变单兵作战、画地为牢的教学和管理模式，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使有限的优质教学资源得到合理和高效的运用。为此，应该采取的一个积极措施，就是集中学校的优秀师资，建立“教学名师工作室”。

“教学名师工作室”，顾名思义，就是学校通过对现有教学资源的整合，把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能力一流、教学研究水平突出的教师集中在一起，形成一支在教学方面领军和示范的团队，对学校整个教学工作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教学名师工作室”的设立，首先有利于打破目前学科分割的局面，使不同学科的教学名师能够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使不同学术背景和教学风格的教师能够实现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等都可以得到更多取长补短的机会，打破了以往各个专业学科的教师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很少往来的陋习。在目前，大学教学跨学科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显，更需要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实现学科教学的真正交流和融合。其次，名师工作室建立最重要的意义，是对于青年教师的成长有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价值。现在，很多学校引进了大批的青年教师，相当多的年轻教师都缺乏教学实践经验，而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很多青年教师仓促上阵，教学效果达



不到教学的实际需要，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青年教师成长的信心。而如果学校有计划地通过名师工作室的培训、培养，青年教师就可以感受不同的教师所呈现出的最真实的教学风采，从中汲取极其有益的教学营养。通过这些教学名师的言传身教，对青年教师的触动和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因为绝大多数青年教师是积极上进，很想有所作为的。而在青年教师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有名师的指点和帮助，既避免了空对空的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脱节，又对他们教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针对性的引导作用。

当然，由于各学科教学差异性较大，教学方法的运用也肯定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要把各个学科的名师集中在一起，开展教学教研工作，确实需要克服一些现实的问题。而根据学校的办学实际，可以把名师工作室设在学院下设的教师教育中心，或者挂靠在教务管理部门，通过学校制定政策和制度来加以扶持和资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新教师都应该接受名师工作室的系统培训，并建立相应的新教师培训制度，建立新教师档案，系统追踪和研究新教师的成长规律，摸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校内部新教师培养培训方法，使名师工作室成为新教师成长的助推器，以及大学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三、促进教学方法改革，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大学教学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仅凭良好的意愿和勤奋的工作不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大学教师的教学意愿、态度、知识、技能和方法已经成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而其中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影响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过："改变教学方法要比改变教学内容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教学方法的改进意味着教师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教学习惯，掌握一些并不熟悉

的新教学技巧。”① 事实上，教学方法在大学教学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由于大学教学强调教学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教师教学风格的多元化，教学缺乏竞争机制和分数限制，因此很多教师并没有把对教学方法的研究、运用和改革视为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教师更看重教学内容本身的准确性和新颖性，而把教学方法边缘化了。于是，大学教学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教师读讲义、学生做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对教学方法的漠视和轻视，已经造成了大学人才培养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强调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培养，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创造潜能，教学方法的现状与人才培养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

实际上，现行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质量的提高，使对大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诉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强烈。尽管我们常常在教学活动中强调教无定法，但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其核心部分，学生的学习仍然是学有方法的，教师教学方法的作用实际就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如何高效、有效地学习。关于学生的学术成就、智力发展、学习理论以及认知发展的研究已经证明，凡是那些强调积极学习、合作活动并鼓励学生进行合理探索的教学方法都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师的任务就是与学生在方式方法上互动，以促使他们获得新的信息，锻炼新的能力，重新组织并扩充已有的知识。由于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继续扩大，从生源质量上来看，学生的学习基础较薄弱，加之就业压力的加大，学习的欲望不强，学习的自我约束力较低，而学习的挫败感却较重。面对这样的学生，就更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更加注重和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更加强调学习的方法和效率，恢复学生的学习自信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

① 德里克·博克著：《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此，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方法改革可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　创设主动学习的氛围

一个优秀的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学生如何学习的问题，如何使自己所教内容更切合学生的实际，并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真正做到深入浅出，使学生能把所学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对课程知识的融会和贯通。

现代教育的发展变化，促使教学行为由教师为主体更多地转向由学生为主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样性质的本科院校，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无疑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大学学习的显著特征体现为一种积极的主动学习，不断探究和发现。随着知识和信息量的膨胀，随着课程体系的日益严密和复杂，仅仅满足于课堂教学活动所提供的知识量，是很难达到本科教育培养的质量标准的。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环顾中外大学，没有哪一所名校不是靠学生积极主动的求学精神来奠定学校的质量基础才最终脱颖而出的。西南联大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之所以人才辈出，让后人景仰，就在于其学生总是以积极主动的精神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对该校本科毕业生提出的质量标准就包含着多项对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要求。例如，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观察不同的学科、文化、理念之间联系的能力；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等等。这些都充分强调了大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的下滑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息息相关，教学缺乏了学生主体角色意识的积极参与，追求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是缘木求鱼之举。因此，必须把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做教学方法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如何鼓励学生学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现在的学生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知识面和信息接受的能力较

之以往都有很大不同，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够成为独立自主、自我约束的学习者，需要从目前的学习制度、学生的认知心理、学习习惯、学习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改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旨在建设性地建立起一种产品质量的观念；以学习者为中心并不是在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上退缩；不是通过降低学习难度而卑躬屈膝地满足学生的要求；也不是不负责任地降低学术标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是要在课堂或校园内创设一种能提高学习效果的环境，它是以鼓励多学为目的的。”① 可见，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创设主动学习的氛围，既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又符合社会对学习者终身学习的基本要求和期望。

2. 加强合作沟通　反思改进自身的教学方法

大学学习由于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学习是没有办法打开自己的学术视野的，因此大学学习特别应该提倡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教学相长”的原则。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可以搭建一个教学和科研的平台，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得到沟通和反馈，避免教学的盲目性。现在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太少，合作就更是少，教学活动演变成为单纯知识传递的过程，缺乏丰富的情感交流。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过，知识的传授必须经过教师的心灵加温，否则，教师的知识传授越多，学生就越冷漠。教学质量问题看似一个极其庞大的问题，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有研究报告指出，学生往往只有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才能学得最好。同样的内容，无论什么主题，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学到的东西比接受其他教育方式学到的东西要多，记忆也会更持久，而且那些参与合作小组学

---

① 〔美〕玛丽埃伦·韦默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洪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4 页。



习的学生对课程也会更加满意。

此外，对于绝大多数教学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不仅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理论素养，更重要的还要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因此，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方法既要能传授知识，又要把指导学生发现、创造、运用知识视为教学工作的基本前提，着重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从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教学方法的改进，需要教师有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和科学求真的精神来支撑。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反思评估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才能适应教学的发展和变化。要积极探索和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训练学生科学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大学教师必须更加积极地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摒弃那种故步自封，甚而抱残守缺的教学思路，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把教学方法的改进视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同时，建立合理有效的，能督促教师积极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相关机制也势在必行。

四、促进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大学内部，以及大学对外部社会的管理措施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当前，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随着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挤压，教师和学生视大学为社会组织，管理者视大学为企业组织，而政府则视大学为服务机构。由于视角不同，彼此就很容易在目标、法律、动机、风格等问题上发生冲突，管理的矛盾就日益尖锐。新建院校由于长时间处在院校合并和学校升格的环境中，以及学校定位的变化之中，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头绪较多，管理难度加大，矛盾也就更加突出。从管理制度建设来说，要么综合一下各院校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一个大而全，却可能无自身院校管理特色、效率低下的管理模式；要么就只能基本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使管理滞后于学校的发展需

要。如何消解管理当中存在的矛盾，理顺关系，需要教学管理工作有新的措施和工作思路。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管理文化的建设。这种管理文化一方面要更加符合教学管理的需要，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特别需要建立起一支相互间高度信任的管理团队，大家彼此乐于在一起工作，被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所激励，相互之间易于理解，方便作出快速的决定。这样的一支团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纯粹事务性的管理工作，而应该成长为学习型和智囊型的团队，能够系统思考，整体地、全方位地看问题，能够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其次，大学的教学管理既需要刚性的制度建设，更需要柔性的人文管理，毕竟大学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机构，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是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对现代大学管理而言，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其积极而巧妙的参与，对学校来说都至关重要，也显示了管理再也不仅仅是管理者的事了，因此必须在学校树立人人是工作者，也是管理者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师生的管理积极性。当然，“管理又是一种冒险，因为某些系统的管理技术可能毁掉大学唤起人们的想象、毅力和自由奉献的能力，而这些是原创性学术的根本”。[①] 因此，教学管理方式的变革表明，大学有责任去创造、说明和运用管理方法来提高大学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为学者和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提供服务，从而真正体现管理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同时，新建院校又应该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打破原有管理中的条条框框，通过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增强学校竞争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总之，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绝非朝夕之功，也不是局部的改革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只要认真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

---

① 〔美〕弗雷德里克·E. 博德斯顿著：《管理今日之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王春春、赵炬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律，实事求是，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把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到最大限度，把教学质量的提高视为学校发展的生命线，那么，使大学教学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这一愿望将会成为现实。

第四章　大学科研和学术生态的净化

如果把大学教学视为大学的骨骼，那么科研和学术就是大学的血液。一所现代大学只有把教学和科研很好地结合，并营造出学术环境的良好氛围，才有可能健康发展。21世纪的大学不仅要以教学为重要职责，也要以科学研究来推动社会和科学水平的发展。现代大学已经把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视为自己最核心的事业和基础。而当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认识大学科学研究的价值，如何营造更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以及当大学学术受到过度经济化和商品化的青睐和挑战时，大学如何面对，如何不使大学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这些都是现代大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假如有一天，都市欲望和商品大潮终于征服和吞噬了大学，摧毁了大学的精神堡垒，然后在大学的废墟上矗立起高度类型化和同质化的现代都市，则大学将何以为生？或者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今时代中，科学信仰和学术操守已经成为一种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退却意味着大学基本道德和伦理的丧失。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讲，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更加难能可贵，大学学术是薪火相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历史，要使大学薪火相传，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这样的原则：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声音，是社会问题的观察家和批评家，是社会理想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如果要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大学就必须坚守基本的科学道德和学术操守，而只有坚守，才能使每一个人、每一项科学研究和学术项目都能成为净化大学科研和学术的空气清新剂，如此，那



么真正健康、纯洁的大学科研和学术研究环境离我们将并不遥远。

大学科研“生态环境”的营造

现在，环境建设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所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但是若说到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建设恐怕就未必那么引人关注和重视了，因为这种“生态环境”和大家耳熟能详的环境是大相径庭的，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正因如此，高校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建设状况才让人担忧。曾经有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短缺不是单纯的数量性短缺，而是一种制度性短缺。笔者认为，高校科学研究制度上的缺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了。在科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时候，在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今天，是不是该认真地反思和突破一下我们在科研管理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的误区、禁区呢？

一、斯坦福大学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到该校物理研究所工作，提供的待遇在当时是令人瞠目的：优厚的物质和生活待遇，年薪20万美元，配备有专门的助手和实验室。这一切，让一些资深的教授和科学家费解和不满，堂堂的斯坦福大学为何如此器重一个无名之辈，并享受如此高的待遇。于是一批教授和科学家联名上书校董事会，要求取消这个年轻人的那些特殊待遇，面对压力和非议，校董事会和校长们选择的是沉默，并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位年轻人。20年后（也许这个时间对中国大学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也就是在1997年，这个当年的无名小辈竟然站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他就是当年默默无闻，而今赫赫有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当斯坦福大学决定在2000年从中国科技

大学引进两名同样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时，没有人再反对，因为事实让所有人都明白，也许若干年后，他们又将站在科学的高峰上“一览众山小”了。回想起这件事，我们的心中一定会感慨万千，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拥有这样一个宽松的科学研究氛围和环境？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拥有这样一位，甚或一批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善于识别与培养创新人才，倾力支持青年人成长，并充分尊重学者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的大学校长或教育家呢？

二、科学研究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

今天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金时代，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此。面对发展机遇，我们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管理的人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挑战的迫切，因为对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和氛围我们还关注甚少。实事求是地说，现在高校的科研条件和基础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并不过分，科技创新更是提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层面上，在宏观物质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以实现科技创新的突破。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知识和思想发源地的大学却对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建设淡然处之，不少大学热衷于盖大楼、铺草皮、塑雕塑，热衷于引进了多少院士、博士和教授，搞了许多形象工程，而对于如何营造一个适合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环境、制度却不是十分上心，其结果就是使得大学科研生态环境恶化，乃至“沙化”。也许中国的大学都曾暗自盘算过，随着大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是指日可待的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了“不和谐”的声音，有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我们仍然只重“物”的建设而轻“人”的建设，那么诺贝尔奖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恰恰是越来越远。这绝非盛世危言，更非哗众取宠之辞，而是对大学急功近利、漠视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的正告。孙中山先生说过“教育是



人的建设"，但我们的大学的建设是不是真正从人的角度去建设的呢？梅贻琦先生说"大学乃大师之谓也"，即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学，什么是大学之根。而当年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既没有高大的楼群，也没有高耸入云的雕塑，但却诞生了一位位卓越的学术大师和科学家，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对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成就充满了敬意，对那极富活力和思想自由的环境氛围津津乐道，他们的言行实际上是对大学科学研究如何做到尊重人、培养人的最好的注释。

当然，我们的大学应该建设得更漂亮和美丽，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充裕的资金和设备保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大学来说，新思想的产生也好，学术水平的突破也好，重大的贡献也好，仅仅靠钱和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氛围，一个各种各样的外部刺激与人内在需求有机的结合，从而营造出适合大学科学研究的良好"生态环境"，并在这个环境里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们自由探索，鼓励提出创新性学术思想。而只有这个环境日臻完善，科学研究才会步入一种良性循环的境界，也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为科学研究毕竟是要以人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大学走到今天，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在健全和完善创新体制和科学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去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和氛围。

三、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

曾经有学者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而实际上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和环境比建设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要困难得多，因为它要突破的条条框框更棘手。因此，也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中应该牢固树立环境育人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其实环境育人并非今人所独有的想法，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很讲究环境对人成才、成就的重要意义。不管是昔日孟母的“择邻处”，还是高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的冯谖，又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的孔明，等等，从这些可看出环境氛围对人的成长、成才有多么大的影响。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力的增强，国家对大学的投入逐年增加，高等教育的整个办学环境、办学条件确实是今非昔比了，各大学的“硬环境”建设也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但我们的“软环境”却没有随着“硬环境”的改善而水涨船高。笼罩在大学科学研究头顶上的阴云便是科学研究中的浮躁情绪，以致泡沫科研和学术腐败屡禁不止，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和制度所引发的。一些高校的科研工作总希望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取得突破。殊不知，科学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急功近利。斯坦福大学的韬光养晦，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幼苗得到精心的呵护并最终长成参天大树，科学研究也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欲望得到极大地激发，并最终孕育了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有 27 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德国的马普学会有 17 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贝尔实验室和 IBM 实验室共有 16 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这些声名显赫的研究机构其共同的特点都是领导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擅长发现“千里马”，同时，善于营造和谐的创新文化环境。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的大学不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改变对良好环境和氛围营造所必需的关注和重视，仍然排斥对科学研究“生态环境”的营造和维护，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是很难有所作为，或者说是很难有大作为，我们的许多梦想也就仅仅是梦想。

今天的大学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因此，大学所肩负的使命、所承担的责任是任何时代的大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作为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多元的社会也必然造就多元的大学，多元的大学



必然是海纳百川似的大学，即能包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和风格，真正成就大学之“大”。大学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和科学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和文化日新月异，整个社会也才会充满活力。但现代大学提供的不仅是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学术氛围，使人们在真正民主、科学、自由的环境中把人的创造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而这种环境的营造绝非朝夕之功，它需要我们大学科研部门管理者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提高思想境界，具有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怀，真正认识到“软环境”建设对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从而扭转我们重“物”轻“人”的倾向。一所生机勃勃的大学，它制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我们就应该建立健全这样的制度。

面对当前的科研工作环境，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踏踏实实地去营造好大学科学研究的“生态林”，切实改善大学科学研究的生态环境，既尊重人、相信人，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真正做到“顺人之天，以至其性”。把维护、改善大学科研制度，实施和提高政策保障的力度，作为科研生态优化的关键因素，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不用再去羡慕斯坦福大学的氛围和环境；而这一天的到来，也将是我们大学科学研究真正的幸福时光！

大学学术的责任

学术责任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学问可以高低并存，学风却不可以正邪共处”似乎已成为大学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理想。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以其教学和管理的丰富经验著有《学术责任》一书。他从学术责任的高度坦率地论述了如何影响和塑造未来的大学教师，如何重新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现代大学的复杂性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等一系列问题。在我国

的高等教育改革面临诸多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大学的诚信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和教学方法问题等日益尖锐的时候，大学尤其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学术责任”，以学术的忠诚捍卫大学学术的纯洁。在我们一再呼唤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建设重要性的时候，认真研究《学术责任》一书也许会对我们如何担起学术责任大有裨益。

一、大学如何取信于民?

现代大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卓尔不群的独特风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到今天，大学更加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但在人们把目光投射到大学身上的时候，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如此信任大学？大学凭什么赢得公众的信任呢？肯尼迪（现为斯坦福大学环境科学教授和名誉校长）以学者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在《学术责任》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学要获得社会的信任，就应该让公众认为大学是基于诚实的行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其部分原因是社会要相信大学所创造的知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公众认为大学是接受他们的委托以培养青年一代的场所，如果负责教育学生的高级学者们对自己的工作都缺乏责任感——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年轻人的思想和成果据为己有——那么，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必然会下降。在公众眼中，教授应该是品德高尚的导师，如果他们不能热心细致、大度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失去人们的尊重。”① 在这段论述中，作者把诚实，不管是学校还是教师的诚实标准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面上，并坚信这是一所学校能否取信于民的最基本维度，也是一个教师能否安身立命的底线。如果连诚实这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丢弃了，那么一所大学甚或一个教师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回到生活中，现实却让我们无法乐观，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8 页。



因为世界的变化总是如此“奇妙”：丰富会变成稀缺，存在可以化为乌有，流动可以停滞，崇高也可以变得卑下。作为人的心性完善、品质优秀的美德，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珍稀道德资源甚至是奢侈品。毫不夸张地说，一个自古以来最崇尚诚信也最讲诚信的民族现在却已经生活在诚信危机的阴云笼罩之中了，自然，我们的大学也概莫能外。对此，肯尼迪在文中尖锐地指出：“对优异、奖励、优先权和金钱的竞争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些大学忽视了它们在其他方面承担的责任。由于大学在经费竞争中利害关系变得越来越明显，竞争所涉及不到的方面越来越少了，所以它使得个人在追求最高标准的过程中要保持客观性和正直性越来越困难。由此带来的最大风险可能是礼让的丧失。强化竞争带来的效果之一，是对大学精神和礼貌作风的侵蚀。”① 更何况我们大学的许多竞争是无序和恶性的。比如对职称的不恰当定位，导致为了评职称而到处拉关系走后门，以致“泡沫”科研屡禁不止。为此，肯尼迪毫不讳言地指出：“博士论文本身，就意味着是一项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学生通过它来表明自己已经做好了独立从事学术职业的准备。但如果博士论文由学生和老师共同署名，那么只会出现以下的情况，要么工作确实不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此时就不应该称之为博士论文，要么显然是另外一种‘友情署名’的行为。”② 而这种“友情署名”的行为诸如“师生友情署名”、“夫妻友情署名”、“朋友友情署名”等在今天的大学可用“泛滥”二字形容。比如为了获得学历证书，各色人等对大学趋之若骛，大学快成了萨克雷笔下的“名利场”，成了印刷文凭的工厂，从而几乎把大学高贵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丧失殆尽了。很遗憾，我们至今对此仍然束手无策。从以上种种怪现象中我们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4 页。

②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3 页。

可以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也许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的短缺不是单一的数量性短缺而是一种制度性短缺，因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它的职责就是求真务实，忠于思想，忠于社会职守，忠于学术和真理，这是大学取信于民的基石。“学问可以高低并存，学风却不可以正邪共处。”建立健全学术责任制是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当务之急。当然，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漏洞的，也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而大学和教师诚实的职业道德、良好的学术风范、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却可以弥补这种漏洞，防止和避免学术失范行为。因此，肯尼迪的观点无疑启示我们，制度建设固然十分重要，但人的建设更重要。耶鲁大学的诺厄·波特在 1871 年的就职演说中讲道：“一个学院里最有效的道德影响力来自于教师的个人品质。一个高尚的品格，再加上学者的智力和成就的尊严就可以成为一种启迪和追求。”

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困扰大学的现实是，现在大学的投资仍然绝大部分来自政府（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础：既然政府投资教育，它就有权管理教育。但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却破坏了大学良好管理的许多重要原则，“扩大了腐败、裙带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施勒格尔在其《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中说：“哪里有政治和经济，哪里就没有道德。”此话当然不免片面、偏激，但教育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命运总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在今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学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以这样说，大学是道德勇气的家园，同样也是道德胆怯的所在，但大学有必要赢得道德领袖的权利，这种权利也是维系公众对大学信任的基本准绳。一所大学如果不愿认真对待道德问题，就违背了其对社会应负的基本责任。肯尼迪的论述是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但又何尝不是针对我们的大学呢？



二、大学如何培养学生？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的提出和普及，马丁·特罗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几乎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人物。马丁·特罗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套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指标，更重要的是对各个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归纳，为制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不管是在哪个发展阶段，大学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的基地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可人才如何培养，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我们培养的眼光应该如何去适应日益开放、多元和复杂的社会，并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肯尼迪在其著作中针对以上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探讨。如果说在著作的第一部分中作者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阐述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和公众对大学的信任度问题的话，那么作者便是以一位资深教育家的身份对我们教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甚至是一些很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比如他认为：“在可供选择的各种评价方法中，那些在根本上有别于通常的比较测试方法大大地吸引了我。打分方法无论对论文、考试、讨论班表现，甚至创造性作业，所有这一切，打分所提供的都只是将个别学生的表现与他（她）的同学相比较而得到的结果，这不可避免带有对奖赏的争夺。但在一个学生日后可能从事的大多数活动中，获得成功取决于这样一种能力，即联合起许多头脑及人力，以对付一项挑战。而在当前的学校体制中，几乎没有什么练习用于培养这种技能，更少奖励它。”① 在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大学教育观念、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中，对知识传授的重视程度（包括对教学质量的监控、测试和评价，教学方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6 页。

法的实施）仍然远甚于对学生日后走上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的要求，事实上，如何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上使学生和谐发展，这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教育家马丁·特罗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一系列的变化。"这些无疑都在提醒我们，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情况下，量的增长应该重视，而"质"的变化却是必须要下很大力气去实现的。为此，肯尼迪强调"大学水平的教育其本质乃在于帮助学生学会分析，以及能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不熟悉的陌生领域中去"。

此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作者是一位大学校长，一位大学高层管理者，但却对一些相当微观的教学现象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例如，肯尼迪对如何改进课堂教学质量提出"一分钟试卷"的主张。所谓"一分钟试卷"是指"在课堂结束时，教师留下最后一分钟，要求学生此时写一篇简短的自发想到的文章，以作为课程的反馈。这可以是比如对问题的回答——今天课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或者，就某个特定概念辨别所教过的最关键信息，或者甚至只要求指明课程内容中最不清晰的地方。教师说明这项练习不作为评价，其目的只在于通过开启关于课程是如何进行的讨论来改进课堂质量"。① 事实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的缩影。同时，肯尼迪认识到，大学作为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教师的言行对学生将会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因而必须规范教师的言行，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为此，肯尼迪指出："他们（教授）作为'人生典范'的功能是重要的，或许其重要性不亚于他们传播信息和引起好奇心的功能。因为如果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3 页。



要是知识事业对于学生具有吸引力——如果要使他们感到知识的生活值得一过——就必须使他们尊重选择这种生活作为职业的人。那种显得过于急切的传播自己影响的人，或者让他自己的政治日程表凌驾于课堂讨论上的人，是注定要在这些方面有所牺牲的。”① 从这些精彩的观点可以看出，肯尼迪是一位很有教育眼光并能洞察高等教育弊端的教育家。

通过对以上论述的分析不难发现，我们对高等教育的一些认识还是比较片面和绝对的。比如，我们的大学现在都十分渴望和羡慕“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先暂且不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这些主张所包蕴的丰富和深刻含义，单是对“自由”和“自治”的理解就存在偏颇，因为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心目中，自由就意味着无拘无束，就意味着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是“两个黄鹂鸣翠柳”；自治就更意味着大学可以没有任何束缚而成为“自由王国”，是“一行白鹭上青天”。殊不知，通过研究和介绍（不仅仅是肯尼迪的著作）我们发现，教师（教授）的自由不等于放任自流，更不等于为所欲为；大学的自治也不等于完全脱离社会、公众的监督而成为世外桃源。因此，我以为，在读过肯尼迪先生的著作之后，结合我们当前的现实，“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的精神和思想是否是真正“自由”的和“自治”的；在于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是冲着真理而来的；在于我们是否利用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来保卫和传播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诸如公平、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团结等。

德谟克里特曾说过，智慧会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那么，大学培养的学生是否也应是智慧生出的果实呢？在变化万千的世界面前，我们懂得如何培养学生了吗？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4 页。

三、大学如何发展?

21 世纪的一个事实是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关注，以至于有学者放言：要看 21 世纪是谁的天下，不要看别的，就看大学，大学强则国强，大学弱则国弱。那么，担此重任的大学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面前，在多元文化的激烈交锋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应该如何选择自己前进的方向，这是全世界的大学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此，肯尼迪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重新设计大学这一过程的艰巨之处在于对其核心使命的开垦。它毕竟是社会的文化传承和交流机构，它是通过把知识和感受用心地、引人入胜地从一代传递到另一代来工作的。因此，改进它必然要把学生的需要放在首位。把学生放在首位只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原则，但它有很大的力量。”① 作者的这番话无疑将启示我们，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如何变迁，大学的定位要始终放在学生身上，“以人为本”应该是大学永恒的座右铭，也是大学发展永远不变的方向。今天我们张口就说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实际上所谓“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的价值与利益的关照，就是懂得尊重人、发掘人的潜能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把学生放在首位”就是“以人为本”，它不是形式，更不是标语和口号，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行动。它也是一块试金石，能看出我们的大学和教育者的责任的成色。

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大学未来的崇高使命与责任。肯尼迪指出：“大学与社会处在动态平衡中。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成就的保存者，大学似乎又是滞后的；另一方面，它们又被看作领导者，在新的知识领域探险，进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0 页。



行技术改进，同时又是新奇的、令人不安的思想的温床。”①在这里，作者十分冷静地分析了大学的现实，也对大学的功能——传授知识、创新知识、知识物化作了浅显的解释。实际上通过作者的观点我们也不难发现，大学发展的方向就是引领社会，成为人才和技术的孵化器，创新与创造的智力平台。而要做到这些，“管理和领导大学者不仅要召唤向公众强烈表达（必要时捍卫）大学价值的热切意愿，而且要凝聚起展望机遇、迎接变迁的能力”。②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大学的责任。

《学术责任》一书的论述和分析，给今天的大学，尤其是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经验，也加深了对“学术责任”一词的理解。大学只有取信于民，才有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只有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才有可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才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钱基博先生说：“国家神圣，而学术尤神圣；未有不学无术之国家而可以长治久安者也。”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类提供了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智力平台。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大学应该承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责任！

学术的国际化和学术的本土化

大学是一个以追求学术为天职的机构。对一所大学而言，往往把学术视为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动力。在普遍强调大学学术是大学核心的时代，如何使学术更加规范，使学术更加具有生命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是大学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衡量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影响力，学术水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任何一所杰出的大学，学

---

①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9 页。

②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1 页。

术就是其卓越的象征，同时都具有较为鲜明的学术特色。尤其在当代，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任何一所大学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学，都必须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具备鲜明的学术特色。学术水平意味着学术的原创能力，学术特色则意味着学术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的程度，充分体现学术的普适性和适切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借鉴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既是当代中国大学学术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学术体系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和形成和而不同的学术特色的关键所在。

回溯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国的现代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到现在也不过仅仅百余年的历史。从这百余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大学的学术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以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标志。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学术体系的雏形期，基本是照搬和仿照西方大学的学术制度，学术思想中还充斥着浓郁的封建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那个时代较为鲜明的大学学术特色。第二个阶段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至1949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开始趋于成熟，学术视野较为开阔，学术成果较为突出，学术特色较为鲜明。这个阶段奠定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基础，使中国现代大学迅速形成了较为独特和鲜明的学术风格，既对西方大学的学术体系、学术价值和观念有较好的借鉴吸收，同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保留和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还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大学的学术制度逐渐从“西化”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大学克服诸多困难，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尤其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建设人才。但这个阶段的大学学术研究由于受到过多政治因素的干扰以及逐渐封闭的学术体制的束缚，学术视野日趋狭窄，学术特色已经呈现出单调和单一化趋势。第四个阶段是从1966年至



1976 年。这个阶段大学处于全面停滞状态，名存实亡，只有政治特色而无任何学术特色可言。第五个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至 1998 年。这一阶段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学处在恢复和不断改革调整之中，学术氛围日趋正常，学术视野渐趋开阔，整个高校的学术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第六个阶段是从 1998 年大学扩招至今。这一阶段，整个大学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念日趋多元化，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学术特色异彩纷呈，学术国际化日益明显。同时，这一阶段大学学术研究遭遇学术功利化冲击、削弱也较为严重。

从以上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大学越开放，学术视野也就越开阔，而学术视野越开阔，大学学术特色也就越鲜明和突出。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大学学术制度的形成和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取得决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大量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学术思想、观念的结果，是大学学术国际化的最好体现。查尔斯·E. 麦克兰德在《政府、社会和德国的大学》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所有大学中，德国的大学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他们首先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近代大学模式。它们是大量近代学术和科学的源泉。”正因如此，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对德国大学的学术制度情有独钟，通过借鉴和改造，培养并最终形成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独特学术思想体系，使北京大学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的中心，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影响巨大。梅贻琦先生把美国大学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管理体系加以合理吸收，根据中国大学的实际，在执掌西南联大的时候，最终形成了西南联大独树一帜的“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大学学术氛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了无数的学术大师，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学术成果。从蔡元培到梅贻琦，这段时期的大学学术可以用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观点来表述：“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此问题主义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处于外国，其偿我

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痛苦，则一也。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① 以这样“学无新旧、中西之别”的学术视野来看待学术研究，那个时代学术成果斐然也就实属必然。这些中国大学发展历史上的成功经验，都充分显示了中国大学学术要取得重大突破，就必须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国家学术观，努力扩大学术的国际化视野，提升学术的国际化水平，积极吸收国际学术研究成果，并使之和中国大学的学术相衔接。事实上，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对国外大学学术的合理吸收和借鉴仍然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和昌盛的必由之路。

一国大学的学术发展，乃至成功并非依靠或者依赖某一国或某一种现成的学术模式就可以完成，学术视野向“外”看的一个基本前提首先是如何向“内”看。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目光紧盯学术国际化潮流的时候，对自己的高等教育有没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在高等教育改革逐渐从表层开始向深层次推进的时候，中国大学的学术能不能扎根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和学术制度至关重要。更关键的是，在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大学的学术思想、学术制度的同时，中国大学学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还能不能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姿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学术潮流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真正具有中国大学的学术特色呢？实际上，如果只是一味强调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以及和西方大学学术体系的接轨，我们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心悦诚服地全盘接受了西方大学的学术理念、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而很少考虑学术的本土化问题。在目前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把持了一整套的大学学术评判标准，以“中心”和“边缘”来划分西方大学和非西方大学，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来区分和判定学术价值的高低，



① 王国维著：《论近年之学术界》，上海书店1996年版。

使得中国大学学术在学术国际化的幌子下，实际上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扮演着跟随者的角色。“边缘大学得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学为自己的院校提供发展模式，对中心大学存在心理依附。”① 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大学学术一元化的时代，中国大学学术还明显缺乏自己的基本色调，往往以外国的学术标准作为自己学术的标准，以国外高校的学术定位作为自己的学术定位，甚至以国外高等教育的学术评判体系作为自己的学术评判体系。简单照搬西方大学学术模式的后果，就是今天中国大学失去了对自己学术发展方向的把握，不能准确定位自己，丧失了学术上的自信心，在亦步亦趋之下成为西方大学的学术附庸。特别是中国大学的一批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学术精英，在全球化的学术生活中享受到了短暂的被认可的快乐，以一种天真的心态在学术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自己的学术意志和学术独立、学术自主的精神，也丧失了对学术意义的界定权和对学术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大学的学术世界认同。

对此，哈佛大学的杜祖贻教授对于中国大学在学术国际化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学术的政策与方向、审核与取舍，如果全为西方学界所操纵和评定，则等于无条件承认其宗主地位，本地学者的角色将永远是奉承者和受审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自己既然甘愿放弃学术评价的责任，便将永远无法获得学术批判的能力与自信，这样将何来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去从事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②而今天过分强调学术西方化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大学逐渐变成英

① 菲利浦·G. 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入世”：并非全球化明知之举》，卢爱珍编译，载《新华文摘》2002 年第 10 期。

② 覃红霞、张瑞箐：《SSCI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载《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8 页。

美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藩篱”。[①] 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更严峻的现实是，在这样一个唯西方大学马首是瞻的时代，在明知我们的学术视野有被西方大学所控制和遮蔽的情况下，中国大学学术却很难在西方大学的学术主流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更不用谈分庭抗礼了。因此，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大学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大学必须要尽快摆脱西方大学的学术桎梏，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建立和开创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时代，这是关系到中国大学是“中国的大学”还是在“在中国的大学”的分水岭。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其文化的影响力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全面崛起，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文化之所以具备这样的生命力，和自身文化特色是密不可分的。儒、释、道文化的有机结合、和谐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大潮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中国文化的包容、博大、睿智、充满哲学思辨的深度和人文精神关怀的特色，使中国文化能够以一种独特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化潮流之中，在今天仍然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中国大学作为中国开放的形象之一，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开拓者，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担纲者。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大学也必须更加多层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中，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积极寻找中国大学学术的发展之路。但是，融入并不等于融化，更不等于同化。“从观念上看，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世界的

① 覃红霞、张瑞箐：《SSCI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载《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0 页。



彼此依存和相互依存从未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然而，正在出现的地球村远未整合为统一的整体，更不要说因循着一个铁板一块的单一模式。反之，它显现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近来的发展日益倾向于维护个体同一性。”① 所以，尽管目前大学学术的话语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大学的手中，但中国大学完全不必妄自菲薄，而应该在积极吸收和学习西方大学先进的学术经验、学术管理的同时，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学术自信心，通过学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结合来寻找中国大学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开辟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地，以此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如潮攻势面前，中国大学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大学学术作为西方现代大学的舶来品，它较全面地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如何把学术水平和办学水平结合起来，使大学学术水平不仅体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还能体现一种贴近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的本土化发展趋势，这确实是今天中国大学学术面临的严峻挑战。现在很多大学非常注重学术的国际化，言必称西方，但对于自身学术的本土化问题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学术上长期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和钳制，因此尽管中国学者对西方一些学者的“去中心化”努力表现了广泛的共鸣，但中国现有大学的体制和学术规范依然不得不服从知识的“不对称流动”的规则。从根本上说，中国经验和中国学术还只是远未被充分重视的“地方性知识”，远远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大学的学术根基，也就很难谈得上自身学术体系的建立了。但是，正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学术研究的珍贵原始范本，能够为世界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极为丰富的

① 高瑞泉、颜海平著：《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融合势在必行。

近年来，中国大学学术研究出现了盲目跟随国际学术潮流而动，却置自身实际于不顾的发展倾向。在盲目追求学术国际化的运动中，一批原本很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风格的大学越来越走向雷同，国际化程度提高了，却失去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判断力。大量新建的院校本来就存在不少问题，教学、科研和师资队伍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在一味追求学术水平所带来的短期利益驱使下，动辄就要向国际学术标准看齐，不切实际，成为单纯追求所谓学术国际化的牺牲品。不少大学不顾学校实际，盲目照搬一些学术的条条框框，热衷于用学术来装饰一切，在缺乏良好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过分强调所谓的学术特色，其后果就是特色的标准化和教条化，特色来特色去，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特色，甚至把原来是特色的也给弄丢了，学术的本土化研究更是一片空白。由于学术定位不当和导向错误，一流的大学都迫切希望办成哈佛和耶鲁，二流的大学希望办成清华和北大，三流的大学希望办成重点和示范。在这样一场非学术理性的竞争中，受伤的恰恰是大学学术自身。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很少有人去关注中国大学学术的发展走向，更少有人去研究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剧烈转型时期，学术研究的取向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呼应的可能；缺乏学术本土化研究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学术的本土化研究也就失之空泛。而当学术研究失去文化根基和自身传统的时候，所谓学术国际化就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削足适履的笑话，而中国大学自己好不容易形成的学术传统也有断代之虞。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之路证明，学术要获得健康的发展，既要合理借鉴国外优秀的学术经验，又要和中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中西合璧。毕竟“外来经验在提供负面范例作用方面差不多与提供正面范例一样经常出现。这是因为，来自一个发达国家享有盛誉的大学经验移植到另



一国并不一定有效。这样，在来源国有效的经验到了中国可能一无所用”。①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说过：“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像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有继承才能有发展，学校需要风格，风格来自传统。”因此，在借鉴西方大学的学术经验的同时，应该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学术优势，注重学术风格和传统的衔接，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各种学术关系，把握好大学学术的发展方向，实现学术国际化和学术本土化的有机融合。

学术兴衰，事关大学成败，更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大学在新世纪应该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就是在多元化时代中，有信心和勇气去培养自己的学术特色，打造自己的学术体系，通过规范学术制度，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以此激发人们的创造和创新精神。因此，既具有学术的国际化视野，又具有高水平的学术创新能力，同时和中国社会和大学的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这应该是中国大学应有的学术形象。当然，学术的发展固然不是依附于西方的学术认证，但自主也不是脱离世界学术发展的独立，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学在追求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时候，不应忽略中国大学的独特性。身处 21 世纪的中国大学，不但要思考如何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学术体系的普遍性之中，而且更应该考虑如何实现中国大学在学术方面的创新性，使自己的学术得到创造性的发展，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学术越界与学术道德的恪守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犹如一出荒诞派戏剧，使得全世界都在揪心地看着这场经济危机以人们不曾预料的方

---

① 菲利浦·G. 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9 页。

式蔓延而无能为力。可是，在风暴到来的前夜，全世界都还处在歌舞升平之中，享受着经济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福祉。不管是何种制度下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经济雪崩”带来的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对这场灾难追根溯源，原因可能竟然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就是两个字：贪婪——无以复加的人性的贪婪造成了经济的失控。金钱本身没有问题，而是掌握金钱的人出了问题。为此，有学者撰文强调这是资本主义的越界造成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但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越界造成了这场灾难，还不如说是因为人性跨越了道德的边界，造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危机。在审视全世界为资本主义的越界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反躬自省，思考扎紧篱笆的办法。作为人类社会创造和创新源泉的大学，面对这场经济灾难很难置身事外而袖手旁观。因为对于大学而言，资本主义的越界使得人类苦心营造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那么，我们的大学是否也存在越界现象呢？如果越界，会给大学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

必须承认，不管大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大学学术是大学的核心和基础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因为学术的基本价值就是原创性，创新知识和发现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通过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知识，这是大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客观上讲，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学术，终点还是学术，此所谓学术兴衰，事关大学成败。但在当前一个很容易颠覆一切既成事实的所谓解构的年代，对当代大学学术走向的合理性和方向性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尤其在大学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的学术语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全球经济神话的破灭，支撑当代大学发展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乃至学术理念是否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绝非偶然，是经济不良化的必然结果。而如果我们的大学学术越过了边界，是否会引发大学产生一种连锁反应，进而导致学术成为压垮当代大学的那一根



稻草呢。这种提法或想法也许有些危言耸听，大学学术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但大学从踏进世俗社会的河流之日起，就几乎和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了，尤其在当代，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大学要想彻底摆脱社会和经济的束缚，遗世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学学术和市场经济早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瓜葛。因此，经济危机其实同样可以折射出大学存在的深刻问题。反思之下，当代大学学术面临的最大危机，实际就是市场化对大学的地位，即“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文化的守卫者”① 发出了直接的挑战。从大学的发展历史看，现代大学不管历经多少坎坷，存在多么大的争议，一个最普遍的共识仍然是大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多种技能以及应用技能的能力，还要丰富和启发学生的生活——告诉他们生活的价值，思想诚实、道德健康以及对更好的未来社会的想象，这些都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术就是支撑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因素。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及其金融衍生品的高速蔓延，市场化呈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扩张强度和广度，在这样的经济浪潮中，当代大学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迅速成为学术资本主义集散地和高等劳动力批发市场。其实，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 150 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预言，资本主义无疑一直都会到处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大的生产力。而今天，大学学术走向市场的速度和力度，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大学成了资本主义扩张势力范围，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一味简单地强调、强化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以及与社会经济现实接轨的同时，大学的教学、科研，以及大学的学

① 王逢振著：《交锋——21 世纪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4 页。

术都成了资本追逐和同化的对象，尤其是大学学术与资本市场从未如此亲密地接触和发生过关系，因此，学术资本主义的诞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一切其实早有先兆，十年前，两位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瑞·莱斯利（Larry Leslie）合写的《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一书出版，指出："为新奇所驱使而进行研究的教授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为支持这种研究活动的多少有些自治的基金被撤销了，而致力于商业研究的研发基金增加了。不参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教师将会变成教书匠，而不是教师——研究员，他们将以滚动合同的方式工作而不是得到长期聘用，对研究型大学的课程或者方向将很少有发言权。"① 几乎与此同时，一本被誉为欧洲大学改革"圣经"的著作，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伯顿·克拉克所著的《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风靡欧美，该书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传统大学面临日益增长的知识总量和社会需求的巨大压力，必须通过转型来扭转大学的不利局面，而转型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一个拓宽发展的外围；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一个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② 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大学更广阔的社会化和更深入的市场化。

这十年的时间，恰恰是中国大学迅速走向世界的十年，也是中国大学学术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长期受到西方学术钳制的中国大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再一次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冲击，只不过这一次是以一种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探究学术。在这个探究学术的过程中，尽管西方学术的神秘感被打破，但西方大学学术的传统权威性，以及其学术空气中弥漫的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气息，让中国大学很难在短

---

① 王逢振著：《交锋——21世纪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② 〔美〕伯顿·克拉克著：《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时间内迅速判断其利弊，而只能采取一种激进的学术策略——“全盘西化”。于是，在中国大学大张旗鼓地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中国大学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和冒着市场经济入侵的危险。现在看来，一味强调与欧美大学的接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大学学术越界的开端。尽管大学学术成果的转化迅速提升了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并迅速提升了中国大学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学术越界行为的发生，也致使中国大学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穷惯了的中国大学一旦发现可以把知识，乃至学术成果轻易地转化为巨大的财富，而不需要合理和合法的学术规范、学术监督和学术自律时，学术的企业化和商业化趋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学术行为变现为经济利益的言行开始大行其道，“教育产业化”就是典型的引导和鼓噪大学走向市场的范例。

大学可以走向市场，通过对知识的合理利用和转化来改善大学的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但大学不能把市场的开拓置于人的发展之上，更不能把学术视为攫取经济利益和获取名声的工具。一旦违背了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精神，学术就将被异化，学术越界也就必然发生。于是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学术自由本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却演变成了自由追逐金钱的游戏；学术基本的道德操守在物质主义的攻势下土崩瓦解，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类的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在学术神圣外衣的掩护下，却以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作为学术的基本手段和目的；学术的思想价值被迅速淡化，学术的商业价值却急剧放大，学术研究成了一种获取功名利禄的终南捷径，“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大学里，有其最为恶劣的极端，即仅仅从事或者仅仅宣传从事某些能够达到媒体效应的研究”。[①] 在大学，尽管一批有良知的学者还在为严肃的学术探究和学术批评争取日趋缩小的思想空间，但

① 韩水法著：《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这样的空间在今天看来却像北冰洋的海冰一样岌岌可危。尤其在知识的“非实用”领域里，大学已经很少讨论并干预正在进行的大学商业化，捍卫大学学术自由和倡导“为学术而学术”日趋式微，而把大学视为摇钱树的却大有人在。大学学术已经严重越界！

回溯历史，在两百年前的德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人洪堡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的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① 可见，大学学术和社会、政府的需要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学术繁荣的基本前提之一。而现在，之所以说大学学术越界，就在于大学学术和当代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贴得太近，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方向性，把盈利视为学术的终极目的。事实上，大学不管如何发展，功能如何多样化，它的本质始终是一个服务于大众的公益机构，而非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大学的商业化倾向表明了大学正在逐渐失去独立、自由的地位，而成为社会和商业的附庸，而大学学术的商业化倾向，一方面显示出大学不再远离喧嚣的社会和人群，越来越多地建在财富和购物中心之间，大学不再只是出售，而已经是有买有卖。另一方面，大学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应用性和商业性的领域，通过知识的转化来获取利润，大学正在逐渐走向企业化和公司化。现在的大学非常热衷于与商业形成伙伴关系，目的是寻求更大的资助和资源，生产可销售的知识产权，反过来这种知识产权又为学术和商业带来利益。这种种行为不禁使人

① 贺国庆著：《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 页。



产生很多疑问，大学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为公众还是为资本所有者？学术研究的价值是否可以完全成为商业投资的理由？如果商业投资是学术研究的前提，那么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又如何体现？如果一个学者总是双眼紧盯市场和钞票，那么大学学术研究的超功利意义又何在呢？总而言之，今天大学学术越界的后果，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大学学术的本质，使学术成为工业化和商业化时代的附属产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事实上，大学学术越界也许更严重的后果是动摇了人们对大学寄予的希望。资本的越界和人的贪婪造成了全世界经济的崩溃，沉重打击了人们的经济信心，而学术越界也同样会给予人的精神世界沉重的打击。大学也许不会倒闭，但大学精神价值的垮塌对社会的打击却可能是异常沉重的。大学已从象牙塔中走出，但大学纯洁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是让人保有对人生的美好回忆和未来期盼的重要途径。大学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一员，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要有效地约束社会和人的越界，对公众社会能够有效反思和批判，使平等、自由、公正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在大学全球化，尤其是学术商业化的过程中，学术迅速放弃了抵抗，学术领域几乎再没有批评探索和文化抵抗的空间，它本来是可以对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行挑战的。而更可怕的后果是，当一个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学丧失了对社会的约束、监督和批评，那么，社会发生什么样的越界行为就都毫不为怪了。

但是，学术的越界也促使我们更加坚信，大学只有恪守自己的学术准则和道德规范，才有可能维系大学的健康发展。“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然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① 学术的生命力是让大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我们

---

① 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今天把更多视线停留在学术的商业价值的时候，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已经成为现实，但大学所要承担的绝不应只是服务站的角色。“大学成为‘象牙塔’或‘服务站’显然都是现代大学的两个不幸的极端。大学自然不能遗世独立，孤芳自赏，但若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非隔离，则更能产生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更能有利于纯净的学术研究和真理探索。从大学的本质与长远发展来看，大学虽然应该以其专有的知识来服务于社会，以解决或疏导当前的问题，但它不能太过重视当前的问题，而采取急功近利的办法。”① 因此，越是在整个社会陷入茫然和无助的时候，大学越是应该像中世纪的大学诞生之初那样，成为整个黑暗的时代中最绚丽的花朵，成为照亮人类精神和灵魂的火花。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要越过边界，越过知识和真理的边界，去创造新的知识，去发现新的真理。大学又必须要坚守边界，坚守大学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一旦任由大学学术越过边界而失去学术的基本准则，深深地掉入商业化的泥淖之中，那么大学发生危机也将会是不远的现实。大学不要因为自以为“务实”的近视而妨碍了大学前瞻的视线。

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一篇著名演讲稿，后收入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在这本书里，韦伯总结、概括了他在社会、学术、思想、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所得，通过历史与社会学角度的比较分析，在道德价值层次上的批判反省，让人痛苦地意识到近代人在跨越现代处境时的艰难。而值得回味的是，作为一名资深的德国大学教授，马克斯·

① 金耀基著：《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125 页。



韦伯在世纪之交急遽变化的现实面前，以他犀利的目光和睿智的头脑，对大学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深刻和独特的思考。《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稿，是韦伯去世前不久在战争与革命双重冲击下的德国“新”文化的重镇慕尼黑发表的。在这一篇演讲稿中，韦伯主要从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尤其是对学术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如何保持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发表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表明了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念。文中的“志业”一词是韦伯这篇演讲稿的核心。志业，英译为 vocation 或 calling；在德文中，“beruf”一般也用来指职业；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给这个词赋予了浓烈的宗教和哲学色彩。因此，从韦伯的这篇文章里分析，“志业”可以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对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判断。

观察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十几年来大学的发展速度和国家 GDP 的增长速度一样惊人，学术成果的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加，并且现在仍然还在高速增长之中。这反映出大学发展和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尤其是当今强调、注重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大量学术成果的实际价值，以及对社会真正的推动作用就值得考量了。在学术繁荣的背后，在学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学术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学术研究的走向和学术风气的正邪。可以说，当代大学学术遭遇到的困境就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非功利化和市场经济的商业化之间寻找有效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跟整个学术研究的氛围息息相关。中国大学在强调学术制度和与西方大学接轨的过程中，在学术西方化、美国化仍然占据上风的大趋势下，西方大学的学术理念仍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大学的学术传统和观念，而中国大学的学术理念和传统如何确立和保持，尤其中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学术体系的不断重构过程中，能够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和而不同的普遍意义和指导价值，使

中国大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创新的高地，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担纲者，这是对中国大学学术的最大挑战。《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对今天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能提供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呢？

一、学术研究的思想观

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功能，即教学、科研和服务于社会，是在大学发展的历程中逐渐萌芽、发展和确立的。教书育人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服务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到今天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但不管大学如何与时俱进，作为大学存在基石和核心价值体现的学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斯·韦伯作为一名资深的德国大学教授，对于德国大学的学术传统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的变化尽管颇有微词，但对于大学学术仍然抱有一种真诚的希望，或者说持有一种纯真的学术立场与态度。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中，韦伯旗帜鲜明地表明："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的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其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证明我不只是专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上发前人未发之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今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他始终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当事人的人格。反之，唯有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在这篇演讲稿中，韦伯对于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一种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提升至人格的高度。韦伯甚至发自肺腑地认为："学术从业者本人，对他的志业持的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如果他确实有心追求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他会说，他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图求看见别人因为利用学术而获得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或是人们借此吃得更好、穿得更好，心智更开明，统治管理更成功。"从文中可以强烈感受到韦伯为"学术而学术"



的坚定立场和对待学术的纯真，韦伯不仅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高尚的志业，更视为衡量一个人人格高尚与否的重要标尺，鄙视了把学术作为谋生和仕途手段的行为。韦伯的这种学术理念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德国大学的后来者们，以至于有学者在评价雅斯贝尔斯时说："对于惊慌失措（身处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知识界来说，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些著名的哲学同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冲击之下背叛了自己的哲学理念，但是雅斯贝尔斯本人却壁立千仞，不为所动。即便是在有性命之忧的时候，他仍然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格，倘若罗马人在世，一定会授予他'vir fortis et constans'，即'贞固之士'的名号。"① 这是对坚持学术作为志业者的雅斯贝尔斯的最高褒奖，同时也可视为韦伯学术精神的延续，而学术研究中非功利精神和品格的延续，是德国大学（纳粹上台到二战结束期间除外）始终居于世界大学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形之下，中国大学的现代学术之路本来就短暂，并充满了坎坷和艰辛，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建立仍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不看到，当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迅速从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走向当今的现实主义，甚至实用主义，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学术研究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中国大学学术环境进一步改善，学术开放的程度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也更加多元和自由，但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在一个并非宽松的环境中却迅速自我放逐和放纵。学术研究的思想观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市场经济的清洗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从不唯功名走向只为功名，特别从90年代后期至今，大学在规模扩张和经济利益的挤压下，发生了种种巨变。学术自由本是大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大学一直追逐的梦想，但却迅速演变成了自由追逐金钱的游戏。学术基本的道德操守在物质主义的攻势下土崩

---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5页。

瓦解，学术的思想价值被迅速淡化，而商业价值却被急剧放大，学术研究成了一种获取功名利禄的终南捷径。尽管有学术良知的学者还在为严肃、纯洁的学术研究争取日趋狭窄的思想空间，维护日益萎缩的学术精神世界，但大学已经很少讨论并干预如火如荼的大学商业化，捍卫大学学术自由和倡导“为学术而学术”日趋式微，而把大学视为摇钱树却大有人在。这一切实际都源于学者学术思想观的根本性改变，学术已经不再是大学的梦想和基石，而成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舞台。学术不再是目的，而是成了手段。

对照反思一下20世纪初叶韦伯所提出的学术志业观，我们今天的学术观念是何等不同，又是何等现代和现实。百年之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在崛起，但相比百年之前，中国大学宝贵的学术传统在遭到现代性生吞活剥的同时，仍然还是难以承受学术精神之“轻”和引领社会之“重”。在观念决定行动方向和行动效果的时代，如果学术要成为提振大学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士气的号角，首先就需要建立一种真正从事学术的思想观念，需要一种真正为学术献身的立场和态度。学者的研究视野，不应仅仅停留在狭窄的职业问题上，还应该更多地停留在目前这个变革剧烈和精神、政治文明日益活跃的时代中，关注精神性工作的意义。这应该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操守和学术伦理，也是把学术作为志业的前提。

二、学术研究的价值观

事实上，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和前面所论问题紧密相关，也已成为目前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其分水岭就在于学术研究是立足服务于社会，还是服务于市场。为此，韦伯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在1900年左右，德国大学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认为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许多人一样，阿什比勋爵认为德国的模式是19世纪大学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为瑞典、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所羡慕和仿效”。但是，就在德国



大学的鼎盛时期，韦伯敏锐地注意到市场化对大学侵蚀的危害。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之中，通过对德国大学的深刻观察，韦伯对德国大学的“美国化”，即走上美国大学的发展路线表示忧虑。美国大学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大学，实际上是在服从和服务于企业，而韦伯发现德国大学正在逐渐向美国大学靠拢，这与德国大学强调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相去甚远，也违背了韦伯一直坚持的学术研究的风格和精神。在韦伯看来，如果一所大学与企业过分亲密，过分去满足、迎合企业的需要，那么就会逐渐丧失学术独立的地位，学者的学术自由就会走向不自由，最后蜕变成为企业的代言人。在那个时代，韦伯就已经意识到服务于商业化的学术研究对大学所造成的冲击和伤害。

不可否认，现代学术研究的成果是要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但关键是如何取舍。根据传统的思想，大学包容了高深学问体系，即便在这一信念淡薄了的今天，大学仍然被视为形成或解释及运用知识的地方，学术则成了如何形成、解释和运用知识的根基，尤其是知识的运用更是成为决定整个学术价值取向的关键。当代大学学术的走向问题，是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之所以热门，并不是因为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或是出现了学术大师级人物，而是因为今天大学过于门庭若市，过于喧嚣热闹，大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为决定未来地位和财富的名利场。大学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学术本身应该具有的道德、伦理和哲学价值几乎不谈，或谈之甚少，过于强调、强化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和应用性。既然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财富和地位，那么，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的非功利性特征就会被遮蔽，学术研究的功利性价值就会被无限放大。因此，现在学术的导向上，少了一些真知、真诚的渴求，而多了一些尘世、现实的追逐，使得整个学术研究更加趋于实际和实用，这无疑加剧了学术功利化的蔓延和扩展。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和基础性研究备受冷落，应用研究备受追捧就是明证。这种趋利避害的学术价

值观的泛滥，其更大危害就是动摇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平衡和基础。

但是，不管大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大学学术是大学的核心和基础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学术的基本价值就是原创性，创新知识和发现真理，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通过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知识，这是大学生命力的关键，也是大学能够存在的理由。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学术，终点还是学术，此所谓学术兴衰，事关大学成败。钱基博先生早就下过断语："学术神圣，则国家神圣；未有不学无术之国家而可长治久安也。"大学就是应该通过对学术精神的提炼而实现对一代代学子的熏陶，使其具有对学术不懈的追求和对真知不懈探求的精神和品格，使学术成为一种值得为此奉献，甚至献身的志业。学术价值观实际上更加体现出对学术理想和信念的秉持。学术和学术研究没有办法脱离尘世，但正因如此，才更加彰显学术的神圣价值。

大学如何把握好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把握好和市场之间的分寸，并非易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对大学的不断诱惑下，要保持学术研究的平常心和非功利心态，这不仅需要大学的定力，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德国大学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不受政府外的社会经济需求的影响，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学者仍然把国家看作是学术事业唯一合法的赞助人，并强烈抵制在大学事物中给予校外人士以一席发言之地。这种态度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大学的基本作用是非职业性的，它追求的是纯研究和纯学术。"① 而学术价值观的确立更多的也是在时代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合、提高和形成的。实际上，对于强调大学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论断，即使是走在市场化前列的美国大学，也仍然不是铁板一块，仍然有许多学者和管理者呼吁大学应该保持应有的尊严和独立，

---

①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 页。



恢复大学的传统，使大学回归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在其著作《21世纪的大学》中深刻地指出："我们决不能将眼光限制在只通过毕业生的谋生能力或其对社会的贡献来评价大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机构。因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以传统经久不衰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复杂的机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无数的方式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文明；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守望者，也是价值观、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守护神；大学不只在于教育和发现，也在于向现存秩序发出挑战并促其改革。大学除了荣耀过去，还服务于现实、创造着未来。"① 可见，西方大学的有识之士也对于大学，或者是学术过于追求实际利益，过于强化其实用价值表示不满。而对现代大学而言，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保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构建两者之间合理的张力，是保证学术研究健康和活力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韦伯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大学学术区区百年的发展历程，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学术之路和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一样，都面临着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在合理借鉴西方大学学术制度、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世间无所不能者，其实就是一无所能，大学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成为万能的。当大学忘却了学术的本质，抛弃了学术的尊严，失掉了学术的自信力，大学却极有可能是一无所能的。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无法提供解决所有学术难题的答案，而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之路仍将延续。只是今天的学术研究者如果能够保有韦伯式的纯真和执著，能够具有雅斯贝尔斯式的人格和魅力，也许学术成为一种志业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人人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学术尊严的回归，也就将不再遥远。

---

①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第五章　大学课程：跑道的倾斜和调适

大学的理想和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大学的观念，而大学的观念又是大学某一时期教育、教学发展和变革的深刻写照。十余年来，“大众化”这个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力，可能就是大众化的始作俑者马丁·特罗本人也未必能够想象得出来。按照马丁·特罗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方法、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的一系列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大学的现实面前，面对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的尖锐冲突，牵动大学神经的，就极有可能是大学观念的变革和大学如何设置课程这样的问题。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会带来大学剧烈的振荡，而课程改革历来是大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各种矛盾冲突最剧烈的焦点。因此，把握教育观念的变革和课程的发展趋势，根据人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设计和实施课程，是当代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保罗·朗格在他的名著《终身教育导论》中指出：“每隔十年，人们就面临着一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领域内如此广泛的变革，以至于昨天的解释已经不能符合今天的需要。”而“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课程建议，很大程度上使得教育围绕着培养出适应动荡不安的市场条件的国家公民这根指挥棒转，同时，课程理论化工作深深陷入缺乏远见的教学研究、神秘兮兮的后现代哲理，甚至像新要素主义这样的奇谈怪论之中”。



这样的教育发展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分析和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在更新高等教育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课程话语体系和实践范式。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中国大学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面前，帮助学生奠基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有追求探索的勇气、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课程，这个拉丁语中源出“跑道”的词语，赋予了当代大学课程极其丰富的含义，而“跑道”的倾斜和调适，可以体现当代课程在剧烈变化之中的价值追求和课程回归之路。

大学课程理念的变革与发展

高等教育观念的变革是为了突破对自身的种种束缚，而最终是要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与课程之中的。作为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难题之一，对课程的研究、设计和实施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课程观念的先进与否。

课程，英语为 curriculum，源出于拉丁语“跑道”（cursum race course），后转意为教育上的术语，意为学生学习的路线、学习的进程，因而课程有时又称为“学程”。根据叶澜主编的《课程改革与课程设计》一书所述，对课程这个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全部经验。其中包括有目的、有计划的学科设置，教学活动，教学进程，课外活动，以及学校环境和氛围的影响。从狭义上来说，课程是指各级各类学校为了实现培养目标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①] 而不管是广义还是狭义，课程都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在整个课程体系的变革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的课程理念，更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课程是大

① 叶澜主编：《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学最基本的元素，大学课程是大学内涵和价值精神的象征，大学在追求什么，必然反映到课程上来。

今天，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课程改革已成为高教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的教育目的都要以课程为中介才能实现。因此，课程作为教育的“心脏”，其健康与否往往对整个教育改革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而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势必也要调整课程设置，制订和采用新的课程计划。事实上，尽管课程改革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但和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比，不管是在宏观的课程理念还是在微观的课程设计、优化、整合、实施、评价等方面，我们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都还显得力度不够。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与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息息相关。无疑，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甚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热点和难点。

但是，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成了教育改革的主题和核心，都会对教育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课程变革自身需要深厚的、先进的教育理论、思想作为奠基石，更需要先进的课程理念作为支撑。今天，常挂在我们嘴上的一个词便是“知识爆炸”，科学知识整体化更成了现代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向（现代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发现几乎无一不是科学知识整体化的结晶）。这一趋向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各个不同学科之间或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更加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知识门类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上，并以此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和科学研究的生长点。可以这样说，当代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成果就是出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点上。这种既相互交叉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课程领域内，就出现了课程的变革——综合化趋势。出现这种趋势：一是对现代科学发展趋向的认同；二是因为有相当多的人对目前高校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提出疑义，



认为这样的课程结构还是重知识轻能力、重共性轻个性的单一课程模式，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是相距甚远的。当然，一个支离破碎或条块分割突出的课程体系必然和其课程理念密不可分，而一个符合时代发展尤其是符合人的发展的课程体系一定是在先进的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当今世界几个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课程理念指引下进行课程改革的。

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以1986年11月1日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发表的《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经验》为发轫。该基金会提出一种综合课程计划，这种课程计划“不仅要把学生引入基本的知识领域，而且要使他们明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最终把知识应用到校外的生活中去。这种综合课程关心的是所有人共同的普遍经验，关心的是那些人类共同参加的活动，如果没有了这些共同参加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削弱，生活的质量也会降低”。该基金会提出可供探讨的七个领域：①语言：关键的联系；②艺术：审美的经验；③传统：活着的过去；④社会机构：社会的网络；⑤科学：自然界；⑥劳动：职业的价值；⑦自我认识：意义的寻求。这七个领域都是可交叉、融合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强调培养基础宽厚、能适应未来变化的“通才”方面，综合课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专门人才质量方案》，要求在课程改革上打破原有的课程界限及框架，实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创造新型的综合课程。该方案导致许多新兴边缘综合课程产生，如环境工程学、教育工程学等。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领先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各大学能够开出大量的课程，包括综合课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智力平台。据有关资料记载，近年来哈佛大学开出的各类课程总数接近一万门，而北京大学开出的课程总数仅仅只有五六千门，但课程的差距还不仅仅是体现在课程的数量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一种对课程的认识和理解上。

设置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是二战以后英国高校课程改革的一大趋势。因为许多具有远见的教育家认识到，现代社会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而高校的分科教学，各学科相互割裂，均不利于解决工业化社会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更何况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如果高校培养的人才要为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那么就必须扫除高等教育机构中机械划分学科的障碍，让学生开阔眼界，了解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性。为此，英国战后创办的新大学为了避免英国旧大学学习过分专门化的特征，扩大了学科范围，开设了新的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一些大学废除了传统的学科，设置了多种学科群，围绕学科群来安排课程，从而使学生把专业学科的学习和一般学科的学习结合起来。

作为近代大学理念发源地的德国，其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模式，至今仍极其深远的影响着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进程。今天德国的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课程改革中，为了避免学院课程过分专业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近年来德国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中力图走综合化的道路，着眼点在突出大学课程与高等专科学校课程的综合化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在传统型大学中开始开设理工科课程，在高等专科学校中则设置了经济、法学、自然科学、语言学、农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课程，以实现人才培养规格的多样化。另外，德国的高等工业大学在打破旧的课程的隔阂方面也取得明显进展，加强了文科课程的设置，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有教养的，符合伦理道德观念的高质量的工程师”。[①] 这种人文学科与理工科课程的综合，拓宽了学生的专业面，充实了学生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职业适应能力。

---

① 贺国庆、华筑信主编：《国外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动向和趋势》，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60 页。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课程改革方面以符合时代发展的课程理念为指导，以课程综合化为课程改革的先导，形成了文理相通、理工结合、综合优势明显的课程结构，课程管理符合现代化水平，课程开发体现了一流的校园文化。那么，面对这种改革和发展趋势，反思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课程理念来指导课程改革呢？

在英文中，“理念”和“观念”均由“idea”一词表达，于是人们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上，理念同时包含着观念和信仰的含义，比观念更为本质和抽象，其核心表现在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实际上，人类教育史就是课程价值取向上的“人本化”和“实用化”这两种教育观的辩证发展史。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课程理念与以“有用性”为目的的课程理念相互冲突与整合构成了课程理念发展的历程。在课程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社会的不断变化对课程理念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在唯科学主义和市场经济甚嚣尘上、“以人为本”纸上谈兵的时候，如何谋求人的自由和谐的发展便成为衡量课程理念先进与否的试金石。法兰克福学派曾深刻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社会’，在这个社会，工具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奴役的基础。”① 那么，在这种渗透面前，我们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选择或确立什么样的课程理念，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确实步入了一个以前未曾有过的繁荣兴旺的时代。但如果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高等教育当前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尤其是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冲击愈演愈烈，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所

---

①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

遇到的问题的难度也将会是愈来愈大。客观地说，我们的社会（当然包括大学）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心态是失衡的，概括起来说就是改变事物的外在形态的愿望显然远远超过改变事物内里实质的需求，在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控制依然明显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一种急功近利的阴影里。这不能不让我们在直接关系到人的培养的课程建设方面三思而后行。事实上，以创新为使命与依据的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浅层次的方法与技术性问题，更为重要的则是教育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新的课程理念无疑也应该体现出本质性的变革——真正回归到以学生为本的道路上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建立一种“理想的课程”去教会学生获得足够多的与理解世界真实生活相关的知识、概念和技能。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课程理念常常认为课程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其职责、使命就在于传递被社会认可的所谓现实的主流文化，教育就是通过课程这种文化的负载工具及教学这个“特殊的认识过程”而使个体社会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即要通过何种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教会学生获得足够多的与理解世界真实生活相关的知识、概念和技能；特别是把知识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去引导学生全面地看待世界，更是一个课程认识与研究方面亟待解决问题。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改良文化、创造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平台。“而目前，我们的课程发展与文化之间始终沿袭着单一的、线性的、‘工具—实体’性关系，却完全漠视‘人’自身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非线性。在对功利的过分追逐中，课程的整体过程已由一种理想的、对真理的追求蜕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的灌输知识的操作活动。特别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课程驱逐了人的欲望、需求、情绪、情感、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纯粹的工具化窒息了课程本身的育人功能，它更倾向于如何使人服从一种‘工具的逻



辑'，进而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道德规范等。"[①] 而更不容乐观的是，课程逐渐丧失了文化加工、整合、升华、创新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可以武断地下这么一个结论，现有的课程迷失了"人"的方向。雅斯贝尔斯就认为："今天的大学像填鸭般的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②] 这样的现实和我们许多大学所提倡和所追求的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的理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追根溯源，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课程改革意味着能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意味着理想的"学校文化"的创造，而课程文化居于学校文化的核心地位。但在一个急功近利或目光短浅的社会中往往只能孕育出一种功利的课程文化，而功利的课程文化只能导致"目中无人"的课程理念的确立，最终这种课程理念指导下建构的课程体系孕育、分娩出的只能是"失我"的人或"单向度"的人。课程综合化实际上就是对人的主体意识被束缚的反叛与抗争，尽管目前课程综合化还谈不上全面，更谈不上尽善尽美，但为什么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改革都把目光投向了综合课程呢？事实上，课程变革的趋势绝不仅仅是课程综合化，本文仅以此为例来阐释课程变革和课程理念的关系。综合课程从本质上讲，它所体现的是教育文化，而非学科文化，而从更本质、更深层的角度讲，综合课程实际上是对目前课程体系及其运作的一种反动。因为它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价值的挖掘至少代表了一种新的课程理念和发展方向，说简单点，不管社会发展到何等地步，科技先进到何等程度，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的综合发展

① 刘继平：《课程的迷失与回归》，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3期。

②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

和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最佳发展模式。这告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课程理念和课程体系，它都必须深深植根于“人”这片沃土中，以“人”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全面发展为依据。我们应该明白，课程改革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得到与其成长相适应的教育，开发学生的潜质，使每个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充分学习、学会学习与发展，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社会化。美国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家多尔曾精辟地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课程不再是跑道，而成为跑的过程自身。而学习则成为意义创造过程之中的探险。”所以，万变不离其宗，现代课程理念必须实现人性的真正回归，并以此来完善面向“人”的教育。如果违背了这个宗旨，课程改革无疑是舍本逐末的。

我们常常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不是知识和认识的堆积。那么，我们高等教育的课程理念所注重的就不应仅仅是把人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而应立足于把人塑造成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并能够对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有最深刻的认同。为此，高等教育的课程必须以一种崭新的文化主体形态融入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此构建的“理想”课程理念和课程体系应该可以使我们的学生有超越单纯的物质利益的精神，有民主平等的博大胸怀，有思考、再思考、学会思考的习惯、意识和能力，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认真倾听来自社会与民众的声音，有对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简言之，让真实、丰富的世界走进课程，让学生在认识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成熟、长大，成为社会、国家、世界中积极主动、有责任感、有用的一员，这应该是我们课程理念的立足点。同时，应该引起课程理论研究高度重视的是，先进的课程理念一定是建立在开放的、包容的基础上的。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当代科学研究整体化的发展趋势，那么，如果我们在进行课程研究的时候，仍然囿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狭小范围内闭门造车的话，其课程理念和由此指导下构建的课程体系将仍然会是封闭和落伍的。因此，课程理



念、课程体系改革的价值取向应逐步与国际接轨，密切关注如国际化时代的“多元主义”教育价值观、“大众主义”时代教育民主与教育公平的观念、信息化时代的“主体教育观”等等新的课程发展观念，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一句话，如何既立足中国高等教育课程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在扬弃中，在对话和交流中，建构具有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风格并兼容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艰巨任务。

社会的发展迫使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复杂态势，也迫使我们必须更加理智地、客观地看待高等教育的发展。课程理念及课程的变革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主旋律，它既不可能停滞不前，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以积极的、合乎教育发展规律的、全面培养人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变革和发展。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中说过：“哲学家与教育家的全部职责在于根据现时的条件而不是过去的条件将真理、善良与正义的永恒理想付诸实用。而永恒的真理如果不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赋予新的意义，就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永恒的了。”但只要大学始终坚持从人的发展立场和人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角度去看待课程理念的变化，那么这种课程理念就应该是可以“永恒”的。

大学课程面临的选择困境

大学课程的确立、设计、建构和实施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选择什么样的课程对受教育者施加一种有利和有力的影响，却绝非易事。回顾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自从有了“课程”这个概念，围绕课程的争执、冲突和改革就没有停止，其焦点就在于课程体系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并决定了其将来的行为取向。如果从教育发展的

科学意义来看，课程作为教育的晴雨表，它是一个时代教育观念、教育取向和教育实践的缩影，课程使得整个教育体系空前严密、有序和实效，但课程本身却在一定的发展时期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张力和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意义，“课程是甄存、适应和创造文化的载体和工具”。更重要的是，课程还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对高等教育所持的态度、施加的影响和所抱的期望。所以，课程已经不仅仅是传统课程概念中的“学程”或者是“跑道”，抑或是后现代课程观念中“奔跑者”的概念，而是汇聚为各种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与实践模式相互冲突的结果。可以说，现代课程是附着较鲜明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多元色彩的矛盾集合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何满足学习者需要和社会需要，大学必然在课程选择上需要深思熟虑。因此，当代的课程研究应该特别加以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课程演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以后，其教育的育人功能应该如何体现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使得课程在宏观上，对于整个社会和教育的发展能够起到一种调校作用，使课程体系的价值指向具有针对性，而不失之偏颇；而在微观上，可以使培养的人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充分满足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学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呈现不完全一样的轨迹，这是由大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毕竟社会现实和大学理想有时候相去甚远，大学毕竟也不是普通的社会机构。因为大学不仅是追求真理、传授知识的重镇，还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理想和精神的文化家园，尤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大学扮演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角色，起到社会净化的作用。由于大学课程是整个大学教育体系的发动机，也是整个大学理想和精神的具体化身，因此大学课程的选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常常会发生较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学理想与当下社会经济利益互相博弈的



过程，这就是大学课程选择的困境。美国当代大学课程专家格夫（Jerry · G. Gaff）指出："课程永远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战场。也是一个可以从处于许多不同的有利位置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智力丰富的概念。"实际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以下这样的核心问题，大学应该开设什么样的课程？通过课程传授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培养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而居于问题最前端的就是开设什么样的课程。追溯课程历史，从高等教育课程演变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大学课程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主义的课程体系，即强调对人实行一种博雅、自由和全面的教育；一类是科学实用主义的课程体系，即强调对人实行一种专业或职业的教育。这两类课程成为大学课程发展史上交替出现、各领风骚，且相互制约的课程教育理念和课程实体。而选择不同的课程理念和课程实体，恰恰又是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人的发展表达强烈诉求的结果。尽管早期的大学以"象牙塔"自诩，以培养博雅之人为荣，但大学走入社会，乃至融入社会却是大学发展必然的结果。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专业化，大学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一员，越来越无法摆脱社会的影响和束缚而遗世独立；而当人的教育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的时候，它又对自由教育产生了一种向往。课程就在这样的否定和肯定中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徘徊前行。

事实上，大学形成的初期并不把有用性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它围绕人的心智训练对高深学问进行研究和传播。随着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寄予更多的功利期望，"有用"的专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用性"成为大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当代，尤其在一个科技水平高速发展，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甚嚣尘上，而人的精神需求和理性思考却遭到颠覆和怀疑的社会现实面前，课程是服从于现实，还是着眼于未来；是听命于市场经济的指挥，选择一种功利和实用主义的课程思想为指导，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技术性、应用型人才，还是服

从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发展需求，强调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和智慧力量，选择一种强调自由教育的课程思想为指导呢？这既是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追问，也是对当前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合理性的怀疑。如果不得不承认传统大学的象牙塔伦理观念正在进一步让位于世俗化的市场伦理，那么，大学崇尚的传统的自由教育，甚至专业教育也正在逐渐让位于更加实用和功利的职业教育。随着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现实，还要面临一个文化多元和文化分裂的时代。大学既然不可能置身变革之外，那么，影响课程走向的经济和市场投机行为就可能使得高等教育既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解释，也不能对“现在”作合理的判断，更不能对“未来”有所展望。这是当代大学课程选择的尴尬，也是大学课程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及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下，作为文化和育人的重要载体遭到的冲击和解构。实际上，当代大学正在逐渐选择一种更加实用和功利的技术主义作为课程指导的倾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呼应经济和社会现实的课程体系，这已经不是秘密，而是目前的现实。大学课程向技术化和职业化发展的趋势，诱使学生在现实面前更加现实，课程体系建设的过度实用化也导致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呈现浅薄化和功利化的趋势，而忽视了对未来的展望和预判，高等教育的课程有成为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工具的危险。不能不承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已经向世俗社会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责大学成为功利主义的俘虏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大学的社会化和大众化浪潮，使得大学必须越来越紧密地依赖社会和经济来赢取社会声望，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也使得对经济效益的追逐成为当前大学的主旋律。大学的许多改革名为课程改革，实际核心内容还是围绕着经济利益闻风而动，经济利益已经成为院校之间竞争的重要砝码，因此课程改革顺经济效益而动也就理所当然。“大学的改革作为一种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期间所蕴涵的规律绝非



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程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① 确实，由于大学课程和商品经济及市场利益紧密相连，知识的作价叫卖也就成为必然，而选择一种适合现实和经济利益的课程体系也的确表现了大学的无奈。自从大学逐渐走向现代社会，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课程思想作为课程体系建构的基础，首先必须考虑课程面对日益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如何才能有所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高等教育变革传统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需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社会的主流趋势就是要把大学办成全社会服务的中心，这些因素对大学课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英国著名课程论专家丹尼斯·劳顿从社会学角度来界定课程的定义时所言："课程在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传统大学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社会生产力低下，大学和社会保持了一定，甚至相当的距离。因此，在课程的选择上，可以根据人的发展，设计"自由"而"博雅"的课程。当代社会，由于大学和社会的关系结合越来越紧密，大学更多的必须依附于社会才能获得很好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只有获得资金、生源、技术力量、社会声誉等的支持，才有可能在大众化时代脱颖而出。因此，大学选择对社会的积极呼应，课程趋向于实用化，大学成为人才流水线，似乎也无可厚非，毕竟现代大学服务于社会已经成为大学一个重要的功能。

当然，尽管我们承认大学课程应该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尽管当代大学已经出现了对现实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过度呼应

①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载《上海书城杂志》2003 年第 8 期，第 33 页。

的言行，但任何事物所具有的物极必反的规律，也同样呈现在课程思想的选择上。任何一种课程思想的确立，在对其他的课程思想形成冲击的同时，它也必然需要适时吸收一些其他的课程思想，使自身的课程思想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使整个课程体系保持合理的弹性。因此，虽然实用主义的课程观念和课程体系已成为当前课程建构的主流，“但是，大学教育也是大学生们寻求认同感和生活意义的重要时期。当追求名利的风气弥漫校园的时候，学生们更应该超越自己的私利，了解周围的世界，树立公民的和社会的责任感，为社会公益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在我们这个充满危险的分裂世界里，怎样才能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呢”？英国著名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写道：“通向文化的道路必须经历，而不是绕过一个人的专业化……只有把他的技术同社会组织密切结合起来的学生才称得上受过普通的教育，不能把他的技术同社会组织密切结合起来的学生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好的技术员。”因此，对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度呼应，招致的课程体系的实用化和功利化倾向并不代表大学课程发展的必然和最终选择，当大学课程走入一种极端的时候，尤其是课程对人的主体价值形成极大遮蔽的时候，超越这种课程的局限也就成为必然。大学也好，社会也好，最终还需要一种超越现实利益的精神和理念来支撑和体现人的主体价值和思想力量，犹如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修专业的课程，“概括起来都必须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本学科所要考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本学科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本学科所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什么”？[①] 而这些问题表明，课程的本质与市场并无太大关系，但与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却息息相关。大学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课程理念与课程体系，都必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给人腾出一个思考和发展的空间。

---

①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演讲》，涂艳国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 页。



其实，高等教育的课程总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摇摆，并力图寻找一个暂时的平衡点，以维系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这是高等教育课程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学所提倡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初衷，与社会追求的现实和功用形成了巨大反差，而这种反差就是推动大学课程改革的重要动力。大学只是一味强调维系传统，弘扬理想与精神，坐而论道，就意味着大学与社会的距离渐行渐远，大学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旗帜就是一句空话；而大学和社会贴得太近，又意味着大学完全听命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大学就会失去社会良心存在的价值而成为社会的奴隶。如何调和大学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就是当代课程选择的难点和重点，从目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高等教育课程单纯强调自由、博雅教育，那么大学成为社会的智囊和加油站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过分注重专业职业教育，把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欲望视为课程构建的唯一目的，那么课程有可能失去平衡教育价值走向的意义，可能使课程进一步走向工具理性化，更可能使人的教育问题更加尖锐。这些课程观念和课程体系都不完全符合社会和人的发展现实。社会在前进，大学在变革，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当代大学选择一种整体性知识观，建设一种融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为一体的大学课程体系，应该是当代大学课程发展改革的主要趋势。普通教育关注人的心灵和思想发育，专业教育使人获得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两种课程体系的有机结合使得人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成为可能。权衡之下，选择建立采两者之长的综合性的课程观，才有可能实现当下大学课程建构的真正价值。

当然，必须承认，整体知识性的课程观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要想迅速体现其课程价值并非易事，毕竟课程理想和教育现实之间还有很大的鸿沟需要跨越。特别是整体知识性课程如何实现两类课程的融通和整合，通过什么方式来构建课程体系，具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这样的课程体系如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需要等等，都是整体性知识

课程观从理论设想到体系建构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大学课程选择之难凸现了人和物质世界的冲突之剧，也表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比较成熟的课程指导思想和课程开发范式，尤其缺乏坚实的、系统的课程理论来作为课程改革的支撑，使得课程建设呈现不稳定和非理性的摇摆。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出我们高等教育的课程领域还缺乏更多的交流和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现代课程语境下，我们的课程思想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超越方面的艰难选择历程。但是，这种艰难的选择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重复和照搬西方高等教育课程的理论和开发范式，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与西方高等教育的课程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和基于自身课程观念和思想日臻成熟的基础上，勇于改革，走一条具有中国高等教育课程特色的创新之路。

当代大学课程选择的艰难，说明了高等教育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说明了要走出课程选择的困境，需要我们具备更新的课程视野和课程观念。而要真正建立起一个符合人的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大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融通

作为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本科教育历来都是课程改革的最基本动因，而教育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张力也是迫使课程不断进行调整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全球化逼迫下的高等教育，如何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促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又如何构建人的发展平台，这是今天课程改革无法回避的现实。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指出：“在一个变化多端的、破碎的社会里，本科生教育的最重要产物就是不受教条束缚的，由人文主义价值所滋养的有判断力的头



脑。"[①] 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承认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深层化的发展趋势，而人的发展也越来越处于一种失衡状态的话，本科教育应该如何去面对这种现实的挑战，培养具有“判断力的头脑”呢？

截至2009年，中国大学的全日制学生数量已经突破2 800万人。本科教育作为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对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众多的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中，课程和课程结构问题，由于直接关系到整个本科教学效率的高低、教学效果的优劣，乃至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成为影响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课程理解的浅层化，导致我们仍然从观念上囿于对传统课程概念中对课程“跑道”的浅层诠释和理解，而缺乏对课程动态、立体的“奔跑者”——学生——的必要关注和认真研究。说到底，就是课程理念始终还是缺乏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个体差异的深刻关注。其次，课程理解的偏差化，导致本科课程体系设计的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搭配失衡，导致学生对知识结果的追逐远胜于对知识本身所蕴涵的智慧、真理意义的深刻体悟，在较为狭窄的课程视阈内使学生丧失了富有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和强烈创新冲动的可能。加之现行课程体系受到经济化和实用化的影响，使得课程体系中功利主义的色彩日渐浓厚。以上弊端，影响、制约了学生知识建构的完整性，造成学生知识观、价值观、世界观呈现出片面化、极端化和功利化倾向，完全不利于学生“判断力头脑”的形成和创新思想平台的构建。

因此，在课程现状和学生需求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在专

① 德里克·博克著：《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侯定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版。

业课程和通识课程日益成为本科课程改革的焦点问题的时候，本科课程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现实，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过合理的课程内容整合和课程体系的结构调整，构建一个符合人全面发展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课程平台，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对目前本科课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专业课程和正处于成长期的通识课程，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两类课程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究。

一、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重要意义及相关问题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说道："人类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教育只能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使人的发展。"[①] 但这种"无限发展的可能"却必须依赖教育活动和教学内容的逐步实施、完善才能最终实现。因此，现代大学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当培养目标明确以后，应该围绕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来整合越来越多的课程，通过教学的有序、有效展开，引导学生学习、学会学习和创造性地学习。

专业课程作为本科学生知识来源的主渠道和专业技能形成的主战场，占据本科课程的核心地位本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大学教育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专业教育。专业课程强调的"术业有专攻"是对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技术性回应。同时，在知识的创造、创新正日益成为大学发展新趋势的时候，专业课程是夯实创造的基石。同时，本科教育的许多目的，比如批判性思维、交流技能、判断和容忍等等，同样可以通过专业课程的教学来实现。因此，本科教育中任何忽视和削弱专业课程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在社会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逐渐深层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化和文化思想日渐多元化的影响下，人与社会、自然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加剧。作为回应，大学的专业也越划越窄，课程越分越细，以为通过更专业的训导和更细化的课程就可以应对社会，尤其是人的发展需要了，殊不知，人的发展却由于过分专业化的束缚而趋于孱弱，人的思想越来越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失去自我，失去判断力，最终蜕变为一个“单向度”的人，社会发展也由于人的畸形化而日益破碎。因此，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时候，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仅仅只是安身立命的基础，还需要不断补充大量的知识，以期获得作为一个人将来持续发展的多元能力。这就需要知识的广博和视野的开阔，尤其是知识运用的态度和方法来作为支撑，而这些就不完全是专业课程可以提供和代替的。西方大学之所以较早提出“通识”这一理念，其目的就是要弥补人在教育过程中的“营养”失衡状况，使人得到更全面的健康发展。

其实，对于大学本科阶段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强化专业课程的弊端，很多有识之士早有警惕。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们今日所有学校不是不通达，便是似通达其实不通达，严格言之，似乎根本不以通达为职志……就是大学教育也无非是造就一些专才，一些高级的匠人，西洋有此情形，效颦的中国自更不免有此情形。目前实际教育的危机，最迫切需要改革的一事，我以为莫大于此。”①而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大学的必然选择。作为时代发展和人的发展需求，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通识课程开始逐渐占据本科课程的重要位置，标志着大学教育绝不仅仅是专业教育的缩影，而是维护大学教育的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也是本科教育更加注重“人的教育”的真实体现。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通识

①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课程的价值在于养成科学和文明的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深切的体验和感受，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备理性的力量。通识课程可以让学生明白，大学教育决不是纯粹知识的灌输或单纯技术的训练，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心灵启蒙的教育。“如果沿着这个脉络思考，大学不应蜕变为现代学术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工厂，而应是培育理想、支持探索和鼓励批判的场所。”① 通识教育作为伴随大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事物，它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对大学教育的一种补充和丰富，通识课程作为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载体，无疑会进一步夯实学生知识建构的基础和提高对客观世界的阅读能力和判断能力。“尽管难以给通识教育下定义，它的实现也极具挑战性，但这难以捉摸的通识教育的目标可能依然是使学生为终身学习和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的最好途径。”②

但是，认识到通识课程的价值并不代表已经完全理解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更不代表我们的教育已经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合理地规划、设计和实施了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及其课程作为西方大学中带有鲜明西方文化烙印的舶来品，在现代大学历史不过区区百年的中国，要真正理解、合理构建和有效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现在把通识教育做了一种不太准确的定位的前提下，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什么才是中国大学的通识课程？通识课程是不是只有完全照搬西方大学通识课程的模式，甚至课程结构、学分结构都必须和西方完全“接轨”，才能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呢？有没有可能根据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在合理借鉴西方大学通识课程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一套符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体系，做到和西方大学和而不同？

---

① 黄坤锦著：《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5 页。

②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 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 页。



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大学通识课程应该成为体现中国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部分，而不仅仅亦步亦趋或拾人牙慧，并充分认识到课程作为一种隐性文化影响力的深入性和长远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通识课程的建构确实是影响并决定着是“中国的大学”还是“在中国的大学”的一道分水岭，值得关注和重视。

二、通识课程在本科课程体系中的结构调整问题

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是目前本科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类课程如何合理搭配，即结构问题是使课程发挥作用的关键。抽象的课程结构是指“学校课程中各组成部分，重点要考虑各种内容、各种类型、各种形态的组织、排列、配合的形式”，它要解决的是根据培养目标应开设哪些门类的课程以及课程的编排和整体优化，具体体现为教学计划。目前的本科课程体系中，课程一般分为：（1）公共必修课，包括英语、计算机、体育、法律、思想品德等；（2）专业课，包括专业主干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各类选修课；（3）通识课；（4）公共选修课。因此，在明确了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重要意义后，课程结构的合理化就显得至关重要。

课程是由教学内容和学时数来决定的，再好的课程离开了上述两个因素都会失去意义。现在本科院校的课内学时数一般在 2 600 ~ 2 800 学时之间，而通识课程所占的学时数一般在 270 ~ 280 学时左右，大约占总学时的 10%，学分数大概也仅占学生学分总数的 10%。从本科人才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角度上看，通识课程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课程结构明显不合理，导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体现通识教育对人的整体素质提升的意义和作用，几乎不太可能。在这样的课程背景下，大学的通识课程被异化成仅仅是在专业课程以外提高学生兴趣和扩大知识面的课程，而并没有把通识课程看成是本科专业课程和学术训练得以延伸、拓展的平台和手段。通识课程很多都开成了大而杂的拼盘式课程和蜻蜓点水式的

概论、简论形式的课程，既缺乏必要的大学教学的学术氛围，又缺乏知识的逻辑性和开拓性特征，使得通识课程徒有虚名，违背了通识课程设立的宗旨，失去了通识课程开设的意义。

那么，通识课程应如何建构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通识课程意义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层面上，仅仅是做了一些技术层面的解释和操作，还缺乏对通识课程的整体性，以及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区别和联系作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通识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还处在一种简单模仿和照搬的习惯性思维与做法之中。甚至在强调通识课程的价值和作用的时候，还可能人为地去削弱专业课程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导致整个课程结构失衡而使人才培养目标难以实现。

其次，课程的设置是有限度的，既不能一味地削减，也不能一味地提高通识课程的比重。目前的通识课程教学时数和学分的比重只占了所有课内教学时数和学分数的10%左右，而笔者认为，通识课程的比重应该逐渐提高到25%左右更合理。理由如下：第一，教育目标实现程度的高低和教学投入的多少是成正比的。如果我们已经认可通识课程所体现的巨大价值和潜在意义，那么提高通识课程的比重应该是势在必行。第二，通识课程应该进一步精简整合，改变现在通识课程大拼盘的模式，借鉴国外大学通识课程设置“核心课程”的成功做法，使通识课程成为学生专业课程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尤其是需要在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专业课程的“深”和通识课程的“博”相得益彰，填平目前两种课程之间人为设置和传统影响的鸿沟。第三，由于大学专业课程长期以来在专业教育唯我独尊思想的影响下，俨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要改变专业课程唯我独尊的局面，必须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通识课程的比重不可能马上就有显著的变化。所以，将通识课程的比重逐渐提高到25%左右较为适宜，也符合教学改革循序渐进的实际规律。从20世纪以来大量的中外大学课程改革的实践



来看，大凡卓有成效的课程改革最终采取的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即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而不是超越。因此，只有客观地看待，理性地分析，科学地实施，并且通过合理的课程体系的建构，才有可能把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学生真正具有“博学”、“慎思”、“笃行”的个体力量。

因此，面对人才培养目标，在研究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结构问题时，应进一步加大通识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权重，使通识课程真正成为专业课程的补充和延伸，否则所谓“宽口径”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三、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内容整合问题

1. 专业课程内容整合的必要性

课程结构调整是为了课程结构的优化，而课程结构的优化必须建立在课程内容优化的基础上，否则，再好的课程结构也不过是徒有其表。专业课程作为本科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而从目前的课程改革进展来看，专业课程的变革是所有课程中最小的，这本身也反映出专业课程改革的难度和改革的阻力较大。由于目前本科课程体系中，公共课程的比重居高不下，有些学校的专业课程比重已经降到了课内教学时数的40%以下，相当多的学校仅仅是维持在40%左右。特别是大批教学型本科院校，在强调“宽口径”的时候，专业基础课程比重的持续下降，实际上已经直接动摇了本科教学的人才培养基础，有可能使得人才培养既不能体现“宽口径”的广博，也无法体现“厚基础”的扎实，更谈不上将来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专业课程有可能从以前的唯我独尊滑向自我放逐的尴尬境地。当前尤其应该认识到，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专业课程是通识课程必要的基础和手段，通识课程是专业课程必要的拓展和延续。把通识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目的是为了弥补目前专业课程在知识横向联

系上的不足，以及消除人才培养价值取向上过分功利主义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专业课程的取消或削弱。课程改革不能非此即彼，更不能极端化。

要认识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问题，就需要弄清目前课程设置的意义和价值。大学学习无非是三个层面的学习：第一是认知方面的学习；第二是技能方面的学习；第三是情操意志方面的学习。以上三个方面的学习，如果从课程结构的功能来划分，专业课程要解决，通识课程也要解决。如果从课程结构的重心来看待，专业课程着重要解决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而通识课程则侧重于第三个层面。换句话说，在整个本科教学阶段，决定人才质量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合理设置，两者占据本科课程的主要地位是由大学学习的特点所决定的。目前，一方面要采取“停、转、并、改、增”的方法对本科课程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有必要对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进行合理整合，打通两类课程的有机联系，使学生的“知”、“情”、“意”得到和谐发展，奠定将来“行”的扎实基础。

事实上，专业课程之所以屡遭诟病，主要原因是相当一批专业课程学科设置老化，内容和研究范式陈旧。“当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和表达模式的时候，我们的现场教学仍然始终坚持使用一种低水平的解释模式和表达模式，其结果是既不能带动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又迫使学生负担许多过时的知识，造成学生的知识超载。”① 课程缺乏创新力，学科之间过于封闭，教学手段单一，从而使学生丧失了专业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从后现代教育发展观看，不过于追求知识的统一性、整体性、普遍性和确定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课程“不是传递所（绝对）知道的而是探索所不知道的知识”的动态发展过程，专业课程尤其应该倡导建构主义的动

① 朱小蔓著：《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9 页。



态、开放的知识观和课程观。只有在相对开放和宽容的学术氛围中，给予学生以充分的学习自由，让不同的学科在频繁的“越轨”中不断扩展和自主生长，允许学生在大量具体的跨学科和专业课程中自由选择，寻求自我发展，这样的专业课程才符合课程发展的基本宗旨，也才能最终体现专业的基本特色。

因此，专业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是简单的课时量加减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思想的引领，在加强专业主干基础课建设、优化和整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建构新型的专业课程体系。

2. 通识课程内容的整合

通识课程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打破过分功利化和实用化的课程理念，尤其是冲破形而下的技术化课程设计模式的藩篱，教学真正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来合理地进行。甘阳在《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一文中提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作现代整理，并以此逐渐形成我们大学的核心课程传统。”① 这种“核心课程”应该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打破唯西方通识课程马首是瞻的心理情结，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精神需求视作课程立足点，教学内容充分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具备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学术视野，体现人类共同的生命诉求，其潜在价值是唤起大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起码尊重和认可。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地论述，本科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作为目前支撑本科课程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分别决定着人才培养的“厚”和“宽”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本科课程结构的比重应逐渐调整为专业课程占45%，通识课程占25%，公共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占30%。这样的课程结构符合高等教

① 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第64页。

育发展状况，也符合本科培养目标中“厚基础”、“宽口径”的基本要求。

本科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存在的问题，迫使大学在改革的进程中要进一步确立大学课程体系中通识课程的重要地位，积极寻求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合理建构和融通，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而从目前本科课程的发展趋势看，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加强基础理论性课程，强调综合性、实践性、通识性课程建设的多项措施。现代大学教育面临的现实是复杂而极具挑战性的，如何在教育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在教育机会平等与学生能力取向之间、在保持传统与展望未来之间、在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体社会规范的建构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这是所有大学课程改革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第六章　大学文化的异化和重建

提起大学文化的异化和重建，总让人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大学本来就是传播知识、崇尚文化的地方，也是所谓的文化人集聚的地方，何谈文化的异化和重建？文化，这是任何一所大学所应具有的基本特质，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标志。大学和文化的话题，是在文化遭到比任何时代都更彻底和猛烈的冲击与解构，大学文化成为异化的对象之时，大学面临着的深层次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大学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社会和公众长期以来对大学的信赖感；这种危机迫使大学文化必须重建，以寻找大学前进的方向，重建公众和社会对大学的信任。

任何一所希望面向世界的大学，首先就要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在不断的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并使这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溶入大学的血液之中，使得大学能够成为在一个过度迷信技术和崇拜金钱的世界里，真正成为传播真理、超越现实和追求自由的象征。一个国家仅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够的，仅有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够的，仅有少数人的富裕也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共同富裕还是不够的。必须不断促进所有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分享程度以及他们全面发展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制度创新。大学文化建设的更深刻含义就在于保证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大学作为文化的一个载体，大学制度的创新和大学文化的建设息息相关；大学作为一个新观念、新知识、新人才的孵化器，决定了它只有不断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才有可能保证它的创新

活力。而大学文化的先进与否决定了这种制度是否有利于人的和谐和全面的发展。有了这种文化支撑的制度，才可以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的环境，也才能真正使大学具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气氛。

现代大学——技术与文化交锋的阵地

韩水法先生的《大学与学术》一书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和观点，作者尤其尖锐地指出："十余年来，从黎民到首揆都在不断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的渊薮，而沦为平庸的乐园？"[①] 这表达了对大学现状的失望和不满，也触发了我们从科技化时代的大学这个特定层面去探究今天大学的走向，以此更深切地感受大学何以不能成为"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的渊薮"，而"沦为平庸的乐园"。

现代大学的诞生，不仅使得大学逐渐成为令人兴奋的知识中心，而且在发展科学和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人类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人类的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人类的思想可以自由而独立地交流。同时，"知识就是力量"犹如一把锋利的剑，刺破了茫茫黑夜，引领人类不断前进。"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有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的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②] 可见，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使得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传承有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把人类的文化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

① 韩水法著：《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 页。

② 〔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力，也需要大学成为科学技术的中心。因此，对人类文化的传承和科学技术的利用、创新，依然是当今大学的主旋律。

对历史的追溯，使我们看到现代大学诞生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科学知识向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发起了挑战，挑战神权、挑战愚昧，呼唤人性的回归，维护人的尊严。而只有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有可能战胜黑暗、愚昧和神权。人类开始第一次借助科学的力量摆脱蒙昧的桎梏，成为时代的主人。而当人类有了用科学战胜蒙昧的巨大成就感后，对科学的感激、崇拜，甚至迷信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文明的最重要产物——技术，更是给了封建社会致命的一击，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从此把人类带入工业革命的时代，人类也开始享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快感和物质幸福。进入 20 世纪后，科技成为人类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不贰法宝，尤其是对技术的顶礼膜拜已经遮蔽了科学的理性价值，技术取代科学，成了人类改天换地的利器，而对技术采取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使得人类只重视科技的实用价值，忽视了科技自身潜在的、丰富而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于是，在人类物质文明的成果空前繁荣之时，人类的悲剧也屡屡上演，战争屠戮、生态恶化、文化危机、信仰沦落，无一不带有技术鬼魅的影子。但是，在经历过如此惨痛的教训后，对科技的误读和滥用，到今天为止并没有明显停止的迹象，这似乎应验了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物质的光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穿透人们的头脑，而理性的光束要想穿透人们的头脑却是如此之难。"尤其在实用主义思想泛滥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已经很少冷静、理智地思考科学技术的真正含义，而总是急功近利地希望借助现代技术手段这个工具，实现快速或者跨越式的发展，一夜暴富成为很多人的梦想。至于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和谐地发展，却完全置之脑后，对科技文化深层次研究的缺乏和对科学伦理的忽视，造成今天整个人类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面临这样畸形的社会发

展趋势，面临整个时代发展的过度技术化倾向，在科技逐渐占据了人的思想、主宰人的行为时，大学何去何从，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代大学曾经以其崇高的声誉赢得了社会和公众的尊重，而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发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而其核心就是始终把人的发展视为大学的最高宗旨。但是，随着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逐渐占据当代人类生活的舞台，在一个崇尚技术理性的时代，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大学有逐渐让位于技术化大学的发展趋势。而更不幸的是，号称“社会良心”的大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技术至上运动的推波助澜者，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高科技更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神话，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使得大学也在拼命追逐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和享受巨大的财富效应。大学纷纷成立了或想成立科技公司，甚至梦想成为上市公司，曾经遗世独立的大学借助科技的力量、借助社会和公众对大学的信任，摇身一变成了科技的代言人和财富的象征。今天的大学，真有从“象牙塔”直坠尘世的感觉，大学已经很少关注学生的心灵发育，很少倾听师生的声音，更多的是关注如何能使自身变得更大、更强，如何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插上科技的翅膀，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现代科学技术可以使人面对整个世界，甚至可以使世界站在人的面前，但再发达的技术却解决不了人心灵和思想的问题。在所有现代化的难题中，人的现代化是最难的，于是，人的精神世界在与物质世界的碰撞与交锋中，常常显得无力而沮丧。很多学生在大学除了学到有限的知识和掌握了一定的职业技能以外，情感和心灵都无所寄托，思想也得不到历练和提高，而成了心灵的流浪者。大学之“大”和人的心灵世界之“小”的巨大反差，使人顿感技术在人的心灵世界面前的无力和无奈，更感大学在大步走向科技时代时，人的精神发展却远远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人的支撑。

曾几何时，大学一直把追求真理和科学视为自己的天职，更把文化建设和人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根基，这是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却轻易地忽视或放弃了这样的责任。现在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几类，且不说这样的划分是否科学和合理，或者完全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单是这样的划分就很容易把高等教育导向一种误区，即人是可以分为研究型和应用型的，研究型高高在上，应用型紧跟市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学教育仍然还是一种对人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刻教育的过程。人才的培养既要立足现实，更要着眼未来；既要培养能力，更要培养人格。这种培养需要技术作为手段来支撑，但绝不应该把技术异化为人才培养的唯一目的。现代大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它需要为社会和经济服务，但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知识和学术的组织，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机构。大学是为学术和真理而存在的，不管什么类型的大学，都不能随意歪曲和降低大学的基本宗旨和育人标准，因为大学首先是一个培养有文化、高素质的人的地方，一个能够自由和充分思考现在和未来的地方。遗憾的是，当今大学的一个主流趋势就是把社会的需要完全视为大学的需要，大学必须紧跟市场和社会，社会风尚成为大学的风向标。在这种非理性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经济推动下，不少大学打着应用的旗号，把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简单定位为应用型人才，但对于什么是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如何为市场和社会服务，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得到有效的培养和开发等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一些大学既不为学术，更谈不上为真理，只管通过技术的加工和技能的培养把学生推向社会，就等于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使命。至于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人的教育，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帮助学生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则忽略不计，丰富而深邃的大学教育有被单一而实用的技术教育架空和取代的危险。教育

的经验已经证明，大学教育如果过分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性反而可能在现实中不实用。因此，尽管现在的大学在快速走向科技化时代，对科技的利用和开发也已经成为一种主旋律，但是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没有随之提升到一种不同凡响的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学过分看重学生的所谓社会应用能力的培养，即技术性，而对学生应该具有的思想和文化素养，以及将来的发展潜力和学习能力关注甚少。当代技术的滥觞，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无根的一代”和文化虚无主义者。技术的发达，使得学生与同时代的信息交换愈加快速，但却与异时代的伟大思想和心灵交流更加闭塞，掌握技术已经超越对真知的渴求，对职业的渴望远胜过对事业的追求和忠诚。大学只是完成了对人的粗加工，还缺少精雕细琢，更遑论打下精神的底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社会中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比比皆是，但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却凤毛麟角。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绝不意味着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和思想修养的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一所大学只有技术性，只为技术性，没有了文化追求和精神渴求，完全忽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格养成，还能称得上大学吗？也许这正是韩水法先生所感慨的“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的原因所在吧。

此外，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才的急遽需求，刺激了大学的神经，加上知识经济的风生水起，大学很快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社会主角。科学，尤其是技术的强力介入，帮助大学可以完成以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被批量生产在后工业时代变成现实，而被批量生产的人对消费时代和商品经济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技术的更新换代渴望之至。这种倾向成为一种潮流，大学文化被技术价值所替代，大学思想被功利主义所吞噬，最终，大学培养的人成了经济时代的技术符号，被经济利益所淹没。大学教育应该给予人的精神启蒙和砥砺的作用丧失殆尽，大学正在蜕变为工场，已经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事实。大学的“自我异化”使大学所提供



的全面教育成为片面的技术教育，这种教育成为商品时代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职业训练的教育。而最可悲的就是，大学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竟然愿意这样异化。中国的大学需要大师和思想来成就未来，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大师和思想不是依靠技术可以塑造出来的，更多的是取决于大学文化、传统和精神的积淀，取决于大学学术的深度和力度，更取决于大学育人的高度。轻文化而重技术，这与大学之道实在是背道而驰。过分看中技术的实用价值，而忽略文化的隐形价值；注重对人的技术塑造，而忽略对人的精神影响；重视人的商业实用价值，而轻视人的社会效应和人文价值，这恐怕也是中国大学缺乏原创性思想和不能成为知识渊薮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大学对大学文化和人文环境建设退避三舍，而对科学技术趋之若鹜呢？一方面，在一个高度科技化的世界里，大学是很难真正做到独善其身的，毕竟大学只是社会的一个部分，社会的疾病是很容易侵蚀大学肌体的，更何况现在大学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强。另一个方面，这和大学目前仍然缺乏自主、自由、宽松、和谐、安静的软环境，过于注重高等教育的短期绩效，讲求功利，弱化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今天的大学，从教学管理到教学活动的实施，从课程设计到课堂教学，从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到学生的学习和学分，这些构成了大学基本教学活动的环节和形式，无不闪现着技术的影子。有了技术的强力介入，减少了许多管理环节，大学的管理效率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降低了大学管理的成本，这无疑是现代科学技术对大学的贡献。一句话，技术提高了教学和管理效率。但是，大学对技术的认识、利用和开发，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层面之上，不应该只看中技术的经济价值和效益，更不能把技术凌驾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因为技术只能“管”，它无法“理”，更不会讲道理。现代大学发展到今天，尽管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育人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性的

改变，育出有文化修养、文化品位的人应该是大学的基本教育职责和培养底线。事实上，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教育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非“精确的知识”或“高明的技能”，人的成长更多的是心灵交汇的结果。科学知识作为教育的载体，它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成为可能。“一个有教养的人不仅关心自我，还关心他人；不仅关心人类，还关心周围的事务。这种关心伦理的存在，使‘平等、公正和自由’的人类最高永恒价值得以弘扬，它把‘做人’（文化素养）和‘做事’（技术素养）完整地统一在个体大胆追求自己可能幸福生活的人生旅程之中。”[①] 大学就应该用科学技术为培养这样的人服务，而不是相反。

此外，我们还必须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对于人类进步功不可没，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技术又恰恰是工业社会诸多不文明现象的始作俑者。重技术而不唯技术应该是人类一个基本的共识。21 世纪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但是，决定一所大学是否是一所对真理和知识不懈追求的大学，是否还是社会的良心和旗帜，是否还能成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就决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对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也不应该完全唯社会是从，更不应该把人视为器具而加以塑造。孔子云：“君子不器”，乃是对教育何以为教育的最好注脚。一所只是满足于眼前利益，只注重对人的技术开发，只是满足于经济现实的大学，是不可能真正有大作为的，也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学生。大学是选择技术还是选择文化，不一定像哈姆雷特作出的选择那样会决定生死，但它可以决定一所大学育人的高度和发展的方向。大学走向科技世界是大学发展的潮流，大学走向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大学发展不变的主流。现代大学，只有更深层次地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心人的心灵和思想，把人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

---

① 钟启泉、高文、赵中建著：《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编者前言。



展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营建大学文化新体系　夯实大学发展的基石

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深远的，而对文化的功能与作用如何认识，以及认识程度的深浅，常常影响我们对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研判。大学文化体系的建设作为大学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和意义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巨大的，尤其在今天文化多元和文化冲突不断的时代，大学的发展已经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了。因此，如何认识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提升大学的文化建设水平，构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大学文化新体系，特别是把人文精神融会贯通到高等教育文化体系的建设当中，以夯实大学发展的基石，是当前高等教育能否稳步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

今天，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不管是从教育观念、思想，还是从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规格，高等教育办学多样化以及大学对社会的贡献等等方面来看，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当一个事物发展、积累到一定的水平和程度时，尤其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每提高或前进一步都可能会是困难重重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其阻力骤增，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甚至深层化，都可以说是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遭遇文化裂变和转型的阶段。现在的高等教育在赢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耀的同时，也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压力——来自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压力。当然，压力是关注，也是动力，它至少说明在当今社会中，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已经成为一台功率强大的“服务器”，它的运行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民众的思想和言行。不过，现在的

问题是随着国家各项改革的推进和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不平衡、基础较薄弱的情况下如何去满足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的需求，难度无疑是巨大的。在这种状况下，高等教育要发展，除了积极整合现有系统资源以外，还必须使自己这台服务器升级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以寻求发展的支撑和突破，而这个支撑的平台就是大学文化新体系，或者说是大学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文化体系对教育的推动常常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进行，如果我们缺乏一种正确认识大学文化建设的新观念、新思路，就很难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当前各个大学都把狠抓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作为摆脱“扩招”以后教学质量、人才培养水平下滑的突破口，这个认识应该是符合现在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的，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狠抓教学质量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呢？因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然和当前教学过程中的诸多做法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支点的、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念和一种单纯盲目追求知识生产的文化观念的冲突，笔者暂且把它视作一种因为对高等教育自身文化建设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观念冲突吧。

纵观现代教育史，人类自从步入工业文明，尤其是进入现代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所谓后现代社会以后，教育总是在人与自然（传授知识、生产知识，提高科技水平）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发展、现在与未来）的两大文化难题之间徘徊。而今天，在各级各层次的教育活动中，包括高等教育的教育活动，事实上更看重的是对前者存在的问题的探讨，而忽略的是对人自身的文化问题的解决。这种倾向导致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我们总是巴不得给所有学生都贴上创造和创新的标签去适应未来变化莫测的世界。在这样的前提下，且不说我们是否有把创造和创新过于概念化、简单化的倾向，



创造和创新是否能信手拈来，也不说我们的所有学生有无可能都应该或必须具备这种素质，单是看看今天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形势就知道理想和现实有多么大的差距了。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层次的教育，从理论上来说都必须有深厚的文化思想积淀，包括深厚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这种积淀和指导反映在教育活动中就是一种对人的精神关怀。如果理论缺乏这种积淀，就极有可能使实践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狭小空间内去闭门造车，由这种理论指导的实践也迫使大学逐渐异化为知识生产的工场，学生成为一名知识的装配工而完全失去精神和思想的主动性。大学生是文化人，但文化却失去了灵魂。

所谓教育，即教书育人，这是不言而喻之理。儒家传统中的“成人之教”、“圣贤人格”，古希腊的“人文教育”，体现的都是把培养有教养、有境界、有思想、有责任的人当做教育的核心理念。照这个理念，大学教育应该是教最高深的书、培养最全面的人。遗憾的是，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神濡养下，大学不仅没有能够充分做到韬光养晦，其教育理念反而还时时透露出目光短浅、心浮气躁的毛病，不是人云亦云，便是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缺乏一种长远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整体指导性思路，往往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和当前大学自身轻视文化建设，尤其是既没有能够尊重、重视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更没有能够做到从东西方文化的有机整合中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以丰富的人文教育为内涵的文化新体系有关。

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次教育改革实际上都起源于当时文化的变革、冲突和震荡，其结果也必然是对教育的涤荡和形成对文化的一种反作用。因此，如果把文化建设割裂于大学建设的门户之外，是既不理智也不明智的，对高等教育的发展

更是极其不利的。其实只要想想，如果教育目标背离了对“人的建设”和人文关怀这最基本的出发点，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可目前高等教育仍然过分强调硬环境建设，而较忽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建设这样的软环境建设。曾经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高等教育并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我们的知识生产缺少生命力，从概念到概念，不能抵达概念之外的具象、感觉、实践。”① 这实际上是揭示了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还缺乏大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观念的弊端，高等教育还没有以一种崭新的文化主体形态融入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特别是整个大学文化体系还缺乏真实的人文精神的熏陶。所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突破口应该放在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大学文化新体系当中。

从实践上说，由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整体上尚不注意、注重和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与嫁接，整体上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一种先导性和创造性，反映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就显得指令性较强，指导性不足，对物质技术层面太过于强调，而对人的精神层面则关照不足。比如，整个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计划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围绕学生的发展和未来进行设计？现在很多学校的教学计划，不客气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应景之作的大拼盘，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随波逐流，缺乏一种稳定性和前瞻性，随意地加、减，为了特色而特色，为了素质而素质，也为了创新而创新，而当代文化对各个学科的深刻影响以及学科发生的急剧变化在我们的教学计划中很难得到尊重和体现。课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缩影，是一个学校教学活动的心脏，可我们专业课程的课时已经降到了可怜的程度，并且还有一降再降之虞；很多选修课的开设大多数

---

①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载《当代》2004年第1期。



是因教师设课，而非因学生需要设课，这造成了学生的专业课和选修课之间由于缺乏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关联而失去平衡。课程中能充分体现学术前沿性和跨学科性特点的教学内容凤毛麟角，更遑论具备强烈文化张力的课程了。教学方法上，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说，教学方法应该是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中的一种全面和科学、民主和辩证、不断推陈出新的教学思想，这种思想的精髓在于激发学生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学习的主动性，训练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教育过分注重科学和知识的功利价值，只强调了知识的概念系统和所谓的完整性特征，而忽视了科学发展的思维特征，忽视了科学进步的批判精神，甚至忽视了人对科学的正确解读、体验和把握。"然而，将教学作如是解，恰恰扼杀了透过现代性的层层迷雾看清其实质的创造能力。于是，那些最充分地'掌握'了当代规范的学生，在理想、道德、情操、社会良知方面恰恰最为短视，最无见地。"① 这种对教育（文化）极其功利的认识最终必然导致学生知识学习与思维发展的分离，也是对"人活着的全部价值和尊严就在于思想"的粗暴践踏。可以看出，这些教育当中出现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实际上与大学缺乏有力度和有深度的人文精神根基作为整个大学文化体系的核心基础有极大关系。

试想，如果要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培养学生具有超越单纯物质利益的精神，具有民主平等的博大胸怀，具有思考、再思考、学会思考的习惯、意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并能认真倾听来自社会与民众的声音，具有对真理与理想的不懈追求，而高等教育自身的文化体系建设却又滞

① 〔加拿大〕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0 页。

后于时代和人的发展需要，则我们拿什么去面对学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学生的功利化和实用化倾向呢？必须要承认，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处在激烈动荡的时代，教育很难置身事外，“越是激烈变化的时代越需要文化的整合，而变化当中的文化又是难于整合的，这是一个悖论，也正是知识界责任格外沉重的道理之所在”。[①] 这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启示我们，一是目前，高等教育责任格外沉重的原因与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分不开；二是对高等教育在新时期发展的观念认识上，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去思考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也许对我们纠正理论和实践中的偏颇之处会有很大帮助。

目前，高等教育的文化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另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大学应有的文化氛围。大学文化建设尽管谈了很多年，但始终收效不大，效果不明显。原因何在？关键还是客观上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干扰，但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主观上对文化建设的抵触、排斥和基于狭隘化的误读，造成高等教育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缺乏有机的、直接的联系，很难从传统文化的源泉中和当代文化的飞速发展中汲取营养。高等教育文化建设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显得要么底气不足，要么人云亦云，其结果也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范、失序。“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形象失落于传统和现代的对垒中，失落于适应与超越的矛盾中，失落于转型时期的文化困境中。”这种失落从根本上说是整个大学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人文精神失落的直接写照。如果高等教育不下决心营造一种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的发展，以尊重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那么将很难走出迷茫的现实困境。因为文化上的亦步亦趋，最终是很难摆脱东施效颦式的悲剧的。

翻开不长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有两段历史至今仍让

---

① 菲利浦·G. 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入世”：并非全球化明智之举》，卢爱珍编译，载《新华文摘》2002 年第 10 期。



人回味无穷，一段是“五四”时期，一段是西南联大时期。两段不长的历史孕育了一批有学识、有见识、有胆识的栋梁之材，至今我们的大学都还蒙受其恩泽。细想一下，蔡元培提出教育的“兼容并包”何尝不是文化“思想自由”的必然结果呢？梅贻琦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又何尝不是文化“厚德载物”的深刻写照呢？这两个阶段绝非国泰民安的时代，却恰恰是文化冲突剧烈的时代，也是大学文化体系建设中把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发挥到极致的时代。这样的历史不就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最好范例吗？对照历史，今天大学文化建设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今天的高等教育，很多问题仿佛都是大学体制的束缚和管理制度的僵化造成的。不可否认，确实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但如果做一个逆向思考的话，是不是以上问题一旦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将会迎刃而解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在当今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总是徘徊在教育的狭小范围内来思考问题，甚至是一定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教育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如果不将教育当作文化来分析，那么任何研究都会有将整个大课题琐碎化的危险。”作为整个文化衍生物的教育，如果无视文化的发展，那么其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影响，甚至会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总之，说得更直白点，现在大学观念的缺陷，实际上是大学自身在文化建设观念上缺陷的折射；这更深刻地反映出，在强调人文精神、人文教育多年以后，我们高等教育的文化新体系建设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

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还不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大学必须深刻认识到，“教育与任何显性化、工具化的东西是无缘的，教育直指人的精神世界，教育的功能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功能，是一种思想性的把握人的功能”。[1] 因

---

① 朱小蔓著：《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此，“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抓好大学的文化建设，真正从人的建设出发，真正把大学自身融入时代的文化主体形态之中，在此基础上去创建具有时代特色，真正以人为本的大学文化新体系，是保证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应该是中国大学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

《大学之理念》之现代文化意义

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留下了许多经典著作，以及名声显赫的教育家，而对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其身份认同更多可能是源于对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认识。但让人意外而产生浓厚兴趣的是，雅斯贝尔斯不仅毕生探索和关注人的存在问题，他还高度关注大学存在的意义。雅斯贝尔斯从一个大学资深教授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人的角度出发，出于人的尊严和坚定的大学信念，言简意赅却又意味深长地表明了自己的大学观念，这就是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一书。这本内容不长的书，不算作者的“主流”作品，却是作者关于大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深情述说，以及对大学文化的深层次阐释。

一、雅斯贝尔斯的人生经历

简单回顾一下雅氏的人生经历，也许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体悟《大学之理念》不无裨益。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雅斯贝尔斯1901年进海德堡大学主修法律，次年转往慕尼黑大学继续就读，后又转往柏林大学和哥廷根（1903—1908）大学主修医学。1909年2月以论文《思念家乡与犯罪行为》获得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尝试运用现象学的理念，直接研究患者的意识经验，企图建立单独属于精神病的病理学。1911年，雅斯贝尔斯根据临床经验及病例分析，撰成《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并发表，引起



德国医学界重视，也为他从医学领域横跨哲学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一年，他和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相识，并于1912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担任精神病学助理研究员，1916年任海德堡大学心理系教授，1921年又受聘为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这时的雅斯贝尔斯已成为德国著名哲学家。在其1931年出版的《现代人》一书中，他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1932年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主义哲学三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1933年纳粹执政后，因其妻是犹太人而遭政治迫害；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除大学教授职务，在整个纳粹执政期间饱经磨难。二战后，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此后一直住在瑞士直到去世。从雅斯贝尔斯的人生经历来看，还有谁能够比这样一个在学术上涉猎如此广泛、思想如此博大精深、人生却又如此跌宕坎坷的人更有资格来表达对大学的情感和传达大学的理念呢？

二、雅斯贝尔斯与《大学之理念》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强调只有生存才是人的真正存在的形式，而唯一能达到生存的途径是显示生存，即发现、表现人的各种可能性。他承认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束缚，但又认为通过“超越存在”的追求可达到无限和完满，并指出要想达到超越存在，只有借助非理性的内心体验以及信仰。如果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换成更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这种存在主义思想对人本心理学和心理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借助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探讨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回顾历史，《大学之理念》一书写于希特勒专政的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际，当时的德国刚刚经历了最深重的灾难洗礼。战争的创伤可以通过时间的流逝来疗治，而民族精神的创伤犹如人的毁灭一般，让整个国家和民族堕入罪恶深渊而不能自拔。而对于大学而言，许多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要么选择缄默，要么选择成为纳粹暴政的

帮凶。在那样一个人的道德遭到最大质疑的时期，作为暴政的受害者，雅斯贝尔斯没有心存芥蒂而怨天尤人，反而是以德报怨，以自己的崇高人格，诚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书写了重建德国大学的新篇章。以至于哈佛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尤里希在这本书的前言里由衷地赞叹："对于惊慌失措的德国知识界来说，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一些著名的哲学同事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冲击之下背叛了自己的哲学理念，但是雅斯贝尔斯本人却依然壁立千仞，不为所动。即便是在有性命之忧的时候，他仍然显示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格，对于这种人格，倘若罗马人在世，一定会授予他'贞固之士'的名号。他不仅谈论真理：他生活在真理之中，一如他要求所有想成为具有真实可信的生活良知的人要做到的那样。"① 只有精神高贵，信念坚定，对大学怀有深厚和纯真感情之人，才能享有这样的赞誉。

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教育学的世纪，所谓教育学的世纪，是指人从机器中解放出来，以此相应，教育也应当把塑造人、塑造全面优秀的人性作为自己的第一目的。"② 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把大学视为了培育人性、塑造人格、实施人道的存在家园。聚焦现实，今天中国的大学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逐渐中心化了，但大学却遭遇了未曾有过的危机，从制度、学术到精神信仰的危机。在这种"笑贫不笑娼"的学术走向中也就不难发现今天中国大学深层危机之所在。作为大学根基的学术自由，在中国大学却始终未曾找到自己独立、独特的位置，学者的学术操守被兑换成了金钱和地位，大学主体的人，其地位却受到了空前的削弱，这种趋势使得整个大学呈现空心化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雅斯贝尔斯这本诞生于

---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② 李泽厚、刘再复：《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载《读书》2009 年第 11 期。



人类最危难时期的著作，也许会让今天的大学重新认真思考大学存在的意义。而透视《大学之理念》一书，其实就是对今天大学现代意义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三、大学存在的哲学意义

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十分关注大学存在的普世价值，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始终坚信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的地方，而不是欺骗和强权横行之所在。在纳粹统治时期那样黑暗恐怖的年代，雅斯贝尔斯仍然怀着对大学的热爱和学术信念的秉持，掷地有声地说出了“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大学是这样一处所在，在这里，凭着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一段特定的时光被专门腾出来尽最大可能地培养最清晰的自我意识。人们出于寻求真理的惟一目的而群居于此。因为这是一项人权：即在某个地方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探求真理，并且是为真理而真理”。[①] 而蔡元培先生于北大上任伊始，也曾毫不犹豫地表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②] 琢磨一下，两人的话语是何其共通，其精神追求的内涵又是何其相似。其实，不论中西大学，对大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和认识都是共同的。雅斯贝尔斯甚至进一步提出：“精神、人的存在和反应性的理性，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处境。精神是理念的支撑和动力。人的存在，在其最充分的意义上，表现为我们

---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②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追求超越之物的那种严肃的、无条件的忠诚。"① 今天来看，这种忠诚，“是试图将传承文明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的伟大理想，也是一个国家的大学免受各种外来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摆布，从而真正在探求知识，延续文化传统、培养国民性格方面为一个国家奠定了真正的精神基础”。② 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基础和超功利的哲学价值追求，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日耳曼民族和日耳曼大学，今天仍然能够赢得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从哲学意义上讲，大学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一批不唯名、不唯利的学者，始终把注意力放在精神世界的超功利追求上，才维系了大学存在的希望。雅斯贝尔斯强调：“大学里每一位成员、教授及学生的基本意识是，他要努力工作好像被召唤去做最伟大的事业一样，但另一方面则始终承受着不知自己能否成功的压力。因此最好的态度是以这种想法来反省自己，严于律己，同时也不必过分期待等到外界的承认。"③ 这种超功利的态度和精神实质就是大学精神和传统的内涵，也是大学能够持续获得社会和公众认可的关键原因。可是在今天日益宽松的环境里，大学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高贵精神，为真理而真理的执著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了为金钱而金钱的游戏。在我们希望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堡垒，在为大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争论不休的时候，不经意间，大学的传统和精神在市场经济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对传统和精神遭到“异化”而能够予以反抗的力量，本应是来自于对永恒价值的坚守和理想信念的追求。

越是在危难的时候，人越需要理想的支撑。雅斯贝尔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始终坚信理想信念的力量。“大学的理想

---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

② 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载《读书》2004 年第 1 期。

③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7 页。



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合符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大学生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和磨难，以此寻得理想的亮光。"① 大学理想的亮光，今天也许已经不再像大学诞生之初那样微弱，但薪火相传的不只是知识和技能，也是文明的延续，更是人类理想的延续，这是大学存在的最重要价值，也是雅斯贝尔斯哲学信念的深刻体现。

四、大学学术存在的文化意义

大学学术是现代大学的奠基石，每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忽视大学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在《大学之理念》里，雅斯贝尔斯对于大学立校之本、发展之路的学术研究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并表达了对现代大学学术研究走向实用主义的担忧。"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真正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大众所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的学校。"② 雅斯贝尔斯对于大学学术研究中过于投社会和公众所好的所谓学术研究表示了批评和质疑。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而是大学存在的哲学概念，更是一个信仰、精神概念，它预示着大学存在的合理，甚至合法性。

---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7 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无独有偶，在两百年前的德国，其现代大学的奠基人威廉·洪堡就意味深长地指出：“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提高，从而不断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的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① 可见，大学学术和社会、政府的需要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大学学术繁荣的基本前提之一。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的学术思想不仅是对威廉·洪堡的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精神的传承，同时也是一代代德国大学的守望者，例如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甚至马克斯·韦伯等人对大学学术使命的深刻思考。

事实上，雅斯贝尔斯对于大学为社会的服务并非一味否定，他认为：“大学的生存要归功于社会，社会需要在自己领地内的某些地方可以开展纯粹、独立、不偏不倚的研究。社会需要大学，因为它感到在自己范围之内的某些地方纯粹地服务于真理对自己是有益的。”② 可见，雅斯贝尔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大学已从象牙塔中走出了。但大学纯洁和高尚的精神追求是让人保有对人生的美好回忆和未来期盼的重要途径，大学既然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一员，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要有效地约束社会和人的物质越界，对公众社会能够有效制约和批判，使平等、自由、公正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而并非饥渴地盼望一夜暴富。

反观现实，在教育全球化、学术商业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学术迅速放弃了抵抗，学术领域几乎很难寻觅到批评探索和文化抵抗的空间，尤其是捍卫大学传统价值的空间。学术

---

① 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



本来可以挑战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由于其自身被商业所包养，学术的集体失语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学术自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整个大学的学术活动和当代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贴得太近，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方向性，把经济上的得失视为学术的终极目的。事实上，大学不管如何发展，功能如何多样化，它的本质始终是一个服务于大众的公益机构，而非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大学的商业化倾向表明了大学正在逐渐失去独立、自由的地位，而沦为社会和商业的附庸。大学学术的商业化倾向，一方面显示出大学不再远离喧嚣的社会和人群，越来越多地矗立在财富中心，大学不再只是出售，而已经是有买有卖了。另一方面，大学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了应用性和商业性的领域，通过知识的转化来获取利润，大学已经显现出企业化和公司化的迹象，非常热衷于与商业结成伙伴关系，目的是寻求更大的资助和资源，生产可销售的知识产权，反过来这种知识产权又为学术和商业带来利益。这些行为不禁使人产生很多疑问，大学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为公众还是为资本所有者服务？学术价值是否可以完全成为商业投资的理由？如果商业投资是学术研究的前提，那么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又如何体现？如果学者们总是双眼紧盯市场和钞票，那么大学学术研究的超功利意义又何在呢？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经不无深意地指出，任何事物过于实用反而不实用了，中国大学学术的走向当引以为戒。

五、大学教学存在的文化意义

作为一名德国大学的教授，雅斯贝尔斯深受德国古典大学传统的影响，非常注重修养、科学和自由对人格塑造的影响。但雅斯贝尔斯在强调大学所应具有的精神理念和学术追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学最基本的职能——大学教学。而对于作为大学教学主体的学生，雅斯贝尔斯有着独到的看法和认识，首先他认为尊重学生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前提，尤其

是在学生人数剧增的情况下，“为了迎合这种新的大众教育的要求，大学已经被迫采用了中学的方法和程序”。因此，“尊重对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尊重，所有劳作都将是无用功。尊重是所有教育模式的主旨所在。人类的本性要求他承认这条绝对真理的存在。倘若没有这条绝对真理，所有这一切将会失去意义”。① 他的这种认识对于今天身处大众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学而言，对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因为今天的中国大学太需要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了，毕竟大学的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育人。

此外，雅斯贝尔斯非常看重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启发。“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② 在雅斯贝尔斯的眼里，教师的职责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另外，在今天特别强调大学教育的专业性、职业性和应用性的时候，如何满足学生将来发展的需要，这是大学面临的急迫问题。而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中早就认为：“大学必须为大学教育这门职业奠定一个双重的基础。它必须灌输一种对于科学观念毕生的忠诚，同时也必须要灌输一种对追寻知识之整体性的忠诚。这两个方面对于所有的智识职业（intellectual profession）都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职业所要求的都不仅仅是限于特殊技能的例行公事。医生、教师、管理者、法官、牧师、建筑师，其中任何一种人，从它特有的职业角度来看，都和整全的人有关联，都和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境况有关联。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 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 页。



倘若其中有哪一门职业疏于促进我们和整体之间相关联，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或者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所有这些职业的训练是没有远见的，也是不人道的。”① 这种深刻的见解，这种对于“整全的人”的认识，一方面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如何教书育人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对于今天许多大学把注意力仅仅只是盯在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上，盯在就业市场上，而忽视学生整体素养的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养成，不啻为一针清醒剂。

德国大学曾经以其刻板的学术训练闻名，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种训练与人的培养是格格不入的，过于呆板的教育制度对大学生的心灵发育是不利的。因此，雅斯贝尔斯认为：“自由是大学教育最重要的因素，它与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僧侣教规和军事专门学校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学术训练是格格不入的。那种对科班训练和领导权威的服从，使得每一个学生都不能激发起一种真正的求知欲望。”② 作为大学教授的雅斯贝尔斯深知一名大学生成长的艰难，因此对于大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订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象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③ 可见，雅斯贝尔斯认为，理想的大学不仅要使人成为某一类人，更是要使人成为伟大的人，这才是大学普世价值的真正体现。

---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②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③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之理念》作为一本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学术著作，较为全面和深刻地阐述了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理念，表达了作者的大学情怀，也传递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最可贵的是作者身处逆境仍能保持了一位学者的良知，没有在纳粹暴政面前丧失人的尊严，用生命探讨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学之理念》在雅斯贝尔斯的作品中确实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和划时代的作品，但却是作者谱写的大学华章。今天管大学、教大学、上大学的人或团体，应该可以从这本书里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时代还远没有来临，大学的责任和义务也还没有全面体现。大学文化的重建对于中国当代大学而言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问题，《大学之理念》一书实际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认识到了大学的现代文化意义，尤其是保持大学文化独立、自由的可贵，毕竟文化的“理念会从内心深处激励着我们，与此同时，它又作为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在召唤着我们”。① 这就是雅斯贝尔斯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大学存在价值的深刻诠释，也是对现代大学发展的一种激励吧。

大学文化的传承和超越

大学发展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一个文明历史悠久，当今又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重的话语分量的国家，没有若干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现实。但如何发展，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是中国这样的现代大学后发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影响大学发展的因素很多，面对21世纪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一个最不易量化且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因素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为文化以无形的力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量渗透到了大学的各个角落，成为影响一所大学具有什么样的理念和精神的试金石，也成为决定一所大学发展高度的标杆。可以说，大学发展的水平和大学文化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奥尔托加·加塞特在其经典著作《大学的使命》一书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①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金耀基认为，清代颇有争议的曾国藩，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在国势衰微之际，在传统文化江河日下之时，之所以选择站在了清朝一边，"与人民为敌"，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是他看到了挽救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而同样也是为了挽救中华文化，"五四"一代青年才俊才不得不坚决打倒中国文化，因为"只有毁灭，才能重生"，超越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加塞特和金耀基所表达的意思是异曲同工的，当文化成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信念的时候，如何坚守这种文化信念，使之既能传承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又能超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意义上的保守性，就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学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的一个分支，也必然需要通过传承和超越来选择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完成自身的文化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最终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旗帜。

大学文化之所以日益受到关注，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全方位化和深入化，高等教育的问题日益增多，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大学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得大学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社会和公众对大学这个曾经具有良好信度的社会机构还能否实现真

---

①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5 页。

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充满了疑虑和担心，毕竟今天的大学现状和公众的期望值相差甚大。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大学可能需要寻找新的改革思路和模式，才有可能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回顾中国的改革历史，往往呈现这样的一种改革思路，即非常注重改革的初期效应或短期效应，通过一种既简单而又易操作的改革方式来快速获得社会和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改革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很容易在短时期内取得较明显的成效，获得较多的舆论支持和公众信任。但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这种改革方式较为简单、较为感性，非常注重物质层面改革成果的缺陷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回顾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就最为突出的这十年，即 1999 年至今，大学改革的力度、强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民众的求学热情，以至于大学就像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一夜成名，获得了社会和公众的极大青睐，在不长的时间里积累了足够高的社会信誉度和公众关注度，使其快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事物盛极必衰这种自然法则，大学也不例外。近十年来的大学改革，必须承认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是积极的，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效果相当明显，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极大地提升了整个国民教育的水平和素质。但认真反思一下，当初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做法现在看来还显得缺乏较为缜密的理性思考和科学决策的基础，尤其是对大规模扩招以后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入研究、预判和相应对策，对社会和大众的理解力和承受力估计过高，大学和市场经济联系得过分紧密，过分注重大学物质层面改革的成果，对隐型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关注不够，大学文化处于无根和无序状态，导致大学建设陷入重物轻人、重管理轻制度、重科研轻教学的一系列不正常状况之中。可以说，大学改革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大学与人的关系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

要消解这些问题，绝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关键是我们面对众多问题时如何能够做到冷静思考，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



非理性行为，改变目前大学过分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倾向，把大学文化的建设上升到一个战略层面的高度予以重视，通过大学自身的净化和升华，重拾大学的信心，重新赢得社会和公众的信任。因此，大学文化在今天成为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绝非偶然，因为文化对大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学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存文化和发展文化。而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大学文化对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显性和隐性影响，以及如何理解大学文化对大学的影响和作用，是谈论大学文化建设必要性的基础。大学不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然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如仪器和设备、大楼等等，都只是大学的物质存在 。今天对大学文化的重视，反映了整个高等教育对于自身身处困境而希望寻求突破和超越的努力。现代大学历久弥新，重要原因在于其积淀的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其发展，中外著名大学无一所不受其深厚的大学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如果说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那么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薪火相传，就在于不断超越、不断创新”。[①] 大学文化富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但又有其特殊的深刻意蕴，在一个文化纷争、物欲至上的时代，大学迫切需要拿出勇气和信心，把传承优良的大学文化传统和在此基础上的超越视为今天大学发展的紧迫问题。

一、大学文化是传承和超越真理的文化

“所谓真理，不过是针对人认识生活和探究自然的可靠性而言的。”[②] 大学对真理的探讨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以真

---

① 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载《学习时报》2007 年 8 月 27 日。

② 吴松著：《大学正义》，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理为友”揭示的就是大学文化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核心之所在。

真理意义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不断地探索、探究未知的世界，去寻找一个既包含物质也囊括精神的世界。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在黑暗的中世纪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就在于它的诞生使人类有了追求真理的场所，成为人类精神生命得以维系的家园。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整个人类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真实写照；罗马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加说过：“如果你对真理永不满足的话，那么，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无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对真理的不断超越和突破的决心和勇气。现代大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大学就是一个与真理相伴随而共同发展的场所。大学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正是在对真理的不断发现、发展和超越中体现出来的。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都是在大学文化追求和超越中实现自己的真、善、美的价值。“真理仅是要经受时效检验的假定，绝不是千秋不移的成规。所谓绝对、所谓标准和所谓权威，都需经受社会活动的鉴定和考验，否则不啻是束缚人们智慧发展的障碍物。”“大学理应来者不拒，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妥协，只要他们是冲着真理而来的。”①

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很难用追求真理的尺度来衡量了。而今不少大学已经逐渐失去了追求真理的信心、恒心和勇气，耐不住真理追求和学术探讨的寂寞，反而过分热衷于市场和经济，对于市场社会的甚嚣尘上推波助澜，而对于真理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熟视无睹，过分热衷于现实社会中物质利益的追逐，对“权”、“钱”、“利”的兴趣远胜于对“真”、“善”、“美”的渴求。物质文化的极大膨胀和精神文化的不断萎缩造成了大学文化精神内涵的极度失血，最终使得大学在需要人的道德、正义和良心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从教学到科研，从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教师到学生，从学术到学位，弥漫着浓厚的实用主义气息，对真理的追求早就让位于对物质的渴求，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也已让位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整个大学对真理的追求已经被架空，以至于整个大学精神的空洞化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大学传承和超越真理的更现实意义还在于，在我们这个民族迅速获得物质的满足感的同时，民族精神生活的引导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对真理的认识和看法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决定了这个民族是有否远见卓识，是否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充满了渴望和期盼，也决定了这个民族能否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大学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大学教育所给予人的，不应当仅仅只是思考，还有思考的道路和勇气，以及更重要的思想。……而相对于结论而言，方法和精神是最根本的。……告诉学生这些，就像教会学生理解数学中的公理和人世间的常识一样关键，因为告诉学生认识真理的'元方法'、'元精神'，就是引导他们走上接近真理的途径。"[①] 大学缺乏了对真理的主动追求，就根本谈不上对于人的精神启蒙和浇铸作用。如果人只满足于眼前利益，人的精神的钝化就在所难免，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一句空话。今天大学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在一个物质主义至上的世界里，使大学成为真理的"守望者"，使每一个大学人既有传承真理的信心，又有超越真理的勇气。

二、大学文化是追求理想和崇尚道德的文化

理想是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大学也因为崇高的理想而超凡脱俗，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尘世的崇高地位。对于大学理想，纽曼在其经典名著《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指出："大学并不是诗人或不朽作家的摇篮，也不是学校奠基人、殖民地领袖或民族征服者的诞生之地。大学并不是有望使人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亚里士多德或牛顿，成为拿破仑或华

---

① 吴松著：《大学正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盛顿，成为拉菲尔或莎士比亚，尽管此类自然奇迹以前曾出现在大学范围内。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提炼民族品味，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交往。这种教育能给人以对自己的观点与判断的真理，给人以表述这种观点与判断的口才，给人以倡导这种观点与判断的力量。"[①] 纽曼的这种观点代表了现代大学的一种“普世”理想，也体现了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追求。

对于今天中国大学的理想而言，都普遍希望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识教育、学生自治之类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上，使大学成为真理探索、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些基本的东西是大学理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但是，今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当大学有了理想后，它是否能够不为世俗所动而秉持这种理想。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成为知识和精神的化身，就在于它始终执著地追求理想。这种理想极有可能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但正因如此，才体现出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今天，大学的一个悲剧就在于总是把世俗社会的理想和大学的理想混为一谈，社会需要大学走出“象牙塔”并不等于大学自身不需要“象牙塔”的理想精神，大学服务于社会并不等于完全听命于社会，甚至要唯社会的需求马首是瞻。如果社会的理想和大学的理想画上等号，那么大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

此外，大学不仅是理想的家园，更是道德的家园。大学文化作为大学精神的体现，它首先就应该体现出是一个社会道德的维护者。现代大学的典范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8 页。



堡曾经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使大学生能够在人格、道德上得以完善。大学的基石如果说是人文精神，那么道德就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很难称得上是受过教育的人，遑论高等教育；而一所不能在道德上给予学生崇高追求，使人保持着是人，并使人学着做更好、更高大的人的大学是不能称其为大学的，充其量只是一个职业培训所而已。中国社会目前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人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等已经遭到很大的冲击。大学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它应该而且必须承担人的道德的重建工作。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严重倾向就是唯分数论、唯智力论、唯现实论，人的道德的崇高感、精神的愉悦感、审美感已经被边缘化，道德教育被过分抽象化、虚拟化，人成为物质的动物，对物质的渴望远胜于对精神升华的渴求，道德在大学校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所谓多元文化的解构。大学在超越现代文化和文明的同时，道德伦理价值的底线却屡屡被突破，一系列学术腐败等学术不端行为让世人不齿，也让大学蒙尘，但这正是大学文化建设中道德内涵的缺失、流失造成的。大学追求了多年的大学理想和大学精神，可如果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精神和理想就是一句空话。在一个缺乏理想和道德水准低下的时代，大学文化尤其应该高擎理想和道德的旗帜，使大学不至于沦落为追逐物欲横流的名利场而失去人的尊严和价值。“大学通过降低学术水准为社会或企业提供服务的任何做法都是可悲的。大学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引人分心的事情在不断增加。大学不能通过远离社会来保护自己。唯一能够保护大学的，就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大学的标准与理想。”① 而只有毫不犹豫地坚持大学的标准和理想，大学文化才有崇尚道德和追求道德的用武之地。

---

①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三、大学文化是传承学术自由的文化

学术自由是大学诞生以来一直苦苦追求的核心使命之一，一般被定义为“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它不仅反映了大学的一种基本理念，也充分反映了大学学术活动中主体个人正义、适切的权利诉求。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凡是卓有成效、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学，无不是坚持学术自由的典范。发展至今，学术自由已经成为大学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作为大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途径。蔡元培先生对学术自由有着很精辟的阐述，他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扰，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教授学生。近代思想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行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① 而为了更好地表明自己学术自由的观点，蔡元培先生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提出：“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② 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奠基人的蔡元培，以其学识、见识和胆识清醒地认识到了学术自由对于大学发展的可贵，更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体思想自由在大学中的价值和地位。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大学历史相对短暂的国家而言，大学文化要倡导和追求的学术自由就显得弥足珍贵。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追求学术自由

---

①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所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历经磨难和坎坷的中国大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学术的自由、自信和自主。加之市场经济的强力介入，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宝贵精神遭到解构和颠覆，许多人丧失了对学术自由的向往和忠诚，出现了诸多对学术自由和学术道德规范的远离、践踏和背弃之事。这种背弃，甚至背叛，已经严重伤害了大学学术自由的价值根基，使中国大学好不容易形成的学术自由的氛围遭到重击，学术自由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玷污。而学术自由的受损也使大学在社会和公众面前失去了亲和力和公信力。然而，一个民主、文明、公正的社会不能没有一个相对独立、拥有足够的学术自由、不屈从于任何外在权威并能摆脱任何外在诱惑的精神气质的大学存在。“不自由，毋宁死”，表达的是一种人的精神，但又何尝不是大学学术自由精神的象征。大学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自由的表征，中国大学文化的建设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急迫的使命就是要使学术自由成为每一个大学人的基本信念，恢复学术自由的本来面目。大学是知识和智力的源泉，只要大学里的人们能够自由地探索真理，则在真理所至之处将会涌现出新的科学知识。因此，只有学术是自由的，个体是解放的，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才有可能实现。

四、大学文化是追求批判精神的文化

大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和见解求同存异的产物，也是一种不断修正自己的产物。历经千年的现代大学之所以生生不息，跟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息息相关。批判精神使大学具有理性的力量，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矫正自己的方向，不断剖析社会的弊端，使“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成为一种可能。大学文化之所以决定大学的未来，也就在于大学文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或者说大学批判精神塑造了大学文化。

大学批判精神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大学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对于大学的希冀。大学

的发展过程总是曲折的前进过程，总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争端，也总是在继承中创新。从现代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精神的缩影或象征，大学所追求的真理、理想、自由无不是以批判精神作为其实质内核的。即使到了今天，以追求创新和创造为根本使命的大学，从哲学和思想的意义上看，由差异多样的思想张力和批判思想所生发出来的知识创新，就属于一种创造。一所大学要想成为知识创造和创新的中心，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批判的中心，而这种批判精神的教育应该贯穿于学生的学习之中，让学生牢固树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踏实求学态度和不盲从、不迷信、不趋炎附势，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一种坚持真理比发现真理更加可贵的执著精神。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始终不自由地受制于技术，技术业已成为它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本身与其用途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了对其命运的控制能力。"[①] 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形成的"技术社会"。在这个社会，工具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奴役的基础。[②] 在经济和技术把持了社会的话语权的时候，在大学也深受其影响的时候，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其成为批判的中心，使其批判精神得以弘扬。但遗憾的是，在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如潮攻势面前，大学一再退让，唱赞美诗的远远大于批评的呼声，甚至在一些事关社会和民众利益之事面前，大学竟然集体失声。大学掉入了歌舞升平的陷阱，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学批判精神日趋式微，学术泡沫的泛滥和学术不

---

①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

②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10期。



端行为的屡禁不止，正是这种批判精神流失和缺失的深刻表现，更严重的后果集中体现在对人的教育上，大学教育蜕变成了极其浅薄、机械、冷漠的教育之化身。事实上，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泥沙俱下，社会各阶层对高等教育给予厚望的时代，大学尤其需要以理性、理智的批判精神和态度来约束社会，净化市场和弘扬正义。大学不能蜕变为社会的传声筒，更不能被市场经济所包养，而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尤其应该有自己的灵魂。失去了批判的声音，大学文化就是无根之木；失去了批判的力量，大学文化对人的熏陶作用就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总之，大学文化的传承和超越是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经历过无数的艰难曲折。事实证明，大学只有在大学文化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传承，才是中国大学的崛起和发展之路。一个过于注重物质层面建设的大学是目光短浅的代名词，永远不可能“木秀于林”，只有注重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建设的大学，才有可能引领社会前进。同时，在一个文化“泛滥”的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绝不能只是坐而论道，更重要的是起而行之。大学文化建设又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只有不断研究和探索大学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不断超越大学现有文化内涵的视阈，不断注入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元素，才能真正找到一条中国大学文化建设之路，才能使大学文化对大学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七章　大学教育中的“语”与“文”

哲学家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是不能轻易触碰的，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信仰。”而这两样东西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当代大学不能言说之痛。以语言为例，具体化的“语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语，在今天的大学里似乎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对于大学的各个专业教育而言，语文这种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学科早该退避三舍了；也很少有人关注、研究“语文”这个普通的词语，能够给予当代大学和大学人何种深刻的生活启示和哲学警示。尤其是在当今外语占据大学教与学的话语权的时候，甚至在双语教学成为衡量当代大学专业和学科的教学水平高低之时，语文教学的尴尬使得大学的“语”与“文”只能沦落为公共必修课的学分符号。“语”与“文”作为大学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早已不能承受传承中华文化之重。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中国大学所有的教育没有一天可以离开语文，因为不管是何种专业，也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语言，尤其是我们的母语，每天都陪伴左右。在外语占据了我们高等教育太多的语言空间的时候，民族语言的继承和发扬已经成为一个关乎民族传统和文化生命力的重要问题。在变化的世界面前，如果我们还承认“文以载道”，还承认文学对一个民族心灵的净化作用，尤其是还认可“语”与“文”能给人打下神圣的精神底子，那么我们大学的“语”与“文”的教育就更应该以超前的眼光和非功利的思想去关注成长中的大学生，因为他们都会长大，会成为一个



人，会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员。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人类栖居的家园。"我们的大学能帮助学生们找到这样的家园吗？

大学人文教育往哪里去

把21世纪称为信息科技时代应当不过分。信息科技时代的本质应该是一个高科技水平和高人文素养并重的时代，它给世界高等教育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而"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① 都显示了大学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在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的价值已经不仅仅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成为一个"博雅"之人，更重要的是在于当面临人类的发展困境以及诸多的社会问题、全球问题和文化分裂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是否还有勇气面对现实，并勇于承担责任。这是对大学人文教育最直接的追问。

28年前，刚上高中的我及一群顽皮少男少女在教室里等来了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教师，一身板板正正的中山装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不凡的风度——他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那一天，其实是很普通的一天；那一堂课，也是很普通的一堂语文课，但却深深地烙在了我们全班几十颗年轻而躁动不安的心上。多年后，当大家都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相聚之时、酒酣之际，竟然会多次不约而同地谈到那位只教了我们几个月、已然不记得姓王还是姓陈的语文老师，谈到那节语文课，谈到《荷塘月色》，追忆着荷塘、追忆着月色、追忆着那老师磁性般的声音营造的梦一般的意境。时光如流水，带走了我们许多儿时的梦想，但却有这么一堂课、一位老师、一篇课文伴随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坚信，老师的音容笑貌，那纯正的、抑扬顿挫的普通话，那被朱自清描绘得美轮美奂、

---

① 张应强、郭卉：《大学教育思想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载《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11期，第5页。

栩栩如生的荷塘和月色将会伴随我们的一生。二十多年前，懵懂幼稚的我们从心底萌发的只有“太美了”三个字。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当我也开始给我的学生讲《荷塘月色》的时候，我才悟出了一点“太美了”的含义。“太美了”，绝不仅仅只指文字本身的优美，更是指教师通过教学，挖掘出超越文字和作品的强烈的人文感召力。因为只有真正挖掘出了文学作品人文感召力、影响力的语文课，才会使学生情动于衷而发乎于外，才会让学生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才会真正感悟精神价值超越现实的巨大力量。这就是语文的力量。

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学语文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在一种传统力量和科技力量的束缚、影响之下，演变成了一种学分唾手可得的符号，它越来越关注外在的世界，但却忽视了对心灵的关注。大学语文教育演变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教育，但智力教育只推崇能力主义，只重视培养训练学生的记忆、理解、判断、概括等纯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忽视不同学科知识的沟通，以及与社会、文化、伦理、科学技术的联系，最终使大学语文的教育陷入闭门造车的困境。在重视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不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全面培养，忽视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重”教学、“轻”教养是当前大学语文教育最大的误区。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大学语文实际上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教学方法一成不变，教学模式因循守旧，这些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大学语文教育，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大学语文教育逐渐成为单纯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例如作文训练，写作的真情实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考，要满足考试的需要。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图书馆被束之高阁、备受冷落，而网络作品和流行小说却备受热捧，这一切，都让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承认，尽管今天的各种条件是文学先辈们所无法想象的，但



这个时代却诞生不了我们的鲁迅、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和冰心……因为文学是人学，光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过分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特征和过分看重分数都使得我们的大学语文教育有越来越严重的功利化倾向。现实当中是，一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学分，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放弃了道德操守，这已经不是学习方法和态度的问题了，而是会对一个人的未来在精神或生活态度、信念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使学生的文章里缺乏人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或者缺乏对人文精神的弘扬，那么既不要奢望学生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包括自然美和人性美），也不要奢望学生会创造美，更不要奢望大师和杰作会横空出世。再说严重点，素以培育重视道德、礼貌、人伦关系著称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土壤，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已经很贫瘠，学生的民族精神甚为困乏。这和我们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长期漠视人文精神、人文传统是否有紧密的关系呢?

不可否认，语文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给人打下精神的底子。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儿童和青少年是那么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而这种感染和影响是可以伴随人的一生的，这种精神支柱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想想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说过："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们，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短短的一篇课文传递了多少人类优秀的精神品质呀！勇敢、坚强、无私、同情，对暴虐的抗争，对自由的渴望……说它是一篇闪烁着人文主义精神光芒的杰作又有谁会反对呢？事实上，不断推陈出新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散发着人文精神，富有人性之美，关爱人生、热爱生活的作品比比皆是。这正说明了语文教育的大方向就是在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让学生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去感悟文学作品散发的独特人文魅力，而我们教师所要做的，正是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感知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

但是，反观我们目前的教学，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对大学语文教材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精神，许多教师还缺乏一种新的认识。他们在教学中比较重视对语言文字的解读和技术性分析，而忽略了教材中所应有的人文精神的挖掘、体验，以至于语文教材中最重要的审美情感、人性感悟在教学中得不到有效的传递。语文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教科书”，是在教师引导下的阅读、讨论、探究，而不是看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分析和讲授，而过分强调语文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和教师讲授的准确性，反而容易窒息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所谓“得法于课内，增效于课外”，看的就是课余的自由阅读及独立思考。可惜的是，看看大学生们那些仿佛生产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文字“产品”，其思想内容的肤浅和苍白，感情表达的媚俗化倾向，都会让语文教育汗颜。大学本是一个人情感真实和丰富、思想敏锐和多元的时期，但能够从容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独特、真实和优雅的人生感悟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情感的苍白和思想的空洞吞噬了人文教育的真实价值。大学语文教育的改革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改变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始终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便是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还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特殊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而如果缺乏先进的、合理的、人性的教育理念支撑，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只能是闭门造车。在这种状态下培养和教育出来的学生只能是浅薄和空洞的，古人曾说文如其人，那么今天是否也“人如其文”呢？语文教育如果使学生仅仅只能接受空洞的说教，仅仅只会进行文字的机械拼装而完全感受不到语文所赋予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格精神塑造的巨大影响，那么这样的语文教育就是不成功和不完整的。因此，在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语文修养、语文素质的过程中，把语文教育和人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势在必行的，也是高等教育应该明确树立的教育观念。

实际上，语文教育就是人的教育，既然是人的教育，说



明白点，就是应该让学生懂得，无论科技和经济怎样发达，物质财富怎样丰富，人在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方面的一些本质需要，却是外在财富与金钱所不能满足的。惟其如此，人总需要在物质与财富的世界之外寻找一个精神与意义的世界。有鉴于此，语文教育不仅是使学生掌握语文这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独立的人、有尊严的人、有责任感的人，要让我们的学生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活着的全部价值和尊严就在于思想。”这应该是语文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归宿。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这说明了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在传递人类文明、弘扬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方面，语文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的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圣洁的“荷塘”和那如银的“月色”，对美的追求也是每一个人心中的强烈愿望。换句话说，对美的追求是语文教育的终极思考，对人文教育的重视和挖掘才能使语文教育回归到它作为一种塑造完善人格与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正常位置上来。

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使语文学习者认识美、把握美、追求美和创造美。事实上，科技和经济越发达，人文教育（当然包括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作为理性与秩序象征的科学，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人所处的世界寻求合理的规律性解释，并努力使人能够理解和掌握它们。而人文的内涵却是对人内心世界的关怀，人性的完善、和谐和全面是它的目标，自由、平等、公平、和谐是它的最高理想。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科学活动的全部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而科学活动的领域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赋予人类以崇高的理想和精神，

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但科学毕竟不是人文，爱因斯坦说过："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可见，对科学本质有深刻认识的人是不可能只关心科学而忽视人和社会的根本需要的。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类共有的利益，增加生命的价值是所有努力的结果，它不会排斥对科学理性的认同，因为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代表着人类思想统一性的不同方面。

因此，任何一个为眼前的教育现状心存忧虑的人，对把"三聚氰胺"兑入医院和教育倍感愤怒的人，都应当懂得人文教育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年代的弥足珍贵。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落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贯穿到一切学科的教育中去，这是大学的责任，如果少了人文教育作基础，不仅是教育的不健全，也是民族精神的不健全。语文教育应该让学生们，能够撑一枝长篙去追寻那心灵的"荷塘"。

文化变迁影响下的语文教育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说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句话既体现了苏轼旷达的胸怀，又把世界的"变"与"不变"作了朴素、客观的诠释。岁月沧桑，历史悠久的中国语文教育走到今天，在融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也面临着"变"与"不变"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使语文教育必须以更开放的教育思想，更宏大的理论视野，更科学的制度举措，建构新型的语文教育体系。而如何看待自身的变革，则关系到今后的语文教育是以一种积极还是消极、主动还是被动、感性还是理性的姿态面对变革，尽管变革之趋势不可逆转。

大学的语文教育，处境是尴尬的。作为母语教育，任何大学教育绝不可忽视其存在，但作为一门所谓的公共必修课，它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我们必



须看到今天的语文变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省式的变化，而是在一种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世界多元的文化的基础上，在更好地交流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充满了文化张力的教育变革。由于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对语文教育的价值尺度和认识发展尺度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这种变革与民族文化的变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不管历史和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语文教育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传递了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因为世界上既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离开“语”和“文”的支撑而独立存在，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摆脱自己的母语教育所带来的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而遗世独立。因此可以说，源远流长的语文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并且孕育了无数的先贤圣哲。事实上，文化变迁也为语文教育变革站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平台上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了解世界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阅读文本”。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更好地认识语文教育，发挥语文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巨大的作用，就必须关注语文教育的变革，也必须要关注文化的变迁，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一、文化变迁影响下的语文教育边缘化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那么语文教育就是这张身份证上的识别码，它揭示了文化和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也表明作为文化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教育，始终有一个不断适应文化变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趋之若骛的时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教育国际化、教学网络化、学科科学化、语言外语化甚嚣尘上之时，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演变的时候，语文教育对于提升一个人的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还能不能实现一种历史性的跨越而与时俱进，值得深思。“文化变迁是一种永恒的文化、社会现象，文化只

能在不断变迁中获得发展和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人的能动作用只在于如何促进、加速这种变迁，使得各种变迁怎样更适应于社会发展的需要。"① 同时，文化变迁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语文教育如何促进、加速这种变迁，实现文化和教育的有机融合是一个难题。今天，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历史悠久的语文教育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它体现为语文教育已经从一种指引人认识美好世界，进而达到对精神砥砺的利器，逐渐退化为现代人的一种谋生工具，传统语文教育身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光环已不复存在。很多大学生既谈不上很好地掌握语文这个安身立命的工具，也谈不上从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学习语文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渴求和追问，更不用去奢谈对文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语文教育变成了追求物质享受的附庸，价值在逐渐失落。

语文之变，表面上看是在文化大环境的变迁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在对科技理性主义的盲目崇拜下，语文学科遭到了冲击，而深究实质却是民族文化从传统思想的根基上遭到了所谓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相当多的大学生在情感上并不认同语文教育中的诸如语言教育、文字教育和汉语经典教育，相反却对许多舶来品奉若圭臬，言必称西方。这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理解的钝化和使用的功利化倾向，实质上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和背叛。文化在不断变迁，在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多样化，但如果语文教育的结果仅仅只是让生活、成长在21世纪的大学生们满足于快餐文化的肤浅，流行文化的平庸，而缺乏对人类，尤其是自己民族经典文化的认同的话，那么，中国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被彻底边缘化也绝非是危言耸听。因此，要重塑新的语文教育形象，就必须对语文教育和弘扬

① 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意义，尤其是文化的变迁对语文教育变革的影响有一个新的认识。文化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语文教育作为文化的缩影，也必然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语文教育应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建构起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使其在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变迁和语文教育变革的困境

首先，从客观上说，中国这样曾经深刻影响过世界发展格局的文化传统大国，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以一个经济强国的身份崛起于21世纪，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在世界面前体现自己和而不同的文化色彩。文化的和而不同并不是说要抱着传统不放，在传统的民族文化根基上吃老本，而是说我们要在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上发展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能感动世界、影响世界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所谓创造性有时恰恰就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发展上，传统才是一个民族能够打动世界的最具民族魅力和个性的东西，而语文教育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精髓、创造民族文化繁荣的利器。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说过："一个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中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①] 那么，语文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支撑，在今天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教育我们的学生在没有硝烟的文化交锋的战场上学会抵抗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如果把21世纪作为中国文化涅槃的世纪，那么我们的语文教育意味着必须以一种更为开放、更为理性、更为多元的姿态融入民族文化的振兴之中，"文化的力量将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中华

① 河清著：《现代，太现代了，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民族文化的价值要想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语文教育任重道远。

其次，对语文教育本身所体现的文化视野，我们应该有一种深刻的认识。照史家的说法，人类历史的沧桑巨“变”有三个级度：一是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是百年期的缓慢渐变；三是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而目前我们就面临着一种“激变”，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客观地说，目前总的教育改革趋势是更加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教育内容进一步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寻求个人理解的知识建构，创建富有个性的学校文化；等等，这些理念既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事实，也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但是直到今天，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改革效果却差强人意，理想和现实出现了“剧烈脱节”。学生一方面极需要人文精神的濡养，另一方面教学所传授的又和学生的心灵世界相去甚远。这种脱节和我们的教育改革还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以及韬光养晦的战略眼光有密切的关系，更深刻地加以分析，就是我们始终忽视甚至无视营造一种好的教育改革的文化氛围，总想凭借某一次或几次教育改革的“攻坚战”就解决语文教育当中的所有问题。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反而陷入愈改愈困惑、愈困惑愈改的急功近利的怪圈之中，以至于教育改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甚至蜕变为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代名词。

再次，我们的教育改革的文化背景总是充斥着激进主义的色彩。改革意味着把一切推倒重来，在这样的改革氛围中，许多优秀的语文教育思想和传统在大学教育的环境中得不到重视，一些现代教育制度、方法、观念和手段因其披上了“现代化”的迷人外衣而垄断了教育的实际话语权。实际上，教育改革并不意味着所有东西都要推倒重来，在改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坚持认清哪些是不能改的，并且还要发扬光大的，



这也许才是改革的辩证法。“任何一种话语实践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去加以考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任何文化研究（包括教育研究）都不能忽视其本土化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① 英国文学家伍尔夫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思想是多么容易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像一群蚂蚁狂热的抬一根稻草一样，抬了一会，又把它扔在那里，再也无人问津。”② 回顾我们的教育改革，有时就像“一群蚂蚁”一样，有过分感性甚至任性的做法。而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任何改革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就一定蕴藏着偏激、片面和独断的危机。

因此，认识到文化变迁本身会给教育改革带来诸多不定因素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教育改革之难，往往表现为忽视对文化环境的客观、理性分析，而呈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和操作方式，所以今天整个语文教育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三、文化变迁与语文教育的发展

但改革的难度再大，语文教育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承认文化变迁对教育的影响并不等于说语文教育改革难以为继，而是应该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地看待语文教育的发展问题。今天，“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教育产业化”、“教育高收费”、“教育公平”等现象仍在提示我们，教育问题的根本症结并不完全在教育本身，如果文化变迁影响下的文化环境缺乏相应的变化，不能带动教育大环境的改善，教育是很难有根本性的变革的。因为再好的改革如果离开了大环境的支撑终究会事倍功半，甚至会半途而废。所以，语文之变和文化之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忽视这种联系，就会把教育改

---

①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郭洋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3 页。

② 齐格梦特·鲍曼著：《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商务印务书馆 2001 年版，第 58 页。

革之痛仅仅视作一种孤立的病症来加以解剖，既看不到教育改革符合时代进步的意义，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悲观认识之中，也会无视教育改革的艰巨性而盲目乐观。

那么，大学语文教育往何处去呢？曾经有专家预言，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文化出现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人得以真正全面发展的时代。此话笔者以为说对了一半，因为人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的发展，所以如果说21世纪是人全面发展的世纪，那么也必将是人类社会不断完善和进步的世纪，更是人类文化在多元化格局下交流更加频繁的世纪。语文教育必定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也必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关系。如果20世纪的语文教育最大的遗憾是忽略了人的主体存在的话，那么21世纪在关注人的主体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更加关注客体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关注文化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因为人类生存的世界本身就是主客体的统一。语文教育的灵魂就是人文精神的弘扬，既然从根本上说语文教育是对人的价值与利益的关照，它就无法不关注人所栖息于其中的物质层面的社会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所以，今天语文教育改革的出路应该表现为追求建构一个既面向人也面向世界的文化知识体系。更明确地说，就是要通过语文教育，培育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对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文化视野的追求，对人类、自然、宇宙关怀的追求，对人类生命的活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力、永不停息的探究精神的追求，以及不满足于现状的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应该是语文变革的必然选择，也应该是语文教育一种新的文化理念的确立。

总之，时代在变化，文化在变迁，语文教育也必然要变革。语文作为一个人品咂自己民族文化魅力的初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作为语文教育坚实的基础，它的变迁实际深刻反映和影响了语文的变化。有学者曾经指出，如果不将教育当做文化来分析，那么任何研究都会有琐碎化的危险。“在我们看来，教育的首要目标同样不是要给学生多少知识内



容，而是要在他的身上灌输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心智状态，一种能够给灵魂指出明确方向的灵魂取向，而且不仅仅是在儿童时期，还要终其一生。”① 所以，大学语文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一代代大学人心灵的深处播下人类文化健康、丰富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惟其如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想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文学转型与文学教育

1950年，威廉·福克纳在他的一篇演说中感叹道：精神性的东西已不复存在，人们所描写的爱情不是爱情，而是内分泌。他们所写的失败是一无所失的失败，他们所描写的胜利没有希望。也许福克纳的感叹是每一个喜爱文学和从事文学教育的人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为它预示着文学内核的裂变。但在今天社会转型剧烈震荡的时期，这样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不仅是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文学的转型，动摇了人们对文学的执著追求。物质主义的滥觞和理想主义的匮乏，迫使每一个人不能不思考如何在跌宕起伏的经济化过程中保有人的精神和思想，不能不思考如何通过文学和文学教育扶起人的精神向上的阶梯。徐葆耕先生在其《紫色清华》一书中写道：“我们都念过朱自清的《背影》，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似乎又看到了朱自清本人的背影。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因为他正离我们而去。不仅如此，我甚至有一些紫色的哀愁，因为他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也渐行渐远矣！”② 这些话语，让人浮想联翩，如果文学的世界最终离我们而去的话，这个世界还会是美好的吗？现代儒者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

---

①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② 蓝棣之、解志熙主编：《远去的背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农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如果我们还承认高等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如果我们还承认人文精神是大学灵魂之所在的话，那么文学教育便是使人的灵魂和精神向上的阶梯。“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经典与经典教育，能够以思想去激励、焕发思想，以智慧去锻造、启迪智慧，使知识分子能够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关怀社会又反思社会，而这正是大学存在的根基。”①

一、文学转型对文学教育意义的影响

一个美好和谐世界的建立，大学是责无旁贷的。大学存在的意义是让人更理性地看待世界，但人类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整个人生，在人的理性的后面，还存在着心灵的世界，它所关注的是生命与意义的世界。因此，大学存在的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通过教育让人们对未来的世界充满激情、希望和理想，这种激情、理想和希望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志。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大学也通过自身的作用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就是大学通过传递人类文化来影响社会的发展，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净化社会环境、振奋民族精神、体现个人思想方面，同样也对社会产生了这样

① 盖生：《“文学终结论”疑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或那样的影响。通过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为此，文学不仅成了大学研究和思考的重点，文学教育也成了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教育，可以让学生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从浩瀚的文学星空去观察和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感受生命存在的意义，遥想未来美好的世界，并以此为平台构建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

文学教育对人的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绝非妄言。今天，不计其数的文章说起西南联大的故事，说起那个时代的文学教育，不仅是因为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也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教育是真正直抵人的灵魂的教育。联大师生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仍然通过聆听闻一多先生的“楚辞”和“唐诗”，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以及朱自清先生讲的陶渊明，陈寅恪先生讲的白居易，等等，寻找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世界。文学成为师生最美好的精神寄托。它让无数莘莘学子在身处逆境之时，仍然有志向、有思想、有理想，决不颓废，更不堕落，谱写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最辉煌的篇章。

斗转星移，在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泥沙俱下，对文学和文学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学，曾经是一个民族颓废时的兴奋剂和一个民族亢奋时的镇静剂，而现在却逐渐失去药效，沦落为类似钙片一样的大众化保健品，人人皆可食之。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其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正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其“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文学中人的精神活动、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已经有被玷污的痕迹，它的审美性已经被文学的商品性扭曲，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滑落到人人笔下皆无（灵感和创造力），甚至人

人心中也皆无（精神、情感和良知）的尴尬境地，它向上的阶梯正在坍塌。大学作为一个超功利的社会机构，如何维护文学对人的思想的启蒙价值是今天的大学文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因为文学异化带来的人的精神异化迫使大学文学教育在确定文学教育观念、选择文学教育内容、确定文学教育模式时都必须打破旧有格局。一句话，大学文学教育应该让自己在一个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严厉起来，扶起向上的阶梯，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和热爱，承担维护文学的价值和尊严的责任。

二、文学转型对文学教育观念的影响

文学的本质意义不仅要表现思想的自由，更要表现丰富的人性，这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教育这个中介物来传递、体验和感知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如何达到文学教育的真正目的，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学教育作为今天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普遍受到较之以往更多的重视，不管是文学专业还是非文学专业，文学教育的课程、教材、课时分配、学分结构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文学教育能否为我们的大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能否使我们今天的大学生通过对丰富的文学作品的解读，通过教师的讲授和师生情感的互动使其精神得以升华，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的文学教育的观念。作为身处古今思想、中西观念、科学与人文冲撞、交锋最激烈的文学领域，是无法躲避时代的冲击的。文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学的回归与构建中让我们的大学生获得技术与人性的平衡与张力，以此来抵制过度商业化的价值扭曲，抗拒过度技术化的精神异化。一句话，文学教育观念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才能最真实地理解和触摸文学即人学的深刻内涵。

但是，观念的确立绝非朝夕之功，因为在功利主义风行一时的年代里，在市场和经济的夹攻下，大学学科和课程存



在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一种实用化、功利化的东西，整个高等教育过分地看中了知识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知识对人思想的启蒙价值和对人的心灵的救赎意义，大学教育对人的深刻和全面的教育的本质特征遭到清洗。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教育讲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屈探究精神，讲鲁迅作品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及鲁迅思想的影响力、穿透力，讲托尔斯泰作品悲天悯人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关照，等等。在现实面前，文学教育显得多么曲高和寡，甚至和整个时代追求物质发展的大趋势格格不入。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对工具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顶礼膜拜，文学的人性色彩逐渐消退，而文学的技术理性色彩却逐渐浓厚，这种趋势对于文学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使一位教师把文学课上得比数学课还要“精确”和“客观”，诸如作品背景、年代、人物、情节、结构、艺术特色、影响等都可以做条分缕析、面面俱到的技术性讲授，以至于考试时，学生只需要复述书本和复印教师的讲授笔记即可万事大吉。表面上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似乎是点有了，面也有了，事无巨细尽在掌握之中。但仔细深究却发现，从教到学再到考的教学流程中，看到的是太多纯理性、纯技术的客观性讲授和技术性学习，而文学教育中本来应该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的思想、精神的感悟却几乎销声匿迹，特别是具有能够引发学生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深入哲学思考，以及具有生命张力的创造性思想更是凤毛麟角。这导致教得再好的教师不过是一个知识的传声筒，学得再好的学生也不过是一个文学资料占有型的高手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而决非真正参透、领悟了文学对人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人的未来发展的意义。这样的文学教育观念主导下的教学行为使得文学的功利价值被放大，而文学的人性价值和思想价值却一再缩水。试想如果发展到仅仅把文学教育视为一种纯客观的表述，不需要激情，更不需要思想投入的简单劳动的时候，文学的意义何在，文学教育的意义又何在？肯定地说，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中，文

学教育所期待的那种通过文学夯实学生精神的底子，引发学生对生命意义关心、关照、关怀的重视，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如果文学不描述人的处境，不跟心灵发生关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文学教育不接触人的情感世界，不跟人的心灵世界发生关系，这样的文学教育也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如果把21世纪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回归的世纪，那么文学教育观念中，又有什么理由仍然漠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的主体价值呢？

三、文学转型对文学教育内容的影响

文学教育的观念决定文学教育的内容，而文学的内容又体现文学的观念。在功利主义的教育环境影响下，大学文学教育的内容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首先，文学教材的版本众多，有许多教材不客气地说就是以牟利为主的，而根本没有顾及学生的学习需要。其次，教材内容陈旧，编写体例落后，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再次，教学内容单薄，没有充分考虑文学教育的特点和大学生将来的生活走向问题，文学教育中传统文化元素流失严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有可能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斯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①

教育内容的乏善可陈使得许许多多的学生把文学视为精美糕点上的奶油，仅能解馋，而无法充饥，而文学教育更对将来的生计无补。于是，今天相当多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发展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已经失去了探究的兴趣，助长了学习中的功利化欲望，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发展；只考虑个人，而不顾社会和他人。这导致文学教育倡导的“重新审视

---

① 方松华：《科学发展观的人文意蕴》，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



生活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显得非常无力和苍白，事实上它已经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势。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学教育的内容就更加重要，它不仅仅是知识的凝聚物和信息的载体，更是学生心灵世界向上的阶梯。文学作品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它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穿凿附会，但文学作品又是主观的产物，它需要今天的解读者不仅拿出激情，还要拿出智慧，更要拿出思想，重新对文学作品提出新的、带有哲学张力的思考。缺乏激情，文学就像一杯白开水般索然无味；缺乏智慧，文学不过是一些文字符号的简单堆积；而缺乏思想，则文学就像一个稻草人一样，随风摇摆而可能失去自我。说到底，大学文学教育的实质就是唤起一种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因此，真正的文学教育是拿出激情、拿出智慧、拿出思想的教育，而绝不是无病呻吟和亦步亦趋式的教育。有鉴于此，文学教育的内容迫切需要一种开放、多元、民主、自由的空气来加以净化，使之更加清新，更加人性化。

四、文学转型对文学教育范式的影响

文学教育应该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课题，因为文学教育就是一个不断研究和发现，不断探索、不断感悟的精神旅程，它不能模式化和固定化。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显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典范，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独特的解读。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环境氛围中，文学的多元性解读更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对解读过程的多元性认识更应胜过对解读目的的单一关注。现在大学文学教育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对于新的学术范式、阐释话语和学术前沿性信息缺乏必要的敏感性，在对各种学科间知识的交叉、整合上囿于门户之见而缺乏创新性，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注重在教师的引导下对作品进行一读定终身式的解析，这种僵化的思维和操作模式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文学语感和文学想象产生窒息，对学生的文学阅读力、判断力、批判力易形成一种误导。所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学的文学教育，包括人文教育中的文学课程在学术范式上依然是呈现出单一化、线形化的语境模式，“阿Q还是阿Q，宝玉依然还是宝玉”。学生甚至把大学文学教育戏称为“高四语文课”，这说明大学的文学教育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大学生学习的心理和思维特点，尤其是对文学教育中出现的“非真理模式课程”的概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认识，于是习惯于一种简单化、模式化的操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大学文学教育多年以来积淀形成的重技术、轻思想的传统熏陶使得文学教育中思辨型、批判型的教师凤毛麟角，而任何学科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就只能是一种画地为牢的自我废黜。因此，当代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就是在一个新的视阈下，建立自己的符合时代和人的发展的文学教育范式；在认识论上更好地继承中国文学教育中关注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传统，真正做到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在方法论上更多地借鉴当代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鼓励多方向、多层面、跨学科、跨国界的探索和创新，更好地把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和世界各国大学文学教育的经验结合起来，独立探索并提出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教育理论与方法，这应该是我国大学文学教育的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当前文学教育所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种孤立的、简单的教学问题，它实际反映出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观念和思想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尤其是适应人的发展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道德问题，所有的道德问题都是教育问题”，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论断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绝不会坐视人的精神衰落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作为一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不管社会如何发展，经济如何飞跃，文学对人的影响都是永远不能被低估的，任何一个鄙视文学、鄙视文学教育的民族都是短视而危险的。相反，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是一个民族，甚或个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支柱。在新的时代，经过重新诠释的“文学”这一概念，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



生了重大影响，它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而文学教育不仅要真正参与这样的功能整合，更要扶起社会和个人向上的精神阶梯，这是当代大学文学教育的责任。

“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①] 教育在金钱鼓动的贪欲和疯狂面前已经退无可退，但愿我们的选择能够成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

① 张承志：《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前途》，载《读书》2009 年第 1 期，第 86 页。

第八章　大学的现代跨越

大学在历经沧桑之后，实现了一种从社会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发源地，维系着人类美好的希冀，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也坚守着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家园。大学生命之树常青，就在于有无数的磨难和坎坷之时，始终怀有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视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因此，大学的现代跨越，并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跨越，更是精神层面的跨越。同时，大学之所以能愈挫愈强，就在于大学并不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枯守象牙塔的代名词，而是不断完善、不断革新和与时俱进的象征。追求真理、传承和创新是大学的精神支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大学面临无数的变革和挑战时所持的态度。大学既然作为社会的一员，就不可能置身社会变革之外而泰然处之，顺流而下也好，逆流而上也罢，大学必须在一个社会变革迅速的时代依然保持大学的气节，而决不应成为社会的流行前线。大学无法拒绝变革，但大学应该拒绝一种轻松和无谓的心态，尤其是今天的中国大学，特别应该在一个日渐宽松的物质环境和日益逼仄的精神环境中，学会使自己严肃起来，不仅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还要成为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精神的守望者。中国大学在21世纪最重要的使命不仅在于要建立无数所世界一流大学，还要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担纲者，使21世纪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大学凯旋的时代。而“治大国者若烹小鲜”，则提示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的现代跨越。



现代大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一、现代大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趋势

现代大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文化进步的标志。从 1088 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具备现代大学特征的学校开始，大学便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和人类息息相关的精神家园。据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的统计，全世界在 1520 年之前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的事情的社会机构还有 85 个，其中大学就有 70 个，另外 15 个是宗教团体，这足以显示大学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迅速地融合进人类发展的血液之中。同时，现代大学出现的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显示出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强力推动。有一项研究表明，从 15 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步伐明显加快，而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也随着各国大学的兴衰而转移。这个转移顺序大致是：1540—1610 年期间，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聚集了一批从君士坦丁堡逃出来的学者，极大地充实了意大利各大学的实力，使意大利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但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成为那个时代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而早在 1088 年就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更被誉为“大学之母”，现在还有六万名学生在这所古老的大学学习，许多国际高等教育会议经常在此举办，以感谢这所大学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660—1730 年期间，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首的英国大学，在科学巨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牛顿的带领下，迅速崛起，成为新的欧洲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并为以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基础。1770—1830 年，以巴黎大学（曾经也是欧洲最早创立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首的法国大学，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大学的重心开始下移，更贴近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实际，并进一步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使大学真正具备了脱离单纯、封闭的“象牙塔”的可能。1810年至1920年期间的德国，以威廉·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家提出了改革传统大学模式，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造就一代新人，创造和发展德国文化科学以及振兴民族精神等理念，建立起了新型的柏林大学，其最大贡献就是使得大学从单一的教学开始向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模式转化，并由此拉开了现代大学为社会提供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的序幕。19世纪中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迅速成为世界大学效仿的榜样，德国也成为整个欧洲科学技术的中心，吸引了无数的莘莘学子前往德国学习。从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美国就有将近一万名留学生在德国的大学学习，柏林大学更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过了一直在欧洲人手中传递的大学领袖的火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世界大学的顶峰，并引领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在教学、科研成为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时候，威斯康辛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顺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理念，最终和教学、科研一起，成为现代大学目前最重要的三项功能。在美国大学诞生300年后，几经跋涉，终于成为世界大学和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至今仍然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科学技术和大学的发展。

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说明，现代大学的旺盛生命力和影响力，都是通过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极其出色的表现而赢得社会和民众的关注和尊重，从而体现出来的。尽管中国大学的历史不过区区百年，但大学的发展依然印证了大学和社会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为标志。但使中国大学真正具备现代大学特征的，却是从1917年1月4日这个日子开始。从德国留学归来，深谙欧洲大学办学理念，并使之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结合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从此中国现代大学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现代大学的艰难跋涉，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到服务社会，尽管历史较之西方现代大学晚了几百年，但是却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校全日制学生高达2 600万人。而从北京大学拉开“五四”运动的旗帜开始，中国的大学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的舞台，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中，无处不有大学和大学人的身影，换句话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从云南省的大学历史来看，1922年12月8日，以创办人云贵总督唐继尧的别号“东大陆主人”为名，以“发展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为宗旨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当时西南地区较早的一所大学。东陆大学从1923年4月9日开始招收第一批女大学生，到1937年8月，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再到1938年7月1日，改名为国立云南大学，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一所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现代大学，为云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了云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可见，有没有大学和有没有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大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来说是何等重要。

时代在发展，在21世纪，大学之于社会，已经犹如“加油站”和“服务中心”不可或缺。那么，既然现代大学的作用是巨大的，现代大学就必然成为世界各国追逐的目标，尤其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角力中，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的抢占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大学更是独树一帜。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开始到2006年为止，评出的诺贝尔各项奖将近300项，美国人获得了142项，比例高达45%，其中获奖者绝大部分为著名大学的教授。从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美国大学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

中国的大学也概莫能外。国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学作为智囊库和人才培养基地也日渐显现出巨大的作用，可以说，现代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角色。曾经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要看 21 世纪是谁的天下，不要看别的，就看它的大学，如果它有世界一流的大学，那么它一定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反之亦然。"① 在这样的竞争趋势下，中国现代大学在世界大学格局中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通过 2006 年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国际委员会"公布的资料，可以对近年来中国大学和世界大学的发展作一比较：

1. 大学创新力

世界科技发展的轨迹显示，世界各国都把创新力视作本国和其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创新，国家和大学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世界大学 200 强当中，中国的清华大学（102 位）、北京大学（126 位）、浙江大学（129 位）、台湾大学（131 位）、香港大学（143 位）、复旦大学（151 位）、上海交通大学（160 位）、香港科技大学（174 位）、南京大学（185 位）、台湾成功大学（197 位）榜上有名，共有 10 所中国大学（含港台大学）进入世界 200 强。而美国有 75 所大学，英国有 27 所大学，德国有 12 所大学，日本有 10 所大学进入世界 200 强。而前 20 名中，美国 17 所，英国 2 所，日本 1 所。

2. GDP、人均 GDP 占有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关系

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时候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按人均 GDP 划分，在世界高水平大学 500 强中，1 ~ 100 位为世界一流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人均 GDP 超过 25 000 美元；101 ~ 200 位为世界著名大学（world famous university），GDP

① 丁学良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 页。



总量要超过 3 000 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 2 500 美元；201～500 位为世界知名大学（world known university），GDP 总量要达到 700 亿美元，人均 GDP 要达到 2 500 美元。按这个标准划分，目前中国内地有 8 所世界知名大学；台湾地区有 1 所世界著名大学，2 所世界知名大学；香港地区有 5 所世界知名大学，中国（含港台大学）合计 16 所。而美国有世界一流大学 51 所，世界著名大学 39 所，世界知名大学 80 所，合计 170 所。英国有世界一流大学 11 所，世界著名大学 7 所，世界知名大学 24 所，合计 42 所。日本有世界一流大学 5 所，世界著名大学 4 所，世界知名大学 27 所，合计 36 所。

3. 科学技术影响力

在当今世界上 1 200 位论文被引用最多的著名科学家中，有 80 位在英国工作，而有 700 位在美国工作，每年还有大量的世界各国优秀人才流入美国。美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和大学话语权中占据了垄断地位，这跟美国的大学占据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位置密不可分，并且这个趋势还在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通过以上三项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激烈竞争迫使现在世界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强者愈强，而弱者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趋势有增无减。中国的大学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差距仍然不小。实事求是地说，现代大学的历史传统仍然还是西方历史传统的延续，从学校模式到课程结构，从学术制度到科学研究，其基本观点都是西方大学的舶来品。这就难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许美德（Ruth Hayhoe）所著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尤其是中国大学在面对大学全球化、教育国际化、文明西方化的挤压下，如何承认差距，而又不自甘落后，让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在中国大学的崛起之势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认识现代大学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可以

使我们更好地努力去办好大学，让大学造福于社会和百姓，而把握了现代大学的发展趋势就可以使我们振作精神，励精图治，使中国的大学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希望。21 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二、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现代大学存在的重要价值不仅是带给了人类物质生活的福祉，更重要的是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因其卓尔不群而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旗帜。大学精神已经成为无数代大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大学精神既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因为它不仅仅在于一个理想、理念的层面，还是大学人所必须信奉乃至身体力行的准则和圭臬。尽管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精神就有无数种的诠释，但概括起来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民主自由的精神

民主自由的精神是大学诞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西欧的中世纪大学被人称为“千年黑暗世纪里人类文明的绚丽之花”，大学在教会和世俗王权权利争夺的夹缝中自由生长，其文化精神在教会、行会和修道院的多重影响下积淀成形，大学成为学者们自由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精神自由交往的地方。它以“象牙塔”自居，自由沉思人类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精神与文化遗产，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与批判。中国古代的大学也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宗旨，强调大学精神中自由的可贵。而自由精神可以分为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没有精神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而学术的自由又进一步推动了精神自由的追求。从古到今，社会一直视大学为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合理的辩论而不带有任何党派的偏见，它拥有的是宽容而不是歧视；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公开地寻求真理而不是去寻求秘密或欺骗。在传统大学精神的自由熏陶下，现代大学很好地秉承了其优良传统，使得大学精神异彩纷呈，而



又殊途同归。从洪堡的柏林大学提倡的“学术自由”，到深得其精髓的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再到炮火纷飞的西南联大所提出的“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自由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无不闪烁着大学民主自由精神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不会有大学的发展，甚至大学也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

2. 批判求实的精神

大学的批判求实精神，源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但更重要的是与真理为友”，集中体现了大学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犹如大学的灵魂，使得大学不迷信、不盲从，成为一个会独立思考的生命。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严肃地告诫大学：“在生活最紧张激烈的阶段，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力，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①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上任伊始，便掷地有声地说道：“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② 这些话语都是对大学批判精神的最好诠释。在大学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批判精神受到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我们要有勇气重塑大学的批判精神。大学作为一个讲究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家园，批判精神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重要支柱和核心表征，否则“至公天下，会泽百家”就是一句空话。

---

① 〔西班牙〕奥尔托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徐小洲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1 页。

②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文江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1 ~ 222 页。

3. 创新超越的精神

创新是大学不竭的动力源泉，超越是大学永恒的使命和责任。大学作为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要不断创新和不断超越。一个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所大学能否有所作为，关键是创新。大学作为知识传承的地方，在21世纪更重要的使命是知识的创新，并且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固守成规、安于现状、亦步亦趋，都是大学创新与超越的敌人。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新专业人才的源泉。这些“新”都可以体现大学创新和超越的精神，而这些“新”也恰恰是中国大学最缺乏的精神体现。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呼较为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大学的创新能力是较为薄弱的，中国还只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而非强国；中国的大学还不能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还不能提供足够多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因此，把创新和超越精神视作大学精神的体现，并不过分。

总之，从现代大学诞生开始，大学就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现代大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作用还会愈加突出。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有一句名言：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的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二流、三流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大学的，一个没有文明根基的国家也是不可能发展出伟大的大学的。今后二三十年，或许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最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本身就没有信心，如果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中国的一切总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总是以一种自卑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大学，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的大学是办不好的，充其量也就是“在中国的大学”而已。反之，如果中国人的大学能够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自信，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明的最深处，那么，即使今天的中国大学仍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经过不懈努力，中



国的大学作为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将会成长为伟大的大学，中国大学的凯旋将指日可待。

发展与变革中的现代大学

当今大学的改革真可谓风起云涌，且不说改革取得的成就世人共睹，单是就高等教育改革的各种理论研究和探索而言已向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已成为当今各项改革的必然和共识。不过，现在高等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改革”一词已经带上了极其眩目的光环，一切的大学和大学的一切若不和改革挂上钩，就显得既保守又落伍，尤其是在理论界“否定一切和否定所有的理想被视为一种勇敢的举动”的时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化为对现存事物的强烈不满。但笔者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越是到了人人耳熟能详、人人指点江山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一种冷静和理智，越需要理性和批判去看待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和即将到来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岁月无情的冲刷下都将会暴露出其极端功利和目光短浅的弊病，这对于改革来说有时可能是后患无穷的，历史上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盲目和偏执付出过惨重的代价，高等教育亦不例外。当我们今天的大学正面临向现代转型并与时代接轨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期盼我们的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深刻认识到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是严肃的，绝非主观上可以随意“发展”、“创造”和“创新”的。这诚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以及《尚书》所云“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大学作为一个国家与世界诸国博弈的人才高地，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宏观效应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左右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当今的大学改革既可以说是需要奋马扬鞭的时候，又可以说是更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大学任重道远是事实，其所处的位置是尴尬的也是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落后的我们要奋力追赶遥遥领先的西方大学，而国内各方各面对大学的期望值和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机遇可遇不可求，而被全球化“化掉”的危机又时时笼罩在我们大学的头上。在这样的现状下，当今中国的大学，面临着一个怎样既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又能保持甚至发扬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甚至于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与时俱进的难题，这个难题在所有层次的教育改革中都必然会碰到，而似乎也已成为今天高等教育改革过程当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传统与现代的取舍和融合成了大学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与否对于中国和中国大学 21 世纪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有学者曾经断言：要看 21 世纪是谁的天下，不要看别的，就看它的大学，大学强则国强，大学弱则国弱。更让人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一所引领社会、引领世界的现代大学一定是“内外兼修”的，至少“有容乃大”是这所大学一种精神上的崇高追求。

很多人都梦想中国大学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今天所面临的一个痛苦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不仅成为一流大学，而且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势头愈来愈成为国际知识系统中最重要的力量。首先，从现实角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以它们的标准、价值、语言、科学创新以及高知识含量的产品在不断排挤着其他有别于它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的历史传统是某一种西方传统，几乎与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再进一步说，从高等学校模式到课程、教学和有关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都是西方的，而采用一种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外国的教育模式对本国的教育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再次，更重要的是，不管其政治思想或价值取向如何，还没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的大学模式。“因此，落后国



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和某种具体发展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使大学戏剧性的不平等更加尖锐。"① 而福柯在《话语的历史》中更赤裸裸地指出："知识的产生和扩展过程无非是一部话语的斗争史，只有那些在斗争中压倒了那些与其相抵牾的、取得了支配权的话语才能成为知识，而那些被压倒、被征服的话语则成了谬误和异端邪说。"这些事实就意味着我们的大学在目前还没有取得太多和太强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将会受到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定位而不是促其民族发展的国外院校在学生培养模式、教学管理模式、课程、教材、大纲，甚至教学语言等方面的遏制和冲击，更严重的可能是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应对这种遏制和冲击，那么我们积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具有一定历史传统的、肩负着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大学将从本质上遭到清洗，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说句实话，对"现代化"或"现代大学"的理解，我们现在还仅仅停留在一种物质文化层面的渴求上，对大学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个人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巨大砥砺作用，还认识不足（这跟我们的大学长期以来依附政府，缺乏一种独立性有关）。同时，对愈演愈烈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倾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把与西方大学的接轨和得到西方大学的认同视作我们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中国大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必然的，也是极其艰难的，而更艰难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思想困境，创造一条自己的大学发展之路。因为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走一条自己的现代大学发展之路，正如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一样，必然有一个痛苦的，但必须要走的过程；因为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似的悲剧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经常上演的。

不过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

---

① 王石庆、赵彦志：《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含义》，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

史的国家，其历史的厚重感、神圣的使命感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自豪感和源远流长、深邃的哲学思考为何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身上很少看到，而言必称西方大学倒已经成为我们大学的一种“传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已经演变为使我们的大学西方大学发展的方向。当然，现在的中国大学绝非是狭隘的、封闭的民族主义者的场所，指责、否定大学的改革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举措。只是我们应该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表面上是要改什么，其实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这种方式最终明确什么是不可以改的，而且还要加固的，这才是真正的改革的辩证法。“过分迷恋新奇除了获得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外，没有任何有实在价值的创造。”① 这种持续而强烈的求新情结表现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片面性，片面地强调革新变动，忽视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开放、特殊的社会系统它自身所必须具备的稳定性，而贬斥教育的稳定性和传统性则是造成我们今天的大学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大学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大学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高等教育要抱着传统不放，永远吃传统的老本，而是说我们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应该发展并建立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能震动世界的、影响世界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民族的创造性有时恰恰就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发展上，因为传统才是一个民族能够打动世界的最具民族个性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视野不应仅仅停留在从自己的教育传统中找出与西方教育传统相同的东西这个层面上，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寻找与西方教育传统相异之处，并证明其具有的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现在，有一种趋势对大学教育国际化很是看好，认为大学的国际化是使中国的大学取得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也是医

① 房宁：《新的未必是好的》，载《读书》2002 年第 11 期。



治我们大学种种弊端的灵丹妙药。概括起来说，大学教育的国际化是指把大学的 teaching（讲授），learning（学习），research（研究），service（服务）和 management（管理）置于世界教育和文化体系之中进行建设和管理的这样一种理念。从本质上说，大学教育的国际化要求大学在教学上要能够提供国际化语言、课程和知识体系。大学国际化确实可能帮助我们的高等教育尽快融入世界，但融入的同时我们是否有被同化的危险呢？国际化不等于美国化，更不等于殖民化。可笔者认为，目前过分地提倡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忽视了西方大学对落后国家大学采取的文化殖民化战略，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当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教育教学中都逐渐退居其次以后，其文化精神的传统价值将如何体现呢？语言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又将如何统领民族和社会前行呢？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我们的大学生从言语到话语、从思维到思想都完全西化后，当我们的大学失掉了积淀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后，还会是什么恐怕我们自己也不认识了，我们心仪已久的大学的现代化也就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的大学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趋势，但如何做到“和而不同”，并能对西方思想、学术和制度都能深刻反思及形成自己的批判却绝非易事。目前最为可怕和可焦虑的就是整个社会，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大学，都弥漫着一股浮躁和极其功利的倾向，对于国外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引进介绍的多，而真正进行消化吸收的少，尤其是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并卓有成效的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我国的教育传统进行披沙拣金、深入研究的少，而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的多；对于现实教育中的问题搞应试式的、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的对策性建议多，而能够具备恢弘眼界，全面分析、深刻把握历史和现实并作出有长远有益影响的战略性决策的较少。其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传统与现代日益疏离，并使现代教育失去牢固可靠的坚实基础，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的无法实现。所以只

有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过去，深刻地把握我们的现在，才能更加理性、更加科学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合理地构建我们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视现代发展的高等教育是井底之蛙，而脱离了传统约束的高等教育则是无源之水。

综上所述，我们高等教育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构建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不只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只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对它的重构。"① 大学现代化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抱残守缺固然不行，拾人牙慧和亦步亦趋也无法使我们拥有腾飞的翅膀，唯有将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与西方现代文明实现积极的整合，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引领社会并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才库和思想库，也才可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大学观念的拓展、深入和嬗变

现代大学诞生以后，之所以到今天依然令人向往，是因为它是一个给无数年轻人提供了可以获得渊博的知识、受到严谨的学术训练、培养崇高的人生理想以及追求卓尔不群的道德的地方。一句话，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大学这个"加油站"了。不过，既然是"加油站"就是服务性的，那么，作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又应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呢？实际上，要想让大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的启蒙，即启蒙无数的莘莘学子认真地去反思"教育首先是服务于社会，其次才是专业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大学诞生之日就具有的对人的深刻启蒙作用，在今天更应该

① 金耀基著：《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人拥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更重要的使命是去启蒙每一个人的心智，帮助每个人建立起完善的观念结构体系。观念决定行动的方向，正如“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走在雷鸣之前”一样。①

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当提出大学的宗旨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于社会的时候，在强调大学对社会的贡献率时，大学却可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学术”倾向问题，即现在和将来从事教学、科研和服务于社会的人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特性”。或者说，在今天的大学世界里，在学科体系越来越严密、完善，课程越来越丰富、完整，教学技术和手段越来越进步、发达的情况下，学生为什么“在这样的世界里，修完了各门独立的学科，领到了毕业证，但是却没有形成一种更为贯通的知识观，更为综合、更为真实的生活观”呢？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精英教育也好，大众教育也罢，在绝大多数年轻人生命的黄金时代，如果高等教育仅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和运用的层面，而不能深入启蒙并帮助学生明白超越人生与自我的意义，理解这个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及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那么我们的学生必然会陷入这样一个对大学认识的怪圈中：大学只是一个知识的信息堆积，却没有智慧的知识衍生，甚至没有道德约束能力施展的场所。再说严重点，高等教育离开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启蒙和正确观念的树立，其精神的贫乏与观念的黑洞也就必然造成思想和行动的失序、无理乃至于无法。这样的例子今天并不鲜见，许多情况下，物质的进步带来的却是人的精神衰退，科技的进步也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福祉。

当然话说回来，有什么样的大学也就必然会造就什么样的大学人。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昔日单纯的“象牙塔”了，

---

①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涂艳国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当我们自诩大学是引领社会的一面旗帜时（其实这只是一种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偶尔为之的，比如“五四”运动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改革开放的初期），现实世界却变成是社会在领跑大学，本应是木秀于林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了社会的风向标，甚至相当程度上迷失了自我而变得相当世俗化和功利化了，这种变化使得大学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感逐渐消退。而大学一旦彻底失去了这种神圣感，其在学生心目中也就变得更加枯燥、单调和功利，对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也就如缘木求鱼般的荒唐和可笑。

但是，大学毕竟不是一般的社会机构，它自身应该具有一种极强的净化功能。“当追求名利的风气弥漫校园的时候，大学生们更应该超越自己的私利，了解周围的世界，树立公民的和社会的责任感，为社会公益作出自己的贡献。”一句话，要想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培育出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精神疫苗，那我们就必须首先使大学成为这种精神疫苗的实验室。毕竟大学的作用在今天是任何机构所无法取代的。荀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而今天人的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当我们明白任何教育都具有点滴的教化和启蒙意义的时候，高等教育的启蒙意义就更显非凡了。因为伴随着人的思想认识和观念的拓展、深入和嬗变，高等教育的启蒙意义也就会愈加彰显。

一、世界观的拓展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内的总的根本看法，而将这种看法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就是哲学。但今天说起“世界观”一词仍不免让人神伤，因为这个词总是被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太丰富的含义，其阐释语境的更迭也显示了观念的复杂和隐晦。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一个接受了所谓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客观、完整、根本、清晰的看法，他是很难承担一种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的。“从更广泛的



意义讲，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就是自己通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生活，看透事物之间联系的人。”可惜我们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培养学生的世界观方面，从宏观上说，虽然总是力图让学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学生的世界观却因为我们的“传道”本身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举措，而最终呈现在学生面前的世界总是模糊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很难谈得上客观和完整；从微观上说，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出于服务现实和学科的需要，高尚的世界观更是被肢解乃至低俗化。学生在这样的阐释语景中，总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构建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以至于人生的信念和理想趋于功利化和世俗化。而世界观的非客观性、非完整性，更严重的后果是阻碍了学生对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整体认知及把握，造成文化和传统的人为隔阂，这不仅是指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中会形成对多元文化交融的偏见，也包含了大学生对古今文化知识和传统精神的误读，并陷入认识论的偏激和狭隘之中。

世界观的构建本身也就是哲学观的构建，今天高等教育在极力提倡创新教育和创新人才的时候，应该明白的一点是，没有合理、科学的世界观的支撑，人就会缺乏一种精神的底子而显得底气不足。“在哲学和思想的意义上，一种由差异多样的思想张力所发出来的知识创新，这就是一种创造。”但遗憾的是我们既缺少这样的思想，更缺乏这样的思想张力，也就绝难诞生惊采绝艳般的栋梁之材。当一个新的世界，或者说世界日新月异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将如何面对，我们是让世界走近我们的教育，还是让我们的教育走进世界呢？可以肯定，世界观的拓展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指南针，毕竟，这个时代需要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器宇磅礴的时代鸿儒。

二、历史观的深入

过去的都可称为历史，但真能被记住的又不仅仅是简单

的历史了。真正的历史是客观的再现，它既不会刻意地去扬善隐恶，也不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可贵的是，历史还可以告诉人们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韬光养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了一种深刻而辩证的历史观。而对历史和历史观的尊重既反映出一个民族成熟的程度，也反映出我们教育的眼光。但教育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反差却极大，因为许多大学生对历史知识既茫然无知，又对历史毫无兴趣（当然这跟我们的一些历史失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有不小的关系）。没有历史的积淀，何谈历史观的正确与否；没有历史观，又何谈知得失、明事理呢？高等教育中，一个学物理的，只要把教材中的定律、公理弄清楚，考试过了就行了，既不必费心知道物理这门学科从诞生到现在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必去深究牛顿所说的“科学就是站在一个个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深刻，更不必知道物理史观对人的思维、思想有何启迪作用。学中文的，只要知道屈原、李白、托尔斯泰等伟人的生平、作品即可，又何必去探究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所体现出的博大精深和蕴涵的深刻历史意义呢。学艺术的只要长袖善舞，能绘擅画便能一帆风顺，哪管它艺术史、音乐史讲述、传承了什么样的历史。殊不知，这些历史其精髓就在于启蒙人类精神和升华人类灵魂。

今天的大学时代需要面向未来，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尊重历史的时代。当面对的历史总是被戏说和演义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一个总是把历史当玩笑的民族，最终也是会被历史开更大的玩笑的。如今大学生历史和历史观的缺憾表面看无足轻重，实则至关重要，因为一个缺乏历史积淀和正确历史观的人，思想必定是环顾左右而不定，眼光必将是短视的，行动上既迷失自我，又少有社会和他人。当年胡适先生猛烈抨击过这样的人：“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以至许



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声，身有奴气，这样的人不管留学不留学都只能成为一个终身‘学奴’而已，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国学人。”[①] 这段话今天听来不可谓不深刻。从大处说，缺乏社会历史观，也就必然缺乏一种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客观剖析和尊重，或一味盲从，或全盘否定。从小处说，自身精神世界的贫血也就必然造成精神的萎靡和短视，终难成气候，这样的人是绝难谈得上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的。“以史作镜，可以知兴衰。”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我们是否可以看见今天高等教育的血脉之中似乎还缺少点什么呢？

三、知识观的嬗变

斯宾塞在19世纪看到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巨大推动之后，诘问自己也诘问天下，“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实际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是能够深刻反映出这个时代对待知识的一种观念问题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中世纪人类社会发出的最强音；“我知道什么”也早已成为每一个热爱知识、探求真理的人的座右铭；到今天，“知识就像灯光一样，它没有重量，不可触及，它能够穿越世界，启迪各地人们的生活”。[②] 知识在不同的时代所显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如何认识知识已经比单纯掌握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至关重要，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对待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远比如何掌握知识更重要。必须深刻认识到，知识本身负载的功利性特征并不能全部遮掩知识的非功利性及造福社会、人类的公益性特征，这一点也是现代大学必须要认真履行的神圣职责。大学是知识的殿堂，知识是大学生

---

①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载《读书》2003年第9期，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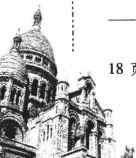
②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载《读书》2003年第9期，第5页。

们登堂入室的阶梯，而知识观则成为指引大学生向上攀登的向导。前哈佛校长萨默斯在北大2002年校庆庆典上谈道："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形式是什么……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① 可见新时代的知识观在改变着人们对知识的传统看法。

但不容乐观的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知识观念往往是以单一化、线性化的形式出现的，知识的呈现物主要是以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形式来体现。越来越多的大学以能够开出越来越多的课程为荣，但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想一想：繁杂的课程体系是如何体现出知识本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创造性的？课程在不断延伸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和丰富内涵又该如何引导学生去理解和认识？尤其是知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意义又是什么？可惜这些涉及知识观念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于是，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我们往往只强调了知识的概念系统和所谓的知识完整性，而忽视了人在科学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所体现出的思维特征与批判精神，导致知识的学习与思维发展的严重背离，知识的学习仍然是以讲授、灌输、记忆、模仿为主，教学方法仍然徘徊在一种低水平的解释模式和表达模式中。以上种种弊端既不能带动学生思维水平的提高，又迫使学生负担许多过时的知识，从而造成学生的知识超载，并以此形成一种违反时代潮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狭隘的知识观，这种扭曲的知识观，让学生对知识产生了片面的理解。特别是在物质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甚为流行的时候，"知识经济"、"知识就是金钱，知

---

① 韩水法：《牵一发而动全身》，载《读书》2003年第9期，第18页。



识就是效益”等观念很容易被大学生们误解和曲解。事实上，没有正确的知识观，知识不仅难以成为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的“诺亚方舟”，反而可能成为助纣为虐的“潘多拉盒子”，这样的例子和教训在历史和现实中屡屡上演，值得深思。

总之，大学要想成为21世纪真正引领社会前进的一面旗帜，那就要从现在起培养无数能勇敢擎起这面旗帜的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大学的责任！就理想的境界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开启每个人的潜在能力和潜在价值，因此，在高等教育启蒙下，使人能够构建完整、丰富、理性的观念体系的意义也就应该在于此吧。

现代大学功能的丰富与完善

岁月沧桑，不经意间，从粗具现代大学雏形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大学开始，大学已快走过千年的历史了。关于大学，普西在《学者的时代》一书中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社会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大学的诞生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笼统地说，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的先进文化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在大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大学逐渐变“大”，其功能也逐渐从单纯的传授知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再到服务于社会，这三个基本功能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广泛共识。今天，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体现和人们对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深切渴望，大学的地位已远非往昔可比，而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今天的大学被称为“社会的加油站”、“经济的发动机”和“文化的智囊库”的时候，大学才真正踌躇满志。那么，大学还要往哪里走呢？这个问题从大学诞

生之日起就是无数大学人苦苦思索和追问的。雅典的一座神庙刻着一句古希腊人留下的箴言:“认识你自己”,那么今天的大学又该如何剖析自己呢?在观念决定行动效果的时代,反思大学的知识观、科学研究观和服务于社会的宗旨,对于大学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笔者尝试从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出发,以中国大学现状为例,分析探讨三个问题:

一、大学缺什么样的知识观

大学缺什么样的知识观,这看上去仿佛是一个荒唐的问题。因为大学拥有丰富的知识、渊博的学者和孜孜以求的莘莘学子,没有谁会怀疑大学是一个学习各种知识的地方。自19世纪德国的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恪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知识框架,奠定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实际是衡量一所大学把学生的知识观体现在如何通过知识的学习,达到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的目标的尺度。换句话说,知识易得,一种合理的知识观的建构就绝非朝夕之功了。蔡元培先生于北京大学上任伊始,就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至今仍振聋发聩的演讲,其中的核心就是大学如何面对学术的问题。“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① 19世纪英国的红衣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也有深刻的阐述:“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使各种发现得到不断完善和证实的地方,是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知识不仅是万事万物,

①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知识也是万事万物之间互相而真实的联系。知识不单单被视为学到的东西，而且被看作哲学体系。”①

相比之下，今天的大学在知识学习的目的上，尤其是知识观念上多了一分功利主义的色彩，而少了一些探究知识的哲学价值的精神追求。大学作为一个信息大量产生和堆积的场所，作为知识爆炸最突出的地方，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去决定讲授什么样的知识。现代大学可以开出上万门课程，专业划分精细，学科交叉密集，大量的新知识、新学科不断诞生，使学生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毕竟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使每一个学生把整个专业的课程都系统、深入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大学的知识观应该不仅是讲究单纯的知识传授，而且要让学生明白如何对待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远比单纯地掌握知识更有意义。现在不少学生把对知识的掌握仅仅视为将来工作的阶梯，而忽视知识在人的一生中的发展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的作用。在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大学的知识已经有物化和技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学生对实用学科顶礼膜拜，对人文学科避而远之，人文精神也就自我放逐了。此外，大学在知识的选择上还是以单一化、线性化的形式出现，知识的呈现主体主要还是以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形式来体现；在学科、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上过分紧跟市场经济，趋同性较强，只顾学生眼前利益，而不太注重根据学校办学实际和学生的学习实际来决定教学走向。这些弊端反映了大学在面临知识的选择时采取的过分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念，迫使大学成为追逐社会潮流的风向标，而缺乏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不可否认，知识是所有创造的基础，大学并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对大学的未来

---

①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第54页。

是很重要的。可如果大学把知识观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像填鸭般的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①] 那么，这样的知识观对学生未来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人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因此现行的知识观念引起关注的问题是：“知识是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由于来自不同的知识领域，人们往往依据知识的属类不同，而自发形成特定的圈子。因而，其思维方式、心理、情感归属和信仰也就不同。”[②] 这种因为知识归属不同进而导致人们在人文和科技两大领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语言表述以及行为方式上有差异的现象，也就是所谓大学中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文化的“对立”使得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知识结构体系的建构不够完善，缺乏一种对社会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向度。因此，进一步说，大学知识观的正确选择有助于消除这种文化的对立和隔阂，使学生有信心、有能力真正地融入社会。

二、大学缺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观

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大学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社会和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注入了生命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大学要提供的社会服务，不是和其他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处在同一水平上，而是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为社会提供服务。据资料统计，美国公司 1997 年在大学投入的资金达到 17 亿美元，是 20 年前的 7 倍，而大学对公司的回报绝不仅仅是投桃报李，同样是在 1997 年，大学发明的专利就给投资公司带来了 300 亿美

---

①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载《比较教育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② 谢维和著：《教育活动的社会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9 页。



元的销售额。今天，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中国的大学也通过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当中，并且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在国家科技创新体制中，大学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科学研究也是今天任何一所高等院校衡量学校办学实力、教学水平、师资队伍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科学研究对于大学是重要的，而以一种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观来统领科学研究则更重要。现在大学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这本来是好事，但现在都把目光盯在应用研究上，而对基础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和思考，更缺乏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措施，而制约应用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却又恰恰是基础研究的薄弱，以至于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是致使大学的科技竞争力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根本原因。另外，在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压力下，相当程度的科研工作一开始就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商品”这个棱镜来确定，科研成果往往被打上了鲜明的市场经济烙印，而不被看做是扩张科学界限的研究活动。

此外，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由于学科长期的门户之见和小农经济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科研活动常常以一种家庭作坊式科研的形式出现，既不注重研究中各类学科的交叉整合和合作探究，又不太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使得科研成果缺乏理论前沿深度，也缺乏实践操作广度。斯坦福大学承担的马丁·路德·金书信文件集项目，是一个大型的也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由克莱·卡森教授领导，由一个科研小组共同进行研究。该小组包括 16 位高级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是访问教授，还有 48 名研究生、106 名本科生参与项目研究，其中 1 人在研究工作基础上完成了两本著作，课题研究的时间历时 10 年。对比之下，令人汗颜，十年时间，170 人的庞大研究队伍，合作完成项目，这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中绝对是罕见的，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观念太缺乏合作探究的精神，更缺乏“板凳一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科学求实态度。所以，如果我们的大学不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培养对待科学研究应该具有的求实态度，尤其是对科学研究中良好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和维护，那么我们的大学科学研究是很难有所作为，或者是很难大有作为的。

三、大学缺什么样的社会服务观

大学走出“象牙塔”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和经济的各种活动，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影响社会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近现代以来，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各国经济增长的总量中总是有一部分不能被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增量所解释，他们把这些不能被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叫做“索罗残数”（根据经济学家 Robert. M. Solow 的名字命名)。“索罗残数”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归功于教育的作用。世界银行 1998 年在《知识与发展》报告中指出：美国 1929—1982 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25% 可以由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解释。与知识相关的三个因素是：教育、贸易开放程度及通信基础设施的供应状况。同时确认，不向创新和知识开放的教育将不会带来经济的增长。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今天需要甚至渴求知识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为了生存并产生影响，大学的组织和职能都必须适应周围人们的需要。它必须像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弹性。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是摆脱不了服务职能的。”① 而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贫困阴影中的人们是因为他们够不着左右命运的开关，这一开关就是教育。由此可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服务角色！

但是，大学在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很可能意味着自身独

---

① 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10 页。



立地位的丧失，从而使大学沦落为社会的附庸。布鲁贝克在其经典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言简意赅地阐述："由于大学已成为知识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大学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大学已失去了它的清廉，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控制。""学院和大学的工作就是培养脑力工人和技术工人掌握专门技能，以满足企业经营和政府管理的需要，确保企业界精英所有命令都得以贯彻。这类发展对寻求意义、秩序和思想综合的传统高等教育概念起到了灾难性影响。"① 由于大学要得到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政支持和帮助，所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甚至对政府言听计从。由于制度的缺陷，许多应该由大学自主完成的事情却由政府操办或包办，大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府行为，而政府的不恰当的干预常会使高等教育学术边缘化，而扩大了学术腐败的可能性，这直接阻碍了大学的正常、健康发展。

反思最近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一些所谓的高等教育主流话题在论及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功能时，往往形成了一种传播学中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即当一种舆论形成以后，由于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少数人就会陷入心理萎缩而沉默，使不正确的意见得到放大而占据舆论市场。实际上，当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本身就孕育着片面、偏激和独断的危险。比如，"教育产业化"这个相当时髦的高等教育主流话题，实际把中国大学自主性、独立性很脆弱，而盲目性、非理性很强大的特点显露无遗。一方面大学需要靠钱来维持所谓跨越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对教育资源进行一种掠夺式的开采，一味地把大学推向社会，过分强调大学的服务功能，忽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忽视高等教育安身立命的基础——人才培养的质量，直接后果是动摇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基础，把教育的公平、公正完全置于

① 〔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3 页，第 140 页。

脑后，这样的服务观验证了“服从于政治压力或短期政治行为，不可能创建出为长期的公共利益服务的高等教育系统”。[1]所以，在我们强调大学服务于社会的时候，得警惕大学成为社会的传声筒而失去灵魂。

总之，对大学功能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出，社会和大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学的问题必然折射出社会的问题，反之亦然。大学发展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任何以为大学的发展会风调雨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幼稚的。大学的发展本身又是一个不断丰富自身内涵、不断调整自己适应社会能力的过程。如果要说大学还具有一个功能的话，那么这个功能就是“具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使命，这就是思考。大学是独立思想的中心，既然它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2] 大学不是完美的，但不能缺了责任和良心。缺乏独立精神的大学是可怕的，而缺乏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大学就只能是徒有其表。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中国大学应该让自己严肃起来，否则居安思危就是一句空话。

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中的中国大学

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不过区区百年，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堪称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典范。2008 年在校生规模已经突破 2 700 万人，在世界诸国中高居第一位。高等教育的平均毛入学率也已经达到 20% 以上，达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水平稳步提升，科研实力日益增强，中国大学已经成为国家传承

① 孙有中著：《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11 页。



文明、开拓创新的生力军，成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逐渐成为一支世界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放眼世界，世界各国的大学同样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样成了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社会边缘角色逐渐走入社会的中心，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旗帜。各国大学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教育层面的竞争演化成为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科技、政策、开放程度的多层次竞争。

21 世纪是世界各国博弈争雄的世纪，也是世界各国大学更加追求一体化、开放化、透明化的世纪，中国大学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要想在世界大学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使自己融入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之中；就必须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大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和世界各国大学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越来越快速的融合、越来越多样化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从历史上看，现代大学脱胎于西方，大学的三项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于社会也是脱胎于西方大学，并最终完善和影响世界大学的发展。西方现代大学倡导的大学是社会的“加油站”和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旗帜”更是彰显了大学对社会的推动和领导作用，这些理念都对今天的中国大学影响巨大。因此可以这样说，从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开始便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序幕，到今天，中国大学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之中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发展越来越与世界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21 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影响下，大学同样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管理模式到组织结构，从课程编制到教材运用，从教学语言到教学方法，很难再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大学可以置身事外。在国际化潮流的推动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学也必然融入其中，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必然选择。和国际高等教育接轨，最重要的意义是它可以让中国大学站

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了解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只有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时，我们才能看到，尽管今天的中国大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必须承认，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大学，以他们历史悠久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强大的科研实力成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主宰了高等教育的话语权，成为大学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高等教育利益最大化的赢家。再说直接一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甚至很大程度上就是高等教育的美国化，因为美国大学从20世纪，尤其是从二战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学的事实领袖，其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而美国大学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确实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影响力、科技实力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在今天仍然无出其右者。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在美国，最著名的科学杂志大部分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每年的诺贝尔各项奖也大部分被美国大学收入囊中（截至2009年，美国已有320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各类奖项），这些都足以说明西方大学目前的强势地位和垄断高等教育话语权的事实。而其他非西方大学，包括中国的大学实际上都面临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中的边缘化、非核心化的危险。因此尽管中国大学发展速度惊人，尽管办学规模、入学人数世界第一，但现在的中国还仅仅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而不是强国，我们的大学还缺乏高等教育的话语权力，还缺乏真正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还缺乏大量的创新人才。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条件，使中国大学能够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懂得应该怎样去办大学、管大学和教大学，让我们睁开眼睛去看世界，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避免“井底之蛙”的悲剧上演。同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更为严谨、更为科学的评判标准，使我们懂得“罗马城不是一天可以建好的”这一深刻道理，明白一流大学的诞生绝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以金



钱堆砌的。只有承认现在是“西方大学凯旋”的时代，而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和审慎地看待中国大学的发展，更加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才能早日迎来中国大学凯旋的时代。

现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机遇，但更是对中国大学的巨大挑战。那么，中国大学应该怎样面对现实而有所作为呢？承认落后并不等于自甘落后，更不等于自暴自弃，在中华民族复兴和振兴的时代，中国大学决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积极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国际化愈演愈烈的现实面前，中国大学如何保证自己不被“化”掉呢？在西方学术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中国大学如何做到和而不同，成为真正“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呢？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大学应该着力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中争得一席之地，甚至脱颖而出。

一、“传统”与“现代”沟通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一直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居于领导地位。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世界的中心逐渐滑向边缘，其结局就是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丧权辱国的统治政府使得中国人饱受苦难。一方面是中国极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凭借其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军事力量让中国俯首称臣，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从惶恐、痛恨到顶礼膜拜的心理变化过程，这种心理上的影响比肉体上的打击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更是看到了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于是中国人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形象在世界迅速树立。而“现

代”这个词更加散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使很多人产生了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和先进的，而只要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非理性逻辑。“现代”成为很多人头脑中的一块试金石，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制度、现代人、现代化，包括现代大学都成了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东西，与此相反，传统似乎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再也无人问津。中国大学走向现代是历史的必然，但现在的大学生长于过去的大学之上，大学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大学，就在于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对历史的反思是对文化精神的守望，因为反思使得今天的大学去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因为传统可以使得我们更加理性和审慎地面对未来，懂得传统对于大学的特殊意义。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传统挖掘的深度决定了现代发展的速度。

中国现代大学在并不漫长的历史里，却创造了弥足珍贵的传统。从提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学的理想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是多么纯洁和高尚；从北京大学倡导的“思想自由”，到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学海纳百川般博大的胸怀；从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所崇尚的“求是”精神，到梅贻琦先生振聋发聩的“大学，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也”，我们可以感受到追求真理高于生命的大学真谛，感受到大学是真正人的大学的真实含义；从张伯苓创立南开大学，到熊庆来执掌云南大学，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每一所大学中无数先贤哲人的精神和灵魂的高贵。这些都是现代大学的财富，都是大学从今天走向明天的基石。任何一所大学不都是从传统一步步走过来的吗？不都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吗？没有传统，又何谈现代呢？中国大学的传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财富，任何鄙视、割裂传统的做法都将被历史证明是极不理智的行为，对大学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中国大学需要现代化、需要面向世界和未来，更需要面向中国文化的传统，珍视中国大学的传统，只有把传统和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大学才有



可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的浪潮中争得一席之地。一个没有传统的大学是可怜的，而有了传统却不知道珍惜的大学却是可悲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会把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大学传统视若草芥。21 世纪的中国大学需要的是传统和现代的良好沟通，需要的是既面向未来，又珍视传统的大学精神。

二、“科技”与“人文”互动的问题

科技与人文在今天大学发展的历程中仿佛是一对矛盾体，好像一提科技，就必然和人文相冲突，一提人文，就和科技水火不容。科技的发展是由人推动的，最终还要造福于人类自身，这和人文应该是殊途同归的。科技与人文之所以会产生分歧和矛盾，这和人认识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划分也就越来越细，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科学技术仿佛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而人文科学由于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发展，成了不少人心中的“无用之学”，于是下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上至“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命运”等等，都成了重视科学技术发展，而忽视人文科学建构的重要因素。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处于被冷落的尴尬地位，人和人的交流少了，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以至于出现了大学教育当中科技与人文之争。

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光有科技没有人文的发展是盲目的，甚至是有害的。光有人文而缺乏科技，则又可能陷入空谈误国的境地。今天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必须更加关注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科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油门”，那么人文就是“刹车”。事实上，科技中同样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因素，科技同样需要追求真、善、美，这和人文是一脉相通的。同样的道理，人文也是现代科学文明的一部分，没有人会认为人文就应该是不科学的，或者是以追求

非科学、反科学为目的的。

21世纪的大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加油站”，中国大学的发展任重道远。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实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水平线上，科技发展仍然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弘扬。科技与人文的有机融合是中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一所好的大学，它一定是充满了人文关爱和崇尚科学精神的家园，它一定体现了真实、人性、自由、多元的文化色彩，既不盲目迷信科技，更不滥用科技，在更好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更懂得关爱、同情和宽容，真正把人的发展落到实处。21世纪的中国大学要想在国际化的潮流中不至于随波逐流，则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良好互动是重要前提。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问题

全球化使得文化传播的速度日新月异，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的霸权化特征也日益凸现。大学，作为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主战场，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人才涌现的源泉，责任之重大，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何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更好地继承下来，同时又积极吸收世界多元文化的精华，做到兼收并蓄，创造时代发展和国家、民族需要的新文化，是摆在中国大学面前的一个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必须认识中国大学面临的文化选择问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对其他的非西方文化，包括东方文化采取了一种强权文化或殖民文化的态势，以消融、瓦解其他文化为目的，这造成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不少的大学人）心中新的“西方文化崇拜论”的抬头，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鄙视和轻视自己的本土文化，加上现在西方大学发展的强劲势头主宰了高等教育的话语权，中国大学受到这样风气的影响和现实的压力，有失去文化自信心的危险，对于能否建立能够和西方大



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大学抱有怀疑的态度。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说，中国经济的强势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复苏，反而出现了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趋势。为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更加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的竞争是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更是国家文化实力的竞争，文化表现力和文化影响力的丧失对于一个国家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那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就完全无从谈起，于中国而言，若如此，则全球化中就永远不会有中华文化的位置和发言权。为此，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中国文化复兴的先锋，把既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精髓，又体现强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大学作为自己的阵地。中国大学只有勇敢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挑战，珍视传统文化的多样化，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才可能创造出影响世界的文化，才可能不负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总之，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学面临多种机遇，更面临多重挑战。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既不能把它妖魔化，也不能把它视作免费的午餐。开放的中国大学应该以更宽广的胸襟、更求真务实的精神、更脚踏实地的努力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洪流之中，体现中华民族的风范，体现中国大学的风采。一句话，中国大学必须走一条自己的大学崛起之路，只有这样的崛起，才算是中国大学真正的崛起，也才算是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豪情万丈地写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为了使中国的大学早日崛起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中国大学在努力，中国大学必须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蒋凯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版。

2. 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3.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教育思想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版。

4. 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5.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读书》2004 年第 2 期。

6. 金耀基：《全球化与现代化》，《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7. 〔美〕德里克·博克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8.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版。

9. 范晓玲著：《教学评价论》，湖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0. 〔美〕陆登庭：《21 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大学校长论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教育——财富蕴藏在其中》，教育科学出版 1996 年版。

12. 顾明远：《终身学习与人的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8 版。

14. 王德峰:《通识教育与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新华文摘》2009 年第 7 期。

15. 钟启泉、高文、赵中建著:《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6. 眭依凡:《大学资源使用要警惕“贫困的富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1 期。

17. 刘健芝:《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读书》2009 年第 3 期。

18. 〔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9. 〔美〕约翰·布罗克曼著:《第三种文化》，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

20. 王诺著:《外国文学——人学隐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1. 高德胜著:《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2. 甘阳、蔡达峰、郭齐勇、舒炜:《大学人文教育专题》，《读书》2006 年第 4 期。

23. 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24. 阎光才:《整体性坍塌之后——当代知识格局变迁与大学普通教育改革》，《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25. 胡建华:《高等教育价值观视野下的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研究》2005 年第 11 期。

26. 金生鈜主编:《教育：思想与对话》，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7. 杨志坚著:《中国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研究》，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05 年版。

28. 〔美〕玛丽埃伦·韦默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给教学实践带来的五项关键变化》,洪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9. 〔美〕巴巴拉·G. 戴维斯著:《教学方法手册,严慧仙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30. 丁钢著:《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1. 〔美〕斯蒂芬·布鲁克菲尔德著:《大学教师的技巧》,周心红、洪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2.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33.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34. 赵婷婷著:《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与协调》,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35. 刘铁芳:《哲学生活与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36. 杨涛、王兴林、童文胜:《新建本科院校发展之路探索》,《高等教育研究》2007 年第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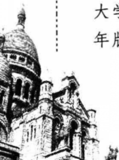
37.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38. 王建民:《高等教育"工程化"建设中的管理模式:问题与对策》,《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0 期。

39. 潘金林、龚放:《教学方法改革: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新动向》,《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0 期。

40. 〔美〕德里克·博克著:《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41. 〔美〕弗雷德里克·E. 博德斯顿著:《管理今日之大



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王春春、赵炬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42. 〔美〕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桥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43. 贺国庆著：《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44. 王国维著：《论近年之学术界》，上海书店 1996 年版。

45. 〔美〕菲利普·G. 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入世"：并非全球化的明智之举》，卢爱珍编译，《新华文摘》2002 年第 10 期。

46. 覃红霞、张瑞菁：《SSCI 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之反思》，《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47. 高瑞泉、颜海平著：《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48. 〔美〕菲利普·G. 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49. 赵俊芳：《西方名校"活力"探源》，《高等教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50. 王逢振著：《交锋——21 世纪著名批评家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51. 〔美〕伯顿·克拉克著：《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52.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 世纪的大学》，刘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3. 金耀基著：《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54. 〔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55.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56.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学术权力》，王承绪、张维平、徐辉、郑继伟、张民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57. 贺国庆、华筑信著:《国外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动向和趋势》,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58. 叶澜著:《课程改革与课程评价》,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版。

59. 刘继平:《课程的迷失与回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 年第 3 期。

60. 郭德红译:《美国大学课程的思想的历史演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2007 年版。

61. 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上海书城杂志》2003 年第 8 期。

62. 〔英〕丹尼斯·劳顿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63. D. Lawton, *Class, Culture and Curriculum*, RKP, 1975.

64.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演讲》,涂艳国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65. 〔美〕德里克·博克著:《美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66. 〔德〕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三联出版社 1991 年版。

67.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68. 黄坤锦著:《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美国心灵的攀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69.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 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70. 王英杰、刘慧珍主编:《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71. 朱小蔓著:《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72. 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2006 第 3 期。

73. 韩水法著:《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74. 〔美〕约翰·S. 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75. 钟启泉、高文、赵中建著:《多维视角下的教育理论与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76. 许嘉璐:《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史哲》2004 年第 2 期。

77.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当代》2004 年第 1 期。

78. 〔美〕阿尔特巴赫:《高等教育“入世”:并非全球化的明智之举》,《新华文摘》2002 年第 10 期。

79. 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读书》2004 年第 1 期。

80.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81. 〔西班牙〕奥尔托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82. 摩罗:《何谓“人物”》,《读书》2007 年第 11 期。

83. 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学习时报》2007 年 8 月 27 日。

84. 吴松著:《大学正义》,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5.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86. 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

87. 余凯:《当代哲学背景中的大学教育》,《比较教育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88. 张应强、郭卉:《大学教育思想研究:30 年回顾与展望》,《高等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1 期。

89. 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

出版社 2001 年版。

90. 河清著:《现代，太现代了，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91. 〔英〕齐格梦特·鲍曼著:《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92.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著:《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郭洋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93. 蓝棣之、解志熙主编:《远去的背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94. 方松华:《科学发展观的人文意蕴》，《新华文摘》2006 年第 6 期。

95. 王一方:《医学家的博物情怀》，《读书》2006 年第 7 期。

96. 吴晓波:《百年难忘》，《读书》2006 年第 7 期。

97. 盖生:《“文学终结论”疑析》，《文艺理论研究》2006 年第 2 期。

98. 张承志:《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就选择了什么样的前途》，《读书》2009 年第 1 期。

99. 房宁:《新的未必是好的》，《读书》2002 年 11 期。

100. 王庆石、赵彦志:《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光明日报》2003 年 6 月 3 日。

101. 丁钢著:《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2. 〔美〕欧内斯特·L. 博耶著:《关于美国教育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3. 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读书》2003 年第 9 期。

104. 韩水法:《牵一发而动全身》，《读书》2003 年第 9 期。

105.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06. 谢维和著:《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7. 〔加拿大〕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美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后　　记

自1989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学校工作，到今年刚好21个年头。21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短，经历的事情也不算少，可很多事情却如过眼云烟一般，倏地融入时光的长河之中，大多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印象。但大学于我，或者说我于大学，却逐渐凝固于记忆中，永远抹之不去，难以忘怀，甚至释怀。小学快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来到大学，一直在大学里生活、成长，很小就边玩边听母亲给大学生讲课，感觉大学除了地方大和人多一些以外，也不过如此。等到自己读大学后，更觉得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精神放松、情感流浪的场所。毕业后因为国家包分配，无选择也不想选择，尽管有些波折，我居然也去教大学了。那个年代，在一所不出名的大学混个饭吃，没有任何压力，感觉并不太难。当然，那时的大学于我，无非是一个通过工作拿工资度日的地方，扯不上对人生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更谈不上对事业的执著和忠诚。

不过，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总是会有些反常之举吧，后来果然出事了。我竟然对大学逐渐产生了一种“先结婚、后恋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大学教书如果成为自己终老一生的职业，那实在是一件不划算的事。于是，从我的孩子呱呱坠地，并开始认识这个陌生世界的时候，我也开始尝试用心去感受和体会大学这个离我很近却又很远的世界。我工作的大学基本无什么名气可言，可谓典型的被边缘化了的学校，但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大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群对大学有感情、有想法且行胜于言的老师和朋友，没有他们的



启发、鼓励和支持，我极有可能仍然是一个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的“嘴力机器人”。想来我对大学态度的转变缘于1994年到上海的进修，看到了山外的世界；1998年调到教务处工作，看了和触摸到一些汉语言专业教学之外的东西；2000年在科研处从事科研管理，开始对高等教育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尝试把肤浅的想法付诸于文字，权当玩票而已；2000年在清华大学读书，2003年回到系上工作，2009年又回到学校教务处工作。并不长的日子画出了几乎一样的生活轨迹。也许这种折腾使我对大学有了一种多角度的认识和体会，至少大学已经不再让我产生一种陌生和疏离之感，而是使我和大学有了一种相逢一笑甚至相识恨晚的感觉。

从清华大学读书回来已快8年了，但我却时常会想起清华大学，想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日子，那是一种真正读书的日子。不长的日子，很苦，但直到今天，还能隐隐品咂出它的苦味，犹如普洱茶一般，时有回甘。今天想来，那却极有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一想起清华大学的老师和身处全国各地的同学，还有清华大学的一草一木、一池一坪，仍然会让我有思绪万千甚至人世沧桑之感。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不是大学离我太远，而是我离大学太远了。真的，我开始喜欢大学了，从清华大学开始。

不过，喜欢归喜欢，你总得为喜欢的东西做点什么吧。于是，从来都是言胜于行的我，不务正业、不知深浅地闯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这块天地，想去认真探究这个使我转变人生态度的地方。十年的时间，十年和大学相知相伴的岁月，同行师长的指教和启迪，编辑老师的耐心和宽容，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完成了几十篇关于大学的现在、过去和将来的叙事和论说的文章。不管发表与否，我都珍藏着，就像珍藏我女儿成长过程的诸多故事一样，因为它毕竟见证了我对大学的情感和热爱。

时光如水，生命却未必如歌，每个人都会老去，并最终会停止歌唱，离开这个世界。但大学之所以历经风霜仍风华

正茂，却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贤哲人、无数的莘莘学子，用他们的纯真和执著，用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化为滴滴甘露滋润着大学的生命之根，因此，大学的生命之树才是常青的。本书名为“大学的退却与坚守”，实则更是对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在不断的退却中能否还保有一种坚守的勇气和坚持的信心的拷问。我不是大学的智者，但我愿意成为大学的歌者，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大动力。

衷心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帮助，并宽容我的朋友、师长们，期盼自己能够和大学一样，退却少一些，坚守多一些。

